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2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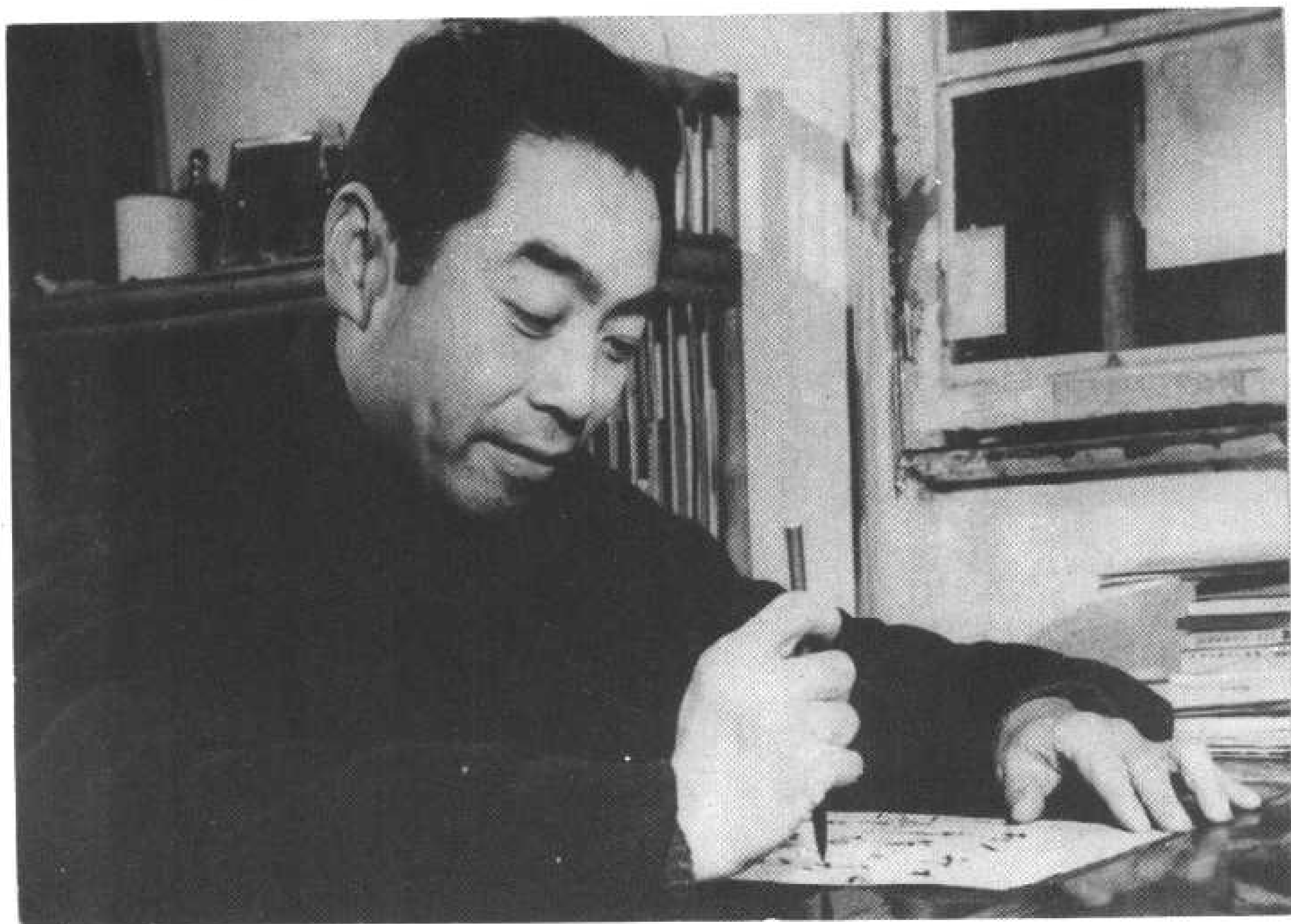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162000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3,500册

书号11310·12 定价1.3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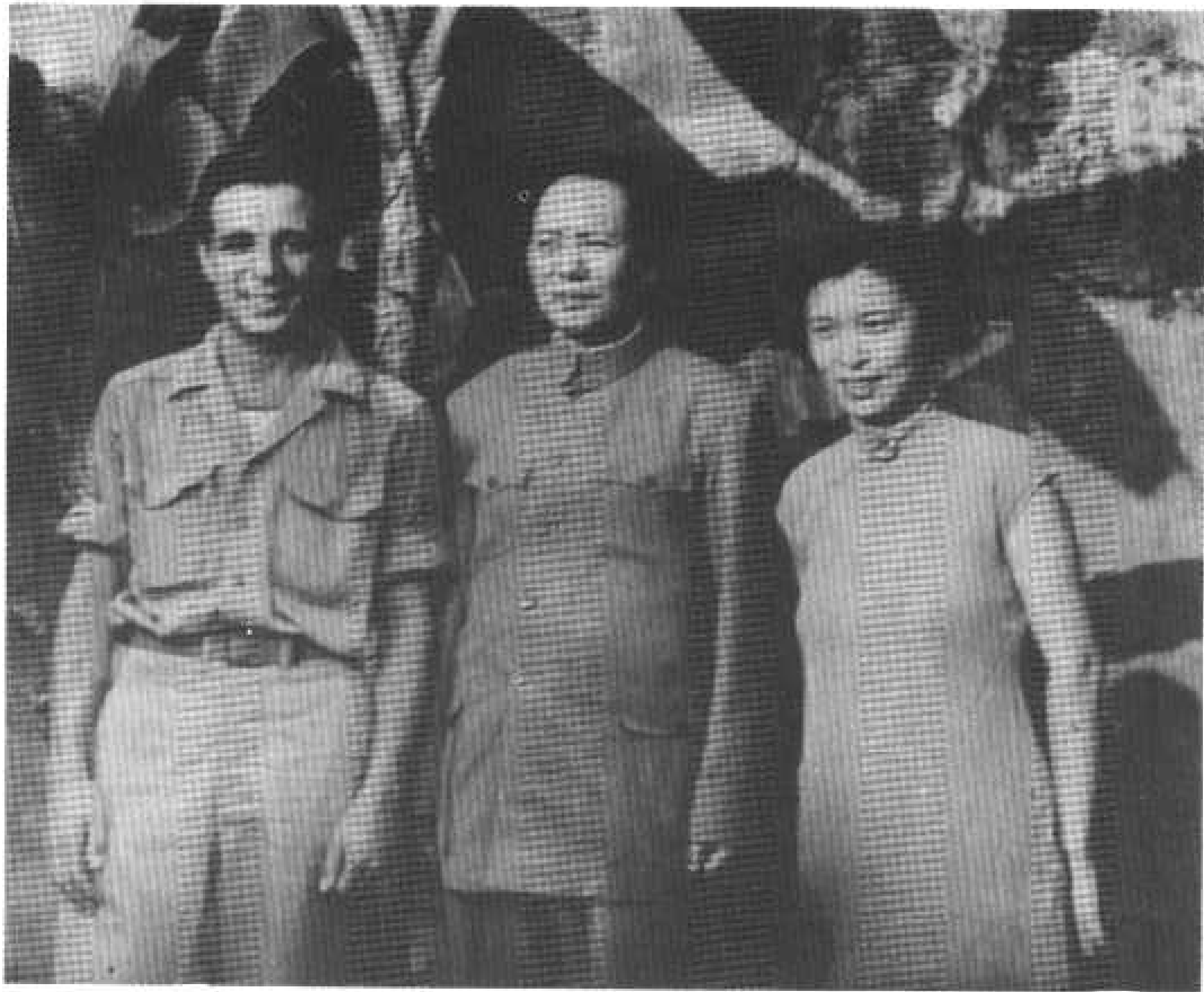
内部发行



毛泽东在重庆机场(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一九四三年）



毛泽东和美国空军士兵埃德尔曼·杰克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右为外事组工作人员龚澎（一九四五年九月）



毛泽东由张治中（左二）陪同从重庆返延安。蒋介石派代表陈诚（右二）到机场送行。右一为陶行知，左一为于立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



周恩来、董必武（左至右）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一九四〇年）



中共代表在重庆中山路代表团驻地(一)。左至右：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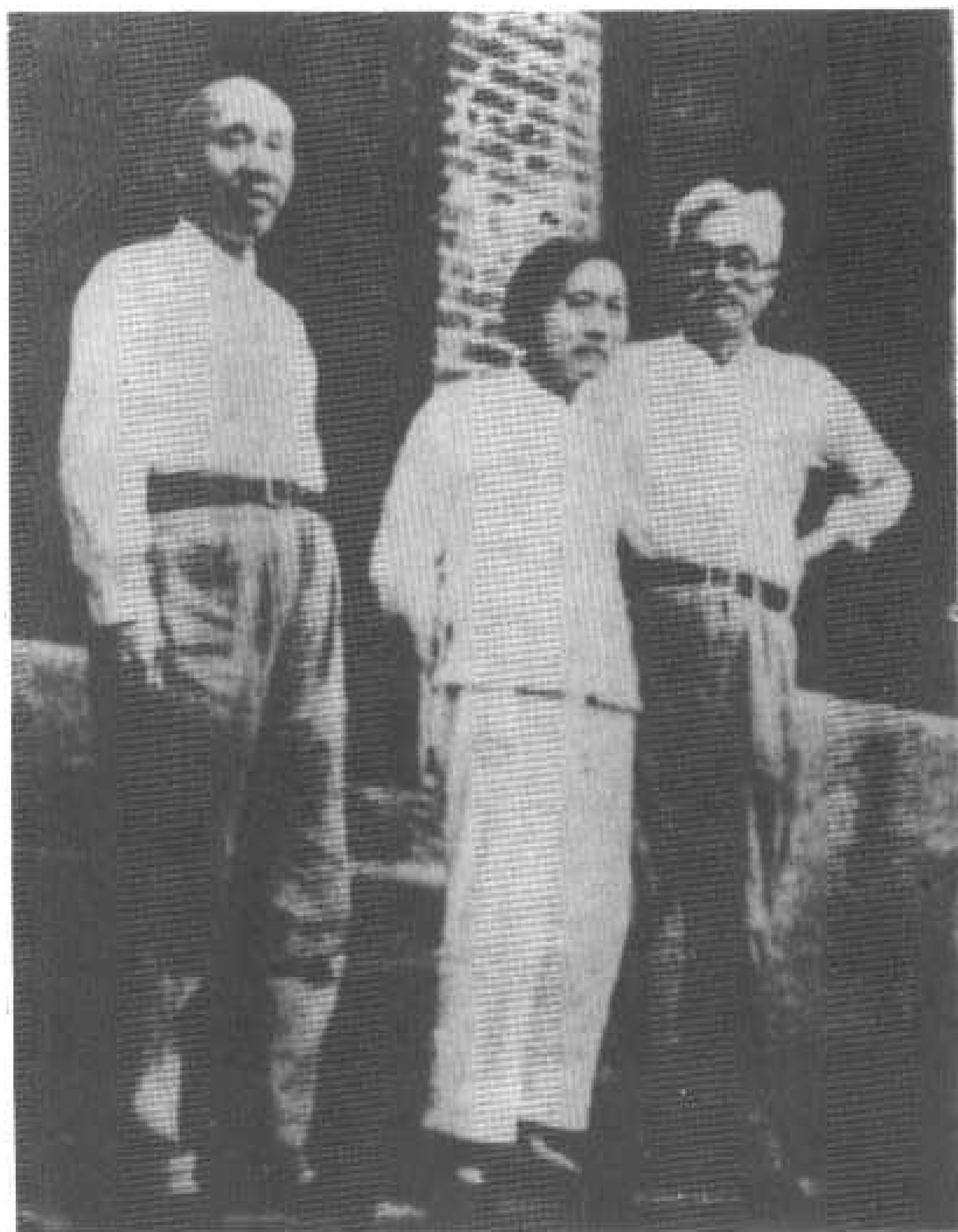


中共代表在重庆中山路代表团驻地(二)。左至右：吴玉章、邓颖超、秦邦宪

周恩来从重庆返延安。邓颖超（左一）、叶剑英（右二）、张冲（中）到珊瑚坝机场送行。右一为随行工作人员童小鹏



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左至右）在重庆曾家岩（一九四〇年）





叶挺、廖承志（左至右）出狱后在重庆中山路中共代表团驻地（一九四六年三月）



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办公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二、三层办公）



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左至右：许涤新、戈宝权、华西园、潘梓年、周恩来、陈家康、薛子正、胡绳

报务人员在同延安电台联络
（一九二九年）。
右下角是被国民党封闭的电台
（一九四三年九月）



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

目 录

- 编者的话.....(1)
-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 (摘录)**
.....毛泽东(3)
- 邓颖超同志给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座
谈会的信**.....(4)
- 中共南方局组织系统概况**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织组(5)
- 在南方局工作的片断回忆**.....孔 原(46)
- 关于南方局的组织机构和南方局组织部的情况**
.....荣高棠(57)
-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地下党的重建和川东党组织
发展、巩固的主要情况**.....廖志高(69)
-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委组(105)
- 回忆南方局成立前后湖南地下党的工作**
.....高文华(131)
- 建设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卓越思想和光辉实践**
——记周恩来同志领导《新华日报》的革命活动

.....	郑新如	(162)
南方局军事组前段 (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 工作概况		
.....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军事组	(203)
附件: 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		(232)
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回忆在国统区的机要通信工作		
.....	童小鹏	(245)
南方局整风学习运动的部分情况		
.....	王 汶 姚黎民	(273)

编 者 的 话

本辑稿件全部由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提供。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在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六年五月党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邓颖超自始至终参加了领导工作，博古、叶剑英、王若飞等都先后参与领导。南方局领导西南和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秘密工作，坚决贯彻了党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贯彻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坚决贯彻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直接领导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开展了广泛的外事活动，团结了许多国际友人；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了民主运动和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在实践中创造了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

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的斗争等经验。南方局的历史，是整个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完整地、准确地征集南方局的党史资料，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领导下，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专门成立了征集南方局党史资料的小组，依靠曾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的许多老同志的努力，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整理出一批比较有内容的资料。现先选择其中一部分予以发表，供研究党史的部门和广大读者参考。

提供资料的同志委托我们向读者说明：因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许多问题无档案资料可查，又时隔几十年，回忆的材料不一定准确，欢迎读者补充、指正。

本辑照片均由童小鹏同志提供。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

(摘 录)

毛 泽 东

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这表现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的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我党方面，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我党方面，抗拒了国民党的压迫，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三万余人。

载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6页

邓颖超同志给中共南方局 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的信

同志们：

我因身体关系，不能出席座谈会，深感遗憾！现提一点简单的意见，仅供参考。

南方局领导下的地区党史，也是我们党全部历史的一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编写党史，首要的要实事求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面貌，切忌烦琐、夸大的叙述。

专此，致以

革命的敬礼

邓颖超

1983. 4. 15

中共南方局组织系统概况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织组

一、南方局的组织系统

(一) 南方局成立简况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时期代表党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进行斗争的领导机构，地点设在重庆。

南方局的前身是设在武汉的长江局。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守，长沙大火，八路军办事处从武汉撤到桂林。这时，长江局实际上已不存在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①上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撤销了长江局，决定在重庆成立南方局，由周恩来等组成。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了南方局的组织人选，南方局正式成立。

^①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

一九四六年五月，周恩来、董必武率南方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南京、上海。当月，南方局改名为南京局，南方局结束。

南方局名称的演变

1. 一九四三年六月，周恩来、邓颖超、孔原等离开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重庆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王若飞等主持。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以王若飞为书记的“重庆工作委员会”主持工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偕赫尔利（美国大使）等人由延安去到重庆，继续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十二月七日，周恩来和董必武回到延安。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飞重庆，二月十六日又返回延安，忙于和国民党谈判。这一时期南方局的工作是由以王若飞为书记的“重庆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的。

2. 根据有关同志回忆，一九四五年冬曾成立过中共中央重庆局。重庆局这个名称肯定是有，但至今尚未查到正式文件（据童小鹏回忆，成立重庆局是在延安商量好的，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后，十二月份在会上宣布，对外叫中共代表团，对内称为重庆局）。

3.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迁到南京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改称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中央批准将留在重庆的

同志组成中共四川省委^①，负责指导整个西南地区党的工作。书记为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王走后副书记为张友渔，四川省委由南京局领导。

4.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离开南京飞返延安。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央决定由董必武在南京主持南京局的工作，直接管理上海工委、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及一部分统战关系中的党员。

上海另设上海分局，管理原刘晓所管党的秘密组织和原钱瑛所管的秘密组织。钱瑛原来管的组织除西南的川、康、滇、黔由重庆分局管辖外，其余均划入上海分局，仍由钱瑛直接或间接管理。

上海分局由刘晓、钱瑛、张明（刘少文）和上海市委的一人组成，负责领导和发展蒋管区的秘密工作。

一九四七年一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共广东区党委撤销，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由刘长胜、方方、林平等负责。不久刘长胜调离，方方任书记，林平为副书记，章汉夫、连贯、许涤新、夏衍、刘宁一、梁广等为委员。香港分局归南京局领导。

^① 中共四川省委，对内称为四川工委或叫南京局重庆分局。因情况变化，分局实际上没有正式成立。

5.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共谈判破裂。代表团和办事处机构撤退^①后，党中央决定将原来上海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中央通知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

上海局以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四人为委员组成，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

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

上海局继续南京局的领导工作，领导蒋管区我党地下斗争，直至解放。

（二）南方局各时期的领导成员

南方局成立时，中央批准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博古负责组织，凯丰负责宣传和党报，叶剑英负责联络，吴克坚负责报馆，董必武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

组织部长博古，设秘书一人为石磊（曹瑛）。

宣传部长凯丰，设秘书一人为许涤新。

统战工作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副主任叶剑英，秘

^①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董必武率中共驻宁、沪人员由南京飞回延安。

书王梓木，委员六人。下设五个组：军事组、党派组、社会组、妇女组、青年组，分管统战工作和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党员与非党干部。妇、青两组由妇、青两委兼管。妇委由邓颖超负责，青委由蒋南翔负责，各设委员三人。

文化宣传工作委员会主任凯丰、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徐冰，委员五人。下设书店组、宣传组、文化组、新闻组等，分管文化工作和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党员与非党干部。后来凯丰同志很快离开重庆回延安，文委工作主要是周恩来领导。

国际问题研究室：由新华日报章汉夫负责，博古领导。

剑英工作处，由叶剑英负责。

南洋工作，由博古负责。

敌后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社会部：博古、吴克坚、李涛为委员，秘书周怡兼负责情报。

秘书处：由童小鹏负责（任秘书）。下分机要、报务、文书三组。

已经查实先后担任过南方局委员的还有：邓颖超、孔原、王若飞、廖承志。其他人尚未查实。

先后任过南方局候补委员的有钱之光、童小鹏等。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周恩来已在延安，以后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忙于和国民党谈判。董必武和林伯渠也将回延安。七日，中央决定让王若飞主持工作，组织重庆工作委员会，以王若飞、刘少文、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童小鹏七人为委员，王为书记。在讨论有关工作时、（许）涤新、（张）友渔、（章）汉夫等可列席。（后来董必武未回延安，实际董仍主持工作。）

一九四五年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以后，又改称为重庆局（对外称代表团）。重庆局由哪些人组成，还未查明。据了解钱瑛为重庆局的组织部长，委员有钱之光、童小鹏、徐冰等。

在重庆工作委员会时期，设有政策（或政治）研究室，董必武兼主任，张友渔、刘少文为副主任，刘昂为秘书。在重庆局时期还设有政治组。

（三）在南方局工作过的人员

1. 组织部：一九四〇年十月以前，部长是博古，后他回延安。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部长是孔原。以后刘少文（张明）和钱瑛在组织部担任过领导工作，一九四五年后钱瑛连任重庆局、南京局和上海局的组织部长（钱瑛参加上海局为委员，

仍分管组织领导工作)。

在组织部先后工作过的有黄文杰、周惠莲、廖似光、张越霞、卢竞如、曹瑛、荣高棠、龙潜、于江震、管平、季河清等。

2. 宣传部：凯丰、董必武先后任部长。华岗在重庆局时期担任过宣传部领导工作。在宣传部工作过的先后有许涤新、宋平、陈舜瑶、张剑虹、陈素、白蕾、王汶、丁红、任锐、涂国林、李亚群、张黎群、紫非等。

3. 军事组：组长叶剑英。王梓木和钱之光担任过副组长。先后在这里工作过的有李涛、边章伍、薛子正、黄若墩、雷英夫、张清华等。

4. 妇女组：组长邓颖超，副组长张晓梅。先后在这里工作过的有卢竞如、卢瑾、刘昂、罗晓红、苏静、张剑虹、邹德馨等。

5. 青年组：组长蒋南翔，后为刘光。先后在这里工作过的有朱语今、何启君、鲁明、黄若墩、张黎群、刘肃晏、黎智、李晨、周力行、魏克、曾德林、朱汉民等。

6. 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先后在这里工作过的有龚澎、李少石、罗清、傅大庆、金涛、章文晋、李汇川、陈浩、周开益等。

7. 经济组：组长许涤新，副组长洪沛然。先后

在这里工作过的有蔡北华、古念良、方卓芬、刘志诚等。

8. 发行组：组长涂国林，在这里工作过的有黄洛峰、郑德芳等。

9. 文化组：组长徐冰，副组长夏衍、冯乃超、何其芳。工作人员有张颖、张剑虹等。

10. 新闻组：吴克坚、章汉夫、潘梓年先后任过组长。在这里工作过的有许涤新、熊瑾玎等。

11. 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宣布过童小鹏任南方局秘书长，未向下传达）。秘书处除负责南方局会议通知、记录外，还管理机要、电台、文书三个科。机要科科长，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后是童小鹏兼，一九四〇年五月是刘三沅，一九四一年是邱松。电台科先后担任台长（即科长）的有申光、肖贤法、钱松甫、林青、刘澄清。文书科科长刘昂等。

（四）南方局领导下的办事处和人员

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也称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是公开对外的机构，属南方局领导。办事处处长是钱之光。下设经理科、文书科、交通科、总务科、副官科、周公馆、招待所、医务室、托儿所、车

队、仓库、警卫班。

经理科：科长赖祖烈等。

文书科：科长刘士杰等。

交通科：当过科长的有袁超俊、邱南章等。

总务科：科长邱南章等。

副官科：副官有李泽纯、岳仁和、刘露、郭端正等。

周公馆：当过馆长的有陈远绍、祝华、龙飞虎等。

周恩来随身副官先是吴志坚，后为彭海贵、颜太龙、何谦。

董必武副官伍全奎。

(五)南方局领导下《新华日报》、 《群众》杂志的人员简况

《新华日报》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创刊的。同年十月二十四日，报馆撤退到重庆。《新华日报》在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和《群众》杂志等刊物，在抗战大后方曾发挥过重要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华日报》被迫停刊。

《新华日报》在重庆时期，开始由潘梓年、吴克坚、熊瑾玎三人负责。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开始为吴克坚，以后是章汉夫，夏衍、张友渔都代理过；总经理熊瑾玎。

总编辑下设编辑部。编辑部主任先后有石西民、廖沫沙等。编辑有熊复、杨赓等。

副刊编辑有胡绳、徐光霄、郑之东（林曦）、林默涵、刘白羽、韦明、周而复、何其芳等。

采访主任先后有陆诒、石西民、刘述周等。

资料室主任洪沛然等。

秘书室主任先后有张国泰、朱世纶等。

总经理熊瑾玎领导四个单位：营业部、印刷部、总务科、会计科。

营业部主任先后有易吉光、涂国林、于刚、孙敬文（兼总支书记）、杨黎源、刘瞻、徐君曼等。

印刷部主任汤宝同。

总务科科长先后有严启文、林肖碛等。

会计科科长先后有朱端绶、杨用之。

《群众》杂志社社长潘梓年兼，主编许涤新、乔冠华（戈宝权曾代理过），编辑有周而复、郑新如、李仲和等。

二、南方局所属各省地下党组织概况

南方局领导下的各省、区地下党组织包括以下范围：

西南地区：川康、川东、贵州省、云南省、湖南

省、鄂西等省区。

南方地区：江西省、潮梅特区、粤北省、粤南省、琼崖特区、闽西特区、闽南特区、广西省、闽粤边区、湘南特区。

联络上海、江苏、香港、海外等地。

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是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一九三九年反共高潮以后，各省的地方组织进入巩固和荫蔽时期，一方面为了防止南方局在重庆的领导机关遭受突然袭击被破坏，一方面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南方局采取分区就地领导。一九四〇年，党中央决定在南方局领导下成立两个工作委员会，代表南方局就近联系各省区的地方组织，一个叫西南工作委员会；另一个叫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①。

^① 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北方局领导下，成立过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薛尚实，地址在香港。临时南委派人在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潮梅等地恢复和重建党组织。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中央派张文彬整顿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调整充实机构，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后来简称“前南委”。书记张文彬、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薛尚实。一九三八年春，长江局成立。四月，张文彬在广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前南委”，成立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组织薛尚实、宣传饶彰风。原“前南委”领导的广西、云南等地组织和广东省委均划归长江局直接领导。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以上组织改由南方局领导。南方局于一九四〇年成立了以方方为书记的新的南方工作委员会，后来简称为“后南委”。

西南工作委员会，组织上决定由孔原任书记，钱瑛、廖志高为委员。管辖川东、川康、云南、贵州、湖南、鄂西等省区。因为形势和人员的变更，虽然已经开始了一段工作，后来未能正式成立。

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书记是方方，委员有张文彬、涂振农、王涛、郭潜。王涛兼闽南省委书记。南方局决定南委成立的日期为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六日。

（一）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及所属 各省区地下党组织概况

南委书记为方方，南委机关设在广东大埔县境内。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方方回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所在地广东梅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和南方局关于成立南委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研究了有关筹建南委的具体问题，决定撤销原闽粤赣边省委（方方原来是闽粤赣边省委书记），其所属的党组织分为潮梅、闽西、闽南三个特委。会议还决定将原在闽南工作的钱兴调往广西工作，潮梅特委由姚铎负责。原粤北省委书记张文彬和原江西省委书记郭潜由南方局决定调往南委工作，原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谢育才调往江西任省委书记，湘南特委书记王涛调闽西任特委书记。

一九四一年二月，南委正式开始工作，建立了电台，并和各地党组织开始联系。南委成立后的分工：书记方方，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组织部副部长郭潜（后提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涂振农，委员有王涛（兼闽西特委书记），秘书长姚铎。

一九四一年四月，张文彬、郭潜、涂振农等先后到职。七月，姚铎也调离潮梅特委到达南委。于是南委工作逐步转入正常，和各地党组织已建立联系，开展了工作。

南委下辖的党组织计有：

江西省委、潮梅特委、粤北省委、粤南省委、琼崖特委、闽西特委、闽南特委、广西省工委、闽粤边委和湘南特委。

1. **江西省委**：一九四〇年上半年，成立中共江西省委，省委书记为郭潜。一九四一年春，郭潜调到南委工作后，由军事部长颜福华代理书记。一九四一年六月，由谢育才接任书记。

江西省委管辖赣西南、赣西北、湘赣、湘鄂四个特委。在谢育才到江西之前，赣西北、湘赣、湘鄂三个特委已遭敌人破坏。赣西南特委还保存一部分组织，特委还存在。

2. **潮梅特委**（开始叫潮梅临时特委）：是一九四一年春成立的。书记姚铎，七月姚铎调南委工作，

由林美南接任。组织部长何濬，宣传部长林美南，妇女部长方向明（方朗）。委员有李平、马士纯、张克、罗天等。改为特派员制时，林美南为特派员，副特派员为李平。

3. 粤北省委：书记张文彬调南委以后，由李大林接任。组织部长饶卫华，宣传部长原是涂振农，涂调南委后由黄康继任，副部长李殷丹。统战部长饶彰风，青年部长陈能兴，副部长张江明。妇委朱瑞瑶。

粤北省委下辖东江、西江、北江和赣南四个特委。其后，东江特委又分为前东特委和后东特委。前东特委书记为尹林平，后东特委书记为梁威林。北江特委又分为前北特委和后北特委。前北特委书记为黄松坚，后北特委书记为李守纯。西江特委书记为冯燊。

4. 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组织部长王均予，宣传部长石辟澜，妇女部长邓戈明。

粤南省委下属组织有：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南路特委，书记周楠；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原叫粤中特委），书记罗范群。

5. 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副书记林李明，组织部长王白仑，宣传部长陈健，统战部长黄魂，民运部长欧绍汉，委员有庄田等。

6. 闽西特委：书记为王涛，一九四一年十月王涛牺牲后，由魏金水接任。委员有范元辉、陈卜人、

张招娣等。

7. **闽南特委：**书记为朱曼平。组织部长林路，宣传部长李碧山，委员有卢叨、林鸟鳅、郑敦等。

8. **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副书记苏曼，组织部长黄彰，宣传部长彭维之，妇女部长罗文坤。

9. **闽粤边委：**一九四二年初成立。特派员朱曼平，副特派员张招娣，具体领导闽西南和粤东的工作。联络员李碧山，代表上级领导机关与边委联系。

10. **湘南特委：**负责人周礼。

南委成立时，正是国民党反共高潮时期。南委根据南方局指示，以巩固党组织为中心工作，继续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政策，停止党组织在社会上的公开活动；要求党员实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开展审干、整风、革命气节教育和调查研究工作。

一九四一年，由于共产党员被逮捕等事件不断发生，南委指示各地党组织，贯彻南方局指示，做好党的隐蔽工作，改变活动形式。六月，根据南方局指示，为巩固党的组织，决定由党委负责制改为特派员负责制，实行单线联系，不开会议，建立单线组织。

一九四二年二月，张文彬主持召开粤南省委扩大会议，宣布撤消粤南省委，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它统一领导东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党政军的工作，林平为书记。原准备将粤南省委与粤北省委合并成立广

东省委；东江地区与潮梅特委合并成立粤东省委，后因南委领导机构遭敌破坏，而未成立。

一九四二年二月，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到东江部队。他调整加强东江部队的领导，整顿健全部队建制，成立司令部和政治部，为后来东江部队的壮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四川省地下党组织概况

（川东、川康特委）

一九三五年前后，四川地下党遭叛徒出卖，几乎全被破坏。一九三五年张曙时到四川，进行了些统战工作。一九三六年，发展了党组织。抗战开始，一九三七年张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后，中央派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又返四川，进行建党工作。随后党中央派罗世文以中央正式代表身份来川与地方势力建立联系。在地方势力中开展统战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月，党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等六人从延安回四川，恢复和重建四川党的组织，在成都与张曙时汇合，筹建四川省工委。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任副书记、于江震任委员。后于去南充，筹建川北工委。

省工委成立后，以成都、重庆为重点，清理党员和党的组织。

一九三八年二、三月份，省工委迅速在一些地区建立党组织，将重庆特别小组改组为重庆市工委（成立市工委是罗世文决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省工委批准的），书记漆鲁鱼。三月，在泸州成立川南工委，书记万静修。同月，建立万县特支，书记欧阳克明；梁山特支，书记赵章明。同月，成立成都市委，书记杜桴生。

一九三八年五月，建立重庆市委，六月廖志高到重庆兼书记。重庆市委实际负责开展川东地区工作。

一九三八年七月，成立宜宾和泸州两个中心县委，廖寒非、李亚群分别任书记。

一九三八年十月，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四川省委问题。这时王明、林伯渠、吴玉章等路过成都，经商量决定不成立省委，分别成立川东、川西两个特委。川西，于一九三九年建立西康省后，改为川康，包括成都、川西、川北、川南一部分和康边。川东，包括重庆及川东一带的万县、涪陵、泸州、宜宾等县。

川康特委书记为罗世文，副书记邹风平，组织兼工委书记程子健，宣传兼文委书记郑伯克，统战张曙时，青委韩天石；川东特委书记为廖志高，组织宋林，宣传漆鲁鱼。川东、川西特委成立后，即直属南方局领导，同时撤销成都、重庆两个市委。这时，全省党员

已发展到三千四百余人（一九三八年四月以前，四川省工委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四月，改由长江局领导。长江局要求大量发展党员，全川发展的党员，到十月底相当原有党员的十倍）。

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一般停止发展党员，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四川省地下党重点转入整顿巩固组织阶段。

一九三九年十月，川康特委辖区建有宜宾、嘉定、阆中、遂宁、三台五个中心县委，自贡中心市委和西昌工委；川东特委辖区建有泸州、梁大、合川、南充四个中心县委。

一九四〇年一月，川东特委重建重庆市委，书记王致中。一九四一年二月，建立广安中心县委，书记陈野苹；同时建立巴县中心县委，书记先后为欧汝钦、肖泽宽。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国民党利用成都“抢米事件”，造谣诬陷共产党，捕杀《时事新刊》编辑、党员朱亚凡，逮捕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车耀先等十余人，开始大规模地有计划地破坏党的地下组织。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指示南方局，要整个南方的党组织严重警惕，立即将暴露的党员调动隐蔽。川康、川东两特委，加紧疏散了暴露的党员，将干部派往外县或

疏散下乡，或送南方局分配，或送延安。南方局将邹风平、张曙时等转移去延安。以程子健代理川康特委书记，于江震为组织，郑伯克仍为宣传，继续坚持工作。

一九四〇年五月，中央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一九四〇年六月，川康特委重建成都市委，书记侯方岳。川东特委决定成立涪陵五县工委（涪陵、长寿、丰都、忠县、石柱），书记张显仪。七月，成立成（都）华（阳）中心县委，书记刘清。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为应付敌特破坏和适应工作环境，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二月，发出疏散大后方党员干部的指示；五月连续发出关于撤退干部和执行“荫蔽精干”政策的指示。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对四川党组织采取了以下措施：

1. 一九四一年二月，荣高棠由川东调任川康特委书记，委员孙敬文。六月份以后，荣高棠和孙敬文相继调离川康，荣到南方局，孙到川东。将王致中由川东特委调川康特委工作。

2. 划小工作区域，精简领导班子。四川党的组织划为四个，除川东和川康特委外，新成立川北和川南工委。川北工委书记为李维，委员杜桴生；川南工

委书记为于江震，委员张文澄。不久，于、张调南方局，川南工委所属工作交川康特委。

3. 南方局直接掌握一些工作，和一些党员建立联系，个别领导，不与地方组织发生关系。

4. 督促各地方组织严格执行中央指示：撤退暴露的党员；不建支部，独立作战，个别联系；转地不转党，失掉关系不准乱找；党员要社会化，职业化。

一九四二年六月，南方局批准正式组成新的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委员马子卿、王栋。

一九四三年，四川地下党组织继续处于荫蔽精干阶段。八月，廖志高调南方局工作，川东特委撤销。南方局派孙敬文联系上川东地区，曾淳联系下川东地区。原属川东特委的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一九四一年四月被破坏后，川东特委先后派欧治仁、廖林生去清理。一九四三年欧治仁被捕牺牲；廖林生和南方局失去联系，在古蔺一带坚持工作，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才和南方局联系上。

川康地区，由南方局派漆鲁鱼、黄觉庵等分别在雅安、西昌工作，在成都有南方局和川康特委领导的平行关系。当时，特委以下几乎没有固定形式的党组织，只有上下级之间的个别联系，有组织联系的党员很少。多数人失去党的关系。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中央批准成立四川省委，

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王去延安后为张友渔）。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在重庆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在四川设立省委和吴玉章、王维舟的省委领导职务。五月，南方局领导人及大部分工作人员去南京（在南京成立南京局，书记周恩来，南方局撤销）。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和省委书记身份在重庆公开活动，开展统战工作。四川省委承担了南方局领导川、康、滇、黔地区党的工作。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省委和《新华日报》全体人员分批撤走。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指示，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的地下党组织由上海局管辖。七月至十月，川康、川东的党组织相继和上海局接上关系，由上海局委员钱瑛（原重庆局、南京局的组织部长）以上海局成员的身份，在上海（以后在香港成立分局）领导西南地区党的工作。

（三）贵州地下党组织概况

一九三四年初，由林青、秦天真、缪震元在毕节县组成贵州省第一个党支部。以后他们在贵阳和安顺等地发展了党组织。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到遵义，林青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决定建立贵州省工委，由林青、

邓止戈、秦天真组成，林青任书记。这时在遵义建立县委，在安顺建立县工委，在黔西、大定、毕节等十多个县建立支部、小组，发展了党员。

一九三五年七月，林青、刘茂隆等十一人被捕，林青牺牲。

一九三八年二月，党中央派邓止戈、秦天真由延安回贵州省工作。经过武汉时，长江局组织部长博古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重建贵州省工委，由邓止戈任书记的决定。以后，贵州党的工作曾有很大的发展。

一九四〇年三月，南方局召邓止戈去重庆，指示贵州党组织紧急疏散，同时建立荫蔽的新领导班子，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政策。邓止戈完成任务后，撤回延安。秦天真因暴露，也于同年四月撤回延安。

一九四〇年五月，南方局指示贵州省建立临工委（名单已上报，尚未来得及审批；会上说过，是临时的），成员有邓止戈、陈于彤、张述成、杜守敦、肖次瞻，任务是将已暴露的党员骨干转移出省，留下的同志分六个地区，单线联系，坚决贯彻白区工作“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这个时期，国民党开始在全省大逮捕，迫害党员。六、七月间，肖次瞻等多人先后被捕。九月，邓止戈去平越县，在“唐山交大”受牵连被捕，因没有被敌特发

现身份，买通看守逃出，撤回南方局。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形势日益紧张，陈于彤回南方局汇报工作，留在南方局。后张述成也撤回南方局。关押多年的黄大陆、李策、张益珊、凌毓俊、王轼、严金牲和被捕不久的肖次瞻、陈光型、陈法轼、李绍夫、兰芸夫、王定一、寇叔彭、王启霖、刘家祥夫妇等，先后被国民党杀害。

一九四一年秋、冬，赵促成被捕叛变，黔西北农村基层组织，几乎全被破坏。这个时期，一部分党员被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分党员转到省外隐蔽活动，因为转地不转党，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部分党员就地长期埋伏下来。极少数人发生动摇、消沉；个别叛变。

一九四一年，贵州地下党组织和南方局失去了联系，但有些基层组织和个别党员仍在活动。

一九四二年春、夏，南方局先后派张黎群、李白蕾、李晨（李振穆）、赖卫民等到贵州做党的工作。要他们各自利用社会关系，站稳脚跟，找到一些外省转去的党员的下落，接上关系；用单线联系的方法组织起来，稳步开展工作，重新建立贵州党的组织。当时南方局考虑到贵州原地下党组织已遭严重破坏，联系不上，不了解情况，要他们不要和贵州原有地下党组织的成员发生联系，以防牵连被破坏。

张黎群和李白蕾、唐以荣在乌当，李晨在安顺，赖卫民在普定。后来李晨、赖卫民在遵义、湄潭重点领导浙江大学（当时从外地搬迁到贵州）的工作，并开展贵阳和安顺的工作，没有和原贵州地下党员联系。

一九四四年冬，国内外形势好转，大后方的民主运动高涨，学生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一九四五年，在南方局领导下，浙江大学发展了一批党员。

一九四六年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党员纷纷离开贵州，李晨、赖卫民先后调回南方局。

一九四三年，四川古蔺中心特委和川东特委也曾派人到大定、绥阳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因为遭到敌人破坏，和执行“荫蔽精干”政策，贵州党组织和南方局失去过联系，分散在各地的党员和上海局或四川、云南、广西等六、七个地下党组织有联系。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长期在贵州隐蔽的党员，相继组织起来，掌握武装，配合解放。

一九四八年秋，川东临时工委派张立（原贵州地下党员）和刘溶铸到贵州工作，后由南方局直接领导。

一九四九年初，上海局华南分局决定建立贵州省工委，归分局直接领导。由张立、刘溶铸、蔡之诚（未到职）三人组成，张立任书记。

一九四八年冬，上海局从北平、上海派姚国安、梁燕、安毅夫、黄培正到贵阳，组织贵阳特别支部，姚国安任书记。

一九四八年，川东地下党涪（陵）、南（川）工委派向国灵等人去黔北工作。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滇桂黔边区向贵州地区发展武装斗争。有两个地委向贵州省发展党组织：一个是罗盘地委在贵州建立了兴（义）、安（龙）工委（书记是龙树德）和盘（县）普（安）工委（书记是何志翔）。另一个是滇东北地委在黔西地区，也发展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在贵州建立起几支游击队伍。这些游击团、游击部队多属滇桂黔边区纵队领导。

此外，一九四九年，钱瑛在武汉通过武汉城工部，派涂月僧去贵阳开展对国民党保安副司令×××的策反工作，湖北江汉军区派肖良汉到贵阳师范学院开展工作。

（四）云南省地下党组织概况

一九二六年云南开始建党，一九三〇年以王德三为书记的云南省工委遭到破坏。

一九三五年上海特科王子和派李浩然到昆明，发展了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同年十月组成中共云南临时工委。一九三七年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

委^①书记薛尚实也派出李群杰到昆明发展党组织，同年九月成立中共昆明支部。

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长江局派巡视员马子卿到昆明，处理云南上述两个平行组织的问题。八月合并这两个组织，暂定为云南特委。指定李群杰为书记、陈方组织、唐登岷宣传、吴宗遥工运、费炳军运（滇军工作），以上五人为特委委员。

武汉失守前，马子卿由昆明回武汉汇报云南工作，后来撤退到重庆。

一九三九年一月，南方局批准将云南特委改组为云南省工委，省工委成为云南省党的领导机构，并派马子卿二次到昆明传达上述决定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

一九三九年三月，马子卿改组云南省工委，由费炳代理省工委书记，委员除陈方、唐登岷、吴宗遥、李群杰外，增加了刘碧华，赵国徽二人。根据工作需要，让李群杰利用社会关系改作情报、统战工作，和马子卿单线联系。

一九三九年四、五月份，马子卿回重庆向南方局

^① 一九三六年六月，北方局派薛尚实到香港恢复并建立广东党组织，派王钧予到广西建立党组织。同年九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薛尚实，委员有饶彰风、莫西凡。南委成立后，薛尚实派出李群杰到云南省。

汇报工作。同年六月，南方局派马子卿、何礼到昆明参加省工委。南方局决定由马子卿任省工委书记，委员为：青委何礼，组织费炳，宣传唐登岷，统战李群杰，职工委吴宗遥。陈方、刘碧华、赵国徽和新增加的省工委委员李剑秋分别联系若干党员或外地党组织的工作。

省工委于一九三九年七月成立青委，书记何礼，宣传胡昌治，组织郭佩。

一九四〇年八月，南方局派杨天华（任在）到昆明。九月，省工委组织委员由费炳改为何礼。何仍兼管青委工作。青委书记为杨天华，委员为：袁永熙，劳辛，李之楠。

一九三八年，云南省工委设立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吴宗遥，委员刘浩、叶利芬。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叶利芬改为吴世霖。

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四一年四月，省工委在云南继续领导和发动群众掀起抗日高潮。在城市、农村和滇军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军皖南事变前后，地下党员人数约三百人，其中西南联大学生党员六十余人，其他大中学校党员约六十人，职工党员六十余人，昆明市妇女党员十多人，滇军中党员十多人。其余分散外县。

一九四〇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根据南方局指

示，省工委开始疏散干部。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大批疏散云南干部。一九四一年四月，南方局派涂国林到昆明准备参加省工委领导工作。马子卿将云南一些党员关系交给了涂国林。六月，南方局又派郑伯克到昆明接替马子卿的工作，涂国林又将党员关系交给了郑伯克。何礼、马子卿、涂国林先后调离云南。

一九四一年大疏散以后，郑伯克负责云南工作。将省青委、省职工委撤销，在昆明的一部分统战工作、青年工作、职工工作分别改由刘浩、黄若墩，林震峰负责。

早在一九四〇年冬，省工委由昆明疏散一批干部到外县，建立了若干中心县委和县委。如袁永熙到个旧，李晨到沪西，李之楠（李志强）到大理等。“皖南事变”后，除省工委外，外地建立的中心县委、县委均被撤销，改为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有些党员疏散外地，因执行“转地不转党”的政策，被停止了组织联系，没有再接关系。一九四〇年冬和一九四一年，整个云南大疏散干部期间，除三人被捕投敌外，云南地下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

郑伯克到云南后，南方局决定费炳、李群杰等其他省工委委员，分散隐蔽在云南坚持工作，不再参加省工委。

南方局决定，一九四二年七月成立新的省工委。

由郑伯克、侯方岳（一九四一年十月到昆明）、刘清（一九四二年七月到昆明）三人组成，书记郑伯克。省工委贯彻“荫蔽精干”的方针，不设部、委，不建立固定的机关。省工委会议，主要研究形势、方针、政策等问题。省工委分工：郑伯克掌握全面，分管统一战线、昆明市及滇西工作；侯方岳分管滇东北地区；刘清分管滇东、滇南地区。组织工作由郑伯克分别与侯、刘二人研究。

一九四七年初，刘清到罗平蹲点，准备武装斗争，一九四八年秋转到桂滇边工委地区工作。一九四七年冬，增加张华俊为省工委委员，分管滇南工作。一九四九年初，南方局调走侯方岳，另行分配工作。同时调李雨枫参加省工委为委员，同张华俊一起分管滇南、思普区根据地工作。

新的省工委，贯彻“荫蔽精干”的方针。有的地方暂停发展党员，主要是号召党员认真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广泛联系群众，深入做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一九四四年秋，日军占领贵州独山，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益不满，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省工委在一九四四年冬到一九四五年春，在进步群众中建立了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外围团体：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民主工

人同盟（简称工盟）、新民主主义联盟（简称新联）。这些组织，在民主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实现和平、民主，渴望重建家园。但国民党反动派，却阴谋发动内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省工委在昆明领导了“一二·一运动”，在党中央的号召与关怀下，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时席卷了全中国。在“一二·一运动”之后，昆明广大青年及群众又经过多次群众斗争，得到了锻炼。民青、工盟、新联等党的外围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党的组织也逐步发展。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郑伯克到昆明时，全省党员总数约三百人，接上关系、恢复联系的二百多人。部分党员转移到外省或停止联系。至一九四六年，全省党员发展到约二千人，一九四八年末约五千人，一九四九年七月前将近一万人（包括滇东南地区）。一九四九年七月滇桂黔区党委成立后，决定大量发展党员，不久党员人数又有增加。

昆明市：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七年六、七月，西南联大、云大等重点学校党组织，主要由郑伯克直接联系。

一九四七年六、七月以后，由陈盛年、高彤生、陈家震、袁用之等逐步组成昆明市工委。一九四八年

十一月以后，组成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委员赖卫民、杨夫戎。

滇东北：沾益、宣威、昭通等地，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九年初，由省工委侯方岳直接联系各县。一九四九年成立滇东北地委，李祥云（德仁）为地委书记。

滇东南：滇越铁路以东，曲靖、平乙公路以南，盘江南北两岸地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八年秋，由省工委郑伯克、刘清、侯方岳先后分别联系过若干县。盘江南岸成立过开广工委，书记岳世华。一九四八年五、六月，滇东南地区划归粤桂边工委（后改为桂滇边工委，书记周楠），先后建立了三个地委：一九四八年九、十月建立罗盘地委，书记刘清，副书记杨江；一九四九年建立弥泸地委，书记祁山，副书记陈光逵；文山地委，书记饶华，副书记庞自。

滇南：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六月，由省工委郑伯克、刘清联系。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成立滇南工委，先后由马识途、张华俊（一九四七年末为省工委委员）任工委书记。一九四九年夏，滇南地区建立两个地委：思普地委，书记张华俊；蒙自地委，书记岳世华。

滇中：一九四六年建立峨山县委；一九四八年建立滇中工委，管理玉溪、昆阳、晋宁、易门、通海、河西、澄江、江川、新平、峨山等县的工作。一九四

九年建立滇中地委，书记温宗姜。

滇西：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因为实行荫蔽精干政策，大理、楚雄等地下党组织停止联系。不少党员在失掉组织关系的情况下，坚持或转移地区工作。一九四七年省工委派黄知廉（黄平）、欧根、王以中等到剑川建立了滇西工委。一九四九年分别建立了三个地委：滇西北地委，书记黄平；滇西地委，书记陈家震；保山地委，书记王以中。

滇北：武定、元谋、嵩明、禄劝等县，一九四九年建立滇北地委，书记李天柱。

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华南分局派李明（林李明）来昆明，传达分局通知，撤销云南省工委、桂滇边工委，成立滇桂黔边区党委，以李明为书记，周楠、郑伯克为副书记。原云南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均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以庄田、朱家璧为正副司令员。一九四九年八月，在滇东南邱北县阿猛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会上选举李明等十一人为委员，若干人为候补委员。李明为书记，周楠为副书记，郑伯克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郑敦为宣传部长，杨平、李岳生（张子斋）为纵队政治部正副主任（后杨平调走，主任为李岳生）。

区党委决定：陈盛年等组成昆明市委；李祥云等组成滇东北地委；刘清等组成罗盘地委；祁山等组成

弥泸地委；饶华等组成文山（开广）地委；岳世华等组成蒙自地委；张华俊等组成思普地委；黄平等组成滇西北地委；王以中等组成保山地委；陈家震等组成滇西地委；温宗姜等组成滇中地委；李天柱等组成滇北地委。

区党委还决定，边纵所属编为十二个支队，两个独立团。主力部队共三万多人，其中广西左右江两个支队，云南一个支队的活动地区，大部分在贵州境内。

一九五〇年二、三月，二野四兵团进军云南。中共云南省委成立，书记宋任穷，第二书记陈赓。滇桂黔区党委结束，李明、郑伯克、庄田等参加云南省委为委员。边纵武装归云南、广西、贵州三个军区分别编入各部队。

（五）鄂西地区地下党组织概况

鄂西地区地下党组织，原由中共湖北省工委、省委领导。湖北省工委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月改为临时省委，书记郭述申，副书记陶铸。次年一月，正式成立省委。六月，省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由十五人组成的新省委。书记兼军委郭述申，组织部长兼妇委钱瑛（女），宣传部长何伟，秘书长兼工委王翰，农委方毅，青委杨学诚，省委委员还有王致中、何彬（即何功伟，后继方毅为农委）、姜纪常（后继杨学诚为

青委)、郑位三、王亦清、刘青,候补委员田家福、王曦(女)。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鄂西地区地下党组织遂划归南方局领导。

1. 武汉失守前鄂西党组织情况。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沙市建立了鄂西中心县委,十月迁宜昌。书记王致中。管辖沙市、宜昌等十一县。

在此期间,湖北省委特派员雍文涛在恩施建立了施南特支。

2. 武汉失守后湘鄂西党组织情况。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湘鄂西区党委成立。书记钱瑛,组织部长蔡书彬,宣传部长曾一凡(曾杞凡),委员还有王致中、曾惇。机关设在宜昌。不久,程时(程全楚)任青委。九月,何功伟增补为委员,任宣传部长。区党委工作范围包括鄂西二十七县和湘西北五县,辖有:

(1)沿江(江北地区)工委:书记王致中。辖宜昌、秭归、兴山及巴东、松(滋)枝(江)宜(都)江北地区。

(2)江南(松枝宜江南地区)工委:后改为松枝宜中心县委,魏泽同、唐亚子、李东波先后任书记。

(3)恩施工委(亦称鄂西七区工委):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成立,管辖巴东江南地区和以恩施为中心的第七区所属七县。书记李声簧未到职,由副书记魏泽同代理,后由曾一凡任书记。一九三九年四月,工委

改为鄂西七区特委，书记李声簧仍未到职，由副书记魏泽同代理。不久，特委撤销，建立了恩施中心县委（书记魏泽同）和来凤中心县委（书记魏西）。十月，又重建鄂西七区特委，书记马识途（马千木）。

（4）江陵中心县委：一九三九年内成立，书记魏西（彭维西）。管辖江陵、沙市等县。

（5）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原为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南华工委，一九三九年二月改为中心县委，书记曾惇。划归湘鄂西区党委领导后，改为南华安特委（辖南县、华容、安乡、澧县、公安、石首），曾惇、魏泽同先后任特委书记。

3. 宜昌失守后湘鄂西党组织情况。一九四〇年六月宜昌失守，钱瑛、何功伟为主要领导人的湘鄂西区党委撤至恩施。八、九月间，钱瑛被调到南方局工作，何功伟接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据钱瑛回忆，何任书记为春季）。在此前后，区党委辖有：

（1）江陵中心县委：一九四〇年六月，书记曾惇。十月，书记陈约珥，改由鄂豫边区党委领导。

（2）鄂西特委：一九四〇年七、八月间，由鄂西七区特委改组而成，书记何功伟，副书记马识途。为了便于领导，特委以恩施为中心，分为南北两路：南路成立咸（丰）来（凤）中心县委，杨弟甫负责；北路成立建（始）巴（东）中心县委，书记陈克东。又

成立归兴巴宜工委，书记李世荪。

(3)湘鄂边特委：蔡书彬、曾惇先后任书记。辖南县、华容、安乡、常德、松滋、枝江、宜都、石首、公安等县。

4. 皖南事变前后湘鄂西党组织情况。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鄂西特委书记何彬、秘书刘惠馨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此前后，鄂西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大批党员和群众被捕，何彬、刘惠馨等英勇牺牲。在钱瑛的指导下，鄂西特委其他成员主持了紧急撤退和就地隐蔽工作。有的干部、党员转移到大后方或敌后，有的失去组织关系长期埋伏下来，有的失去组织关系四处找党，但鄂西党组织未再恢复，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才重新建立组织。

湘鄂边特委坚持了较长时间，一九四一年十月唐亚子任特委书记，次年七月周进前、张泽生为负责人。一九四三年九月，石公华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湘鄂边特委仍由周进前领导，划归鄂豫边区党委管辖。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周进前及其妻夏梦蝶、交通员王洪奇（王锡信）被捕牺牲，党组织被迫暂停活动。一九四七年六月，党又派魏恒若来这一带活动，恢复地下党组织。一九四八年建立湘西工委，书记方用。

（六）广西省地下党组织概况

一九三八年三月，长江局领导下的南方工作委员会（前南委），为整顿广西地下党，派黄松坚回广西任省工委书记，原省工委书记陈岸及原省工委委员黄彰、彭懋桂为委员。同时，派莫西凡为南委巡视员，随黄一同到广西工作。

省工委在南宁开会，决定整顿组织，重新登记党员。省工委分工：由黄松坚负责右江，莫西凡、彭懋桂负责南宁，陈岸负责桂林，黄彰负责玉林。

一九三八年四月，黄松坚、莫西凡、彭懋桂等五人被捕，前南委指定陈岸为省工委书记。是年底，由陈岸通过前南委张文彬，经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营救黄松坚等出狱。黄调广东工作。

一九三八年六月，右江特委书记黄桂南叛变投敌，那马中心县委和向都中心县委遭受严重破坏。

一九三八年十月，省工委机关由南宁迁到桂林。桂林由李克农主持成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中央指示，省工委以后由桂林办事处负责领导。

一九三九年六月，桂林办事处的石磊（曹瑛）通知：南方局决定，撤销广西省工委，分设三个特支，直属桂林办事处领导。三个特支是：桂（林）柳（州）特支，书记陈岸；玉（林）梧（州）特支，书记黄彰；南

宁特支，书记王文（黄书光），副书记林鹤逸。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南委又派原闽粤特委（后改为漳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钱兴、苏曼等来广西重建省工委。钱、苏分任正副书记，黄彰任组织部长，彭维之任宣传部长。省工委设在桂林。在桂东南地区，设立桂东南区工委，由黄彰、吴家宜任正副书记。

一九四一年一月，桂林办事处撤退。二月，南宁特支改为桂西南工委，由黄书光任书记，林鹤逸任副书记。

一九四一年八月，南方局周恩来派李亚群、刘隆华、徐鸣、孙士祥等到桂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中共南方局广西统战工作委员会（又称南方局广西统战部），联系和开展桂系军阀内部的统战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大批党员和文化界进步人士转移到桂林，周恩来派张友渔到桂林，协助李亚群安置转移来桂林的同志。

一九四二年五月，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到广西检查工作，二十六日返回广东曲江时被捕叛变，出卖广西党组织，南委也遭到严重破坏。南委负责人、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被捕牺牲。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省工委被破坏，副书记苏曼，桂林市委书记兼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市委委员张丽贞、梁耀宝，省工委组织部长彭维之等二十九

人被捕。书记钱兴脱险，工委机关转移到灵川乡下。此后一段时间，省工委和南委失去联系。

一九四三年一月，彭维之叛变出卖组织。十三日，玉林地方党组织遭破坏，五十多人被捕；十五日，南宁、龙州、武鸣等地组织被破坏，六十三人被捕；同日，柳州组织被破坏，七人被捕。

一九四三年二月，省工委副书记黄彰在武宜县召开骨干会议，研究把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和边远山区，重新整顿右江老区，开辟桂越边界工作。年底，省工委和上级党取得间接联系（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才直接和南方局华南分局联系上）。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桂林沦陷。十一月二十四日，南宁二次沦陷（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次沦陷，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收复）。十二月，广西省工委选派大批党员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创建了柳北人民抗日挺进队、武鸣抗日义勇队、灵川政工队、贵县抗日自卫队、桂东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

一九四五年九月，钱兴、庄炎林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后回来，成立桂林市工委，庄炎林为书记。当时省工委所辖的党组织只有两个区委：玉林和桂南区委；三个县委，二十六个县特支。

一九四六年三、四月，廖联原经陈毅、张云逸介

绍回广西武宣，组建人民解放军达开纵队。廖任司令，九月举行中秋起义。

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钱兴到香港向方方汇报，恢复和华南分局的领导关系。华南分局派陈枫、李福海为桂柳区正副特派员，领导和发展“新线”，不与原广西地下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新线”是魏南金在平乐地区审查“南委事件”后，由从广东疏散来广西隐蔽的广东党员组成的）。

一九四七年六月，广西省工委撤销，桂西地区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属滇桂边领导，桂南地区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属粤桂边领导。

同月，钱兴调广东省工作，桂柳地区组织关系交陈枫领导，“新线”与桂柳地区党组织合并。

一九四七年七月，桂柳区工委成立，陈枫任书记，机关设柳州，归广东省西江党委领导。八月，右江地委成立，区镇为书记，余明炎为副书记。十月，右江支队成立，司令员莫西凡。

一九四八年三月，粤桂三支队成立，司令员谢玉岗。七月，桂中南地委成立，杨烈任书记。

一九四九年一月，撤销桂柳区工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陈枫任书记，直属华南分局领导，辖四个市：桂林、柳州、南宁、梧州。还成立了广西省农委，书记李殷丹，直属华南分局领导。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万大山地委成立，书记陈明江；六万山地委成立，书记陈华；桂东地工委成立，书记黄传林。九月，桂北工委成立，书记莫矜。十月，中共广西省委于汉口成立，书记张云逸，副书记陈漫远、莫文骅、何伟、李楚离。十二月十一日全境解放。

（七）湖南省地下党组织概况（略）

在南方局工作的片断回忆

孔 原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坚持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里，领导中国南部地区我党的组织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及广大群众，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南方局在它的整个斗争历程中，坚定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运用了党的“三大法宝”，并在实践中有所创造和发展，在建设党的组织、发展统一战线和领导武装斗争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南方局的革命历史，前后约八年之久，而我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仅仅三年（即一九四〇年五月随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去重庆，一九四三年六月又同周恩来同志一道返回延安）。时间短，且仅参加了南方局领导下的部分工作，局限性很大，又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一些事情，虽是亲身经历，但已记不太清了。现在只

能将一些片断情况作概略的回顾。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重庆正式成立的。最初南方局的常委有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凯丰（何克全）、董必武、叶剑英、吴克坚等同志，书记是周恩来。南方局的任务是负责全面领导中国南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鄂西、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港澳等省市和地区）我党的工作。但因周恩来既是南方局书记又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为便利工作，东南局也同南方局发生联系，受周恩来同志领导。

正当南方局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国民党政策的一个转折。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改变了它对中国的策略：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转移其主力来对付我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为求与日妥协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亦把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与日寇相呼应，妄图达到消灭我党的目的。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总方针，秘密通过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接着，国民党封锁边区，挑起磨擦，残杀八路军、新四军留守人员；在大后方，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大肆破坏我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爱国青年及进步人

士，掀起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对于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洞若观火。认为国共虽然合作了，但两党的统战关系是不牢固的，在联合的时候，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和顽固派也要利用它的特务机关采取各种手段来反对和破坏我们。对于国民党从五中全会后走向反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反共破坏活动，我们党亦有所预料。因此，我党中央及时地发表了宣言，公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同时，对党内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组织，转变领导方式和斗争方法等决定，以使党的整个工作适应变化中的形势，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长期斗争。

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一方面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同蒋介石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坚决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实行荫蔽精干政策，加强党内教育，积极清理整顿所属各级党组织，采取巩固党的各种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组织，十年内战期间，除北方党组织以外，绝大部分遭到完全破坏。大后方的党组织，基本上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形势下重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武汉时期，又曾受到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在大量发展党员的运动中，拉进了一些不合条件的人和投机分子，甚至国民党特务、三青团分子也混入了党内；组织不严密，不隐蔽。党员干部不少习惯于出头露面，搞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救亡活动。因此，要使党的组织真正作到巩固、荫蔽，转变过去的一套作风和办法，很不容易，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南方局为了加强对所属各地党组织的领导，采取了把南方局的公开活动尽可能和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分开的办法。这样做，也是为了在国民党公开破裂统一战线，我党驻国统区的公开代表机关无法存在时，仍有领导机关坚持领导地下党组织的斗争。一九四〇年党中央、南方局决定在南方局之下设立两个地区性的工作委员会。一个是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管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区工作。方方任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涂振农、王涛、郭潜是委员。南委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遭到国民党破坏，涂振农、郭潜、张文彬等相继被捕。涂、郭叛变，张文彬同志英勇牺牲。另一个是西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南工委，管川东、川西、云南、贵州、湖南、鄂西等地区，书记是孔原，参加西南工委领导工作的有钱瑛、廖志高等同志。

我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随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到重庆的，同车去的还有徐冰、赖祖烈、张晓梅、刘昂、

许明、康岱沙等留在南方局工作的同志们。为了便于荫蔽下来搞党的秘密工作，到红岩后，让我与童小鹏同志他们的“鸡鸭行”^①住在一起。“鸡鸭行”在办事处的最顶上一层楼，房间又矮又小，夏天很热。但是，比较清静，接触范围小，可以减少与人交往相识。大概在七、八月间，我同许明同志离开红岩到了重庆市郊江北木洞镇，秘密开始了西南工委的筹组工作。我的公开职务是广大华行（卢绪章、舒自清等秘密党员开办）的老板。很快我们建立了机关，共三、四个人，很精干。接着同川东、川康、鄂西等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与此同时，钱瑛同志去了成都联系川西党组织的工作。我们西南工委的工作就算是开始了。

但为时不久，在“皖南事变”前夕，周恩来同志从国民党内部我们的朋友处，获得一份国民党开列的关于我党在西南搞秘密工作人员的名单，上面第一名就是我的名字——陈铁铮。恩来同志还了解到有两个认识我的大叛徒在重庆，采取了紧急措施，立即派人通知我和许明马上转移上山，回到红岩。

因原任组织部长博古已调回延安，分配我接任组织部长。这时，还没有宣布取消西南工委，工委的一些工作转到南方局内进行。不久又派钱瑛以特派员的身份指导川康特委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皖

① 指南方局秘书处第一科（机要）和第二科（电台）。

南事变”，成都的形势很紧张，工作无法开展，钱瑛也回到红岩。应该说，从这以后西南工委实际上就不存在了。

我在南方局工作三年中，在组织部工作有两年多，即从一九四〇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夏。在这期间，先后在组织部工作过的有钱瑛、廖志高、荣高棠、于江震、龙潜、高文华、廖似光、张越霞、林蒙、管平等同志。组织部的工作，是负责党员干部的管理教育、审查党员、清理组织、调配选拔干部、整风审干、联系部分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及帮助一些失掉联系的同志恢复和转移关系等等。而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继续巩固党的组织。

党中央鉴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地区党组织在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鉴于时局的变化，自一九三九年以后，就一再指示大后方和敌占区的党组织，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务必使各级党组织真正作到既精干又荫蔽，坚决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南方局为贯彻中央这一方针，进一步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还把一些地区的负责人调回红岩，由南方局的负责人和组织部的同志分别和他们谈话，同他们一起学习研

究有关问题。并多次下指示，督促各地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

例如，一九四〇年夏，南方局向各所属省委、特委发出《紧急通告》，其中指出：为了巩固我们的组织，必须坚决改变我们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立即从半公开的组织形式转到地下党的形式；缩小领导机关，实行个别联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坚决撤退已暴露的干部，强调一切组织和每一个党员绝对遵守最近所发的秘密工作通知，违者必须受到处罚，直到把整个组织解体（重新组织）和开除党员出党。一九四〇年秋，南方局召来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分别同他们谈话，耐心阐述“荫蔽精干”方针的重要性，与之研究如何审查干部及彻底改变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等问题。一九四一年夏，南方局召集会议，讨论了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决定重新配置干部，使地下党的组织与公开机关脱离联系，完全转到地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南方局再一次调回原西南工委各省、特委的负责人到红岩，总结两年来的工作，讨论和布置今后的工作。会上，周恩来、董必武等反复强调了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荫蔽精干”的方针。同时指示南委召开会议，总结南委成立以来的工作，检讨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方针的情况，拟定以后如何执行的措施。一九四二年，在南委遭到

国民党破坏前后，南方局曾多次指示南委，坚决实行“隐蔽组织，深入社会”，“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路线，并要方方同志等立即撤退。

南方局在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方针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方针以及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措施。

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周恩来同志在南方局召集的总结两年来的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的七项条件^①，就是根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个方针提出的具体原则和具体方针。在改变党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上采取了以下一些权宜措施：在一个单位或部门允许建立三个以上的平行支部；由南方局组织部直接管理一部分问题较多的支部，直接管理执行特别任务的党员；广泛实行单线联系；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多则二、三人，少则一人，不设固定的机关；改变领导方式，禁止三人以上的会议，规定各级干部接头限期；取消巡视制度等。在选拔使用和教育干部上，除党中央的规定之外，还要求：在选拔干部时，要注意被选拔者的工作地点是否隐蔽，被选拔者是否肯于而且善于作长期埋伏，是否有适当的职业和有很好的社

^①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0—111页。

会关系。在使用干部时，要做到：以保存干部为主，工作为次；以干部职业为主，工作为次；以开展社会基层工作为主，组织工作为次。在培养教育干部时，首先是以如何隐蔽为前提，具体教以怎样作秘密工作，方式是以个别谈话和讨论工作为主，配合整风审干。

深入社会，到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国民党反共活动日益加剧的严重形势下，要使我们党做到长期荫蔽，积蓄力量，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深入社会，深入群众。要做到这一点，象抗战初期那样的“救亡作风”或职业革命者的派头是不行的。因此，南方局要求党员和干部，都必须做到“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要有公开的职业和合法的身份。同时还要做到“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后来又增加了勤调查研究）。每个党员都要学好功课或职业技能，以及在条件许可下努力学习时事、政治和党的知识；要精通业务；要广交朋友，深入调查研究。有的党员在学校里上学，不仅学习成绩优良，又尊敬老师，爱护同学，还会办伙食，受到师生拥护，许多进步师生都团结在他们的周围。有的党员当职员，精通业务，是行家里手，对人又和气，同事都愿意和他接近，老板或主管人员也认为这个人行，离不得。有的党员当医生，由于医术高明，不仅老百姓需

要他看病，许多国民党要员和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也请他治病。这样，我们的党员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得到许多中上层人士的同情，而且不易被反共分子发现。

由于南方局在党中央“荫蔽精干”方针的指导下，正确地实行了“三化”、“三勤”政策，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组织，就能在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下长期保存下来，而且日益坚强，影响越来越大。广大人民群众，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中一部分中上层人士，都寄希望于我们，逐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因此，当一九四四年日军为了打通南北交通线，对豫湘桂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以致造成独山失守的时候，大后方就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各界人士和群众起来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制政策，拥护我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一九四四年冬至一九四五年间，大后方有大批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去，到农村去；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间，成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一九四五年春，重庆发生了“胡世合事件”^①。抗战胜利以后，各地进步群众中的优秀分子

^① 指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国民党特务分子枪杀了前往“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执行取缔违章用电的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的事件。由此触发了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大规模群众斗争。

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受到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各民主党派公开声明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形成了强大的第二条战线。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迅速溃灭，蒋家王朝很快复亡，我党比较完好地接管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和工矿企业，等等。所有这些，都和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坚定、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荫蔽精干”方针和政策是分不开的。

南方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十分艰难的条件 下，把中国南部广大地区的党组织，建设成了坚强的 战斗的堡垒，在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进 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方局在工作实践中，依 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所属区域的具体特点所提出的 具体的政策、原则和措施，所总结出的经验，丰富发 展了党的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不可分割的 重要部分。

（王明湘整理）

关于南方局的组织机构和 南方局组织部的情况

荣高棠

南方局的组织机构（略）

南方局组织部的的工作有三部分：

（一）向地方党组织传达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

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是南方局领导的，由组织部具体联系。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大多由周恩来同志直接和各省书记谈。

一九三八年国共关系较好，党的组织大发展，搞公开斗争，游行、集会、散传单。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三年又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疯狂破坏我党组织。政治形势变化，也就决定我党组织形式的改变；组织形式的改变，又决定党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方法的变化。所以，从一九三九年起，党组织停止发展，进入巩固组织时期。斗争的方针和方式方法也由公开转入隐蔽，并逐渐明确

提出要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三有”（有理、有利、有节）。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三有”是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原则。

后来强调调查研究，要求每个党员至少要对自己所在单位或部门进行调查了解，写成材料报告南方局。

第三次反共高潮后的形势是：一方面我们击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一方面日寇打到桂林，直逼贵州独山，重庆处于严重威胁下。国民党想和和不成，想降降不了，加上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政策，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物价暴涨，人民生活日益困难，无法再忍受下去，纷纷起来要求停止内战，要求民主，改善民生。在此情况下，国民党被迫非同我们谈判不成，于是从一九四四年起，国共又开始断断续续的谈判。

国共关系有所缓和，大后方的群众运动就开始抬头了，党的活动也相应变化。南方局的工作，不论是前一段，还是后一段都是在恩来同志领导下，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大后方的群众运动由高潮到低潮，又由低到高，这是与当时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而不全是哪一段工作好坏的问题。要弄清这个问题，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政治形势，是很重要的。

王若飞在一九四四年从延安到重庆以后，大后方

的群众运动就逐步发展起来，毛主席表扬了。但有人说，在他来以前南方局有段工作有“消极荫蔽”问题，受到了批评。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

一九四四年以后，国民党找我们谈判了。参政会上的斗争，国民党很被动，南方局的工作有了新发展，戏剧、文化以及其他方面工作都活跃起来。不仅群众发动起来了，党的组织工作和整个地下党的工作都活跃了。一九四五年党中央提出向农村发展，联系群众，建立武装，准备打游击。闽粤赣、滇桂黔等地都发展了武装打游击，派人下川东也要发展武装，但没有成功。要打游击，建立武装，都是根据整个政治形势发展变化而相应提出的，不是凭主观愿望，不能说谁在就行。南方局的整个工作，无论是党的组织工作，还是其他工作，都是配合解放区武装斗争的。

此外，南方局在国统区的特殊环境里，还形成了一整套对国民党开展斗争的方式，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包括同国民党的谈判、参政会上的斗争，和统战工作以及《新华日报》的宣传活动。秘密斗争就是地下活动。公开与秘密斗争要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但在组织联系和活动方式上又要互相区别，绝对分开，不能混同。此外，地下活动也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问题。比如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读报小组是允许的，

利用合法组织和允许召集的一些会议，利用这些合法的场合启发与会学生和人士，影响推动他们参加一些适宜的斗争。南方局在上面的斗争也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等驻在重庆；中共参政员在参政会上发表我们的主张，批评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我们《新华日报》报馆在重庆发行党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设在红岩，以及它所进行的许多活动，这些都是公开合法的。但是，南方局是不公开的，是秘密的。它在国统区内巩固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地下党组织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也是秘密的。例如：派人到国民党的各部门里去做工作，了解情报；派人到地方实力派中去做军队工作；有的文章国民党不让《新华日报》发表，我们的报纸就开“天窗”，印成小册子散发，它不准，也不理它，照样设法发出去。这些都是非法斗争。

还有个统战工作与军事斗争相配合的问题。南方局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建设地方党的组织；一个是开展统战工作。统战工作是很重要的方面，各个部门都在做统战工作。我们做统战工作时，注意与军事斗争配合，派人到地方实力派中去，到龙云、刘文辉、潘文华他们那儿去，做他们本人工作，也做他们军队的工作，同时我们准备在地下搞游击队。一九

四一年底，在广东正式成立了东江纵队，随后在云南也搞起了队伍打游击。再就是前面讲到的，还派人到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区去准备发展武装。总之，一方面搞统战，一方面搞军事，斗争方式是多样的、复杂的。

解放战争时期，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党中央决定，为了配合解放，在华南地区广泛开展反蒋武装斗争，并建立了几支中坚的武装部队。例如滇桂黔边区纵队、闽粤赣和粤赣湘的游击部队，后来都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江纵队一九四六年遵照国共谈判协议撤到山东解放区。

（二）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我党在国统区内组织工作有个大发展阶段。那时，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出于形势的需要，党的发展很快，这是对的，但确实也有些问题。长江局时期曾规定，凡有两个“只要”的人，就可以发展为党员：一是“只要抗日积极”；二是“只要历史清楚”。这样条件太宽。当时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配合得不好，很多人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一般的停止了发展党员，强调巩固组织。停止发展和巩固组织是同时进行的。到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采取很多办法破坏我们的组织，给我们党带来了严重危害。

那时，保护党员，保存党的组织，成了我们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 and 各地实际情况，适时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较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使地下党组织得以保存和巩固。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反共条例，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等都出来了，反共投降活动步步加紧。国民党对我地下党组织加紧破坏，肆意屠杀党员和进步群众，各种特务组织无孔不入，无论在机关、社团、工矿、学校，斗争都很激烈。我们除进行谈判外，还利用《新华日报》及一些公开场所与他们开展斗争，并采取秘密方式斗争。为了巩固党的组织，保护地下党，保护党员，我们在组织上作了重大的转变。一九三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保存党员干部的指示》，八月又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其后，还发出了许多相应的指示。自此后，党基本上停止了发展组织，巩固组织实际上成了保护组织。在保护组织方面，南方局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组织措施：

第一，改变组织的联系方式：建立平行支部，大支部化为小支部，有的改为单线联系，有的党员转地不转党，有的地方一个时期连组织都撤销了。中央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电示周恩来，指出：“要求大后方党的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必要时县

委亦可取消，只留支部”。鄂西就没有特委，贵州也有一个时期取消了省工委。有的地方没有党的领导机构，有的单位建立两个以上平行支部、平行市委，互不发生横的关系。有的地方支部取消了，小组活动也停止了。

实行“转地不转党”，党员转移而不转党的关系。这样做，保护了党的组织，但是也造成了一些损失，使很多同志失去了组织关系。有的因此不能恢复党籍，只得重新入党。因为执行组织决定而失掉关系，以后仍积极干革命工作的，现在把情况查清后，就应该恢复组织关系。特别是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应当很好落实政策。

康生曾说什么白区党都是“红旗党”，纯属诬蔑。也有其他人说什么地下党是国民党，“边纵”是地主土匪武装，这也不对。南方局那时领导下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很好的，是经受住了考验的，质量是高的。出现叛徒、特务是极个别的。

第二，调动、疏散干部：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长期在一个地方，容易被敌特发现，而且有的同志在大发展阶段已经暴露，必须把他们调到新的地区去，以利于隐蔽党员，保护组织。一些同志在国统区呆不住了，就转移去延安；有的就调动个地方，如从湖北调到成都，从成都调到云南，从川东调到川康，从川康

调到川东。“皖南事变”以后，送了不少干部回延安，还将一些干部分散到各地，或疏散到农村，荫蔽起来。干部的互相调动、疏散荫蔽，或把整个党的组织转入地下，都是当时全党组织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也是为了保护干部。

第三，允许共产党员集体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是保护我们党组织的方法之一。

一九四〇年五月五日，中央书记处电告各省委：“中央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中说：“凡服务于国民党军政教育机关之秘密共产党员遇强迫全体公务员入党时，应即加入国民党，必要时可不必事先征求党组织的同意，以免露出破绽，但事后必须呈报党组织追认。”

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电告南方局和其他中央局，电文上说：“为使公务员地位不致丧失起见，地方党部应允许所有共产党员公务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当入党入团时，不必表示迟疑态度，以免引起怀疑；同时，如入党入团一般的均须填写反共表格及作反共宣誓时，可照例举行”。

一九四一年一月八日，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关于大后方党员加入某党问题的指示”（注：某党指国民党）中说：“为了不致暴露政治面目，保持大后方党员的社会职业与合法地位，以便党进行长期埋伏隐蔽

的革命工作，我党党员不应独特的拒绝与拖延某党所强迫执行的受训、填表及入党，而应和一般社会人士一样的去受训、填表，以至按具体情形，个别的或集体的，被动的或主动的加入某党去。各地党应预先把这个方针告诉所有党员。”“加入某党的我党党员，在某党强迫他们进行特务工作时，一般的不应采取公开拒绝的态度，因为如此即可能引起某党怀疑以至破坏自己的地位，而应采取某党的历来盛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政策，‘等因奉此’的官僚主义态度，打假报告，敷衍塞责，伪造情报等办法以应付之。原则上以不引起某党怀疑、又不损害革命力量为最有利。”

根据当时中央的电报可以看出，为保护我们组织是允许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来得及请示的要请示，来不及的可以事后报告。解放后有的地方不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和中央有关指示，把加入国民党看成不得了的问题。甚至有人说什么：“你在国民党机关工作过，到底你是给国民党工作的时候多呢？还是给共产党工作的时候多！”以致开除了人家党籍，这是不对的。要知道我们的党员在组织上加入了国民党的反动组织，实际上仍然为我们党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组织，保存战斗力，为了最后消灭敌人。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不采取这些办法就难以保存自己。当然，个别人消极的也有。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在国统区工作的党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有很多单位就没有人管你加不加入国民党。

“荫蔽精干”这个方针，看起来简单，贯彻执行起来就很不容易，不仅要把整个党的组织转入地下，而且斗争的方式方法也要转变，我们的干部和党员一时难于适应，这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血的教训。鄂西特委书记何彬的政治身份在武汉时就公开了，组织上没有坚决把他调离湖北，还留在恩施。那么小的地方无法隐蔽，结果被捕牺牲了。何彬是湖北很老的干部之一，很好的同志，他的牺牲，组织是有责任的。

（三）干部的管理和调配。

这部分工作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调配干部：南方局直属各部、委、组和各省的省委、工委、特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南方局决定的。有的是恩来同志直接谈话，分配任务，有的是孔原谈话，交待任务。各地的负责干部由这个省调到那个省，互相调动，都是这样。至于一般干部的调动，就由组织部主管同志去做了。

第二，联系干部：在南方局的许多领导同志都负责有联系干部的责任，不仅组织部的人要联系一些地下党员，恩来、董老、叶帅都曾亲自联系过一些党员。

张瑞芳就是恩来同志亲自联系过的一个，她和我也熟悉，我也联系过她。我们联系过的人大体上有五类：

一类是从外边调来的，在外地工作暴露了，调到四川或重庆来，仍留在下面找个职业荫蔽，不便编入地方组织。

二类是做上层统战工作的，或者在国民党上层工作，不便交地方党组织，怕暴露或受牵连。

三类是在紧急疏散中失掉关系的党员，跑到重庆找党，有的直接上山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到《新华日报》营业部。这类人多半交给组织部负责审查和联系。

四类是有问题的人，有的被捕放出来后找来了，我们一时审查不清，同他们个别联系。

五是进步群众，他不是党员，要到延安去，要求入党。有的跑到红岩或新华日报馆，热情很高，还供给给我们不少材料。我们劝他不急于走，留下可以做工作，与他们联系。有的送到解放区去了。

除以上五类，还有一种是调走后，组织关系仍留在南方局的。

第三，审查干部：凡失掉了关系的，被捕出来的，与我们联系的进步群众，都要进行审查、调查了解，弄清情况。

派出去迎接胜利的，迎接解放的，输送到延安的，

在走之前都经过组织审查。

第四，教育干部：干部的教育工作是多方面的，有时事政策教育，组织纪律教育，秘密工作教育和气节教育。时事政策教育是经常进行的，因为一切工作任务、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都取决于政治形势，精干荫蔽政策教育是大后方工作非常重要的方面，纪律教育、气节教育、秘密工作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输送干部：主要是向延安输送干部。输送的干部有在国民党地区不能立足的，有干部家属，有技术人员。当时延安很需要技术人员去参加建设工作。

去延安的人为了在路上应付敌人检查，都要准备好各人的身份、履历、社会关系等。周恩来同志对去延安的人非常关心，亲自过问，大多亲自检查他们准备的情况。

我们红岩办事处对面有个破烂小房子，是南方局干部招待所，很多人住过。那里又是干部学校、训练班；布置学习任务，是组织部直接管的。审查干部，输送去延安的人，也住在那里等办手续。管理教育工作全由组织部管。

南方局组织部的工作，除了前面说的三个方面之外，还管情报收集、交通等。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地下党的 重建和川东党组织发展、巩固 的主要情况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三年九月)

廖志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经过我党的大力推动，国民党终于决定对日抗战，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在四川省的党组织，因早年遭到国民党和四川军阀的残酷镇压，被破坏得非常严重。这时有党的关系的，只有中央以特殊任务派去四川的罗世文、张曙时等几位同志，除此之外，还有从外地转到四川，关系尚未接上的韩天石、罗青、赵师南同志等。罗世文、张曙时分属两个系统，互不发生联系，各自单独活动，分别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全川没有党的正式组织，抗日救亡工作也没有

党的统一领导。重新建立四川的党组织即成了我党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一）四川秘密党组织重建的经过

一九三七年，我在延安中央党校担任总支书记。九月的一天，中央党校校长罗迈（李维汉）通知我说：中央决定派邹风平和你回四川工作，过几天就要给你们谈话，你赶快做准备。十月的一天，洛甫（张闻天）、李富春同志找邹风平和我去谈话。洛甫同志说：现在的形势很好，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地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四川的形势也很好，工作条件很有利。中央决定成立四川省工委，由邹风平担任书记，廖志高担任副书记，余代生（于江震）任委员。你们再带几个人回四川去，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把党的工作开展起来。你们的主要任务：一是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二是广泛开展抗日群众运动。必须注意的是：党的组织一定要建立成秘密的，发展党员一定要秘密、要注意质量。做群众工作，在群众组织的公开活动中，绝不能以党员身份出现，只能以群众身份出现。富春同志说：要接受大革命时期的教训，要建立秘密的巩固的党组织。上层统战工作有罗世文负责，你们可以不去管，但重大问题可以找他

商量；情报工作有张曙时负责，你们同他联系就行了。你们由中央直接领导。怎样联系，你们去同西安办事处商定。最后嘱咐我们说：你们回去就做准备，服装、交通工具等具体问题，由交通科长王林负责帮助你们解决，准备好了就走。

这次中央确定到四川的，除了邹风平、余代生和我以外，还有王相才（王子谟）、彭世荣、韩文炳（此人回家后脱党了）共六人。我们积极地进行了各种准备，确定了各自的化名、职业、身份、相互关系以及对付敌人的各种办法。王林也为我们置备齐了服装，安排好了交通工具。一切准备就绪。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我们一行六人，辞别了延安，启程出发。中央派了一辆军用大卡车把我们送至西安。我们到西安后即以一般旅客的身份住进了旅馆。当天，邹风平去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商定了今后联系的办法。第二天，我们即向四川进发。

我们进入四川之前，在陕西的宁羌县，遇到了国民党检查站的检查。宁羌县是川陕公路入川前的一个咽喉要地。国民党检查站对过往人员一律要进行检查。我们之中，邹风平首先被检查。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有些麻痹，虽然事先做了进行秘密工作的各种准备，但还是注意的不够。邹风平在行李箱内带了好几本在抗大听讲唯物辩证法等笔记。检查站的人就问他是

不是共产党员？他说：不是。又问他带这些干什么？他说：都是我学习的东西，不干什么。反复问了几次，他都是这几句话。检查站的人就要他站在一旁，待对我们和其他旅客一一检查放行后，把他叫到检查站内单独谈话。

我们五人先住在一个旅馆里。不一会儿邹风平也赶到了。他告诉我们说，检查站的人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他还是说：不是。又问他：你带这些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带这些东西的危险性？他说：我是抗大学习后回家的，都是我学习的笔记，不知道带这些有什么危险性。又问：你回四川干什么？他说：不干什么，就是回家嘛！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名堂。最后，检查站的人对他说：以后不准这样搞了，这样搞很危险。你去吧！他到旅馆后，我们进行了仔细观察，确实没有人跟踪盯梢。我们分析，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我党是合法的，这个检查站可能还未接到他们上级的指示，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样的事。所以，邹风平和我们才平安脱险。但这次检查使我们提高了警惕。当晚，我们除销毁了邹风平所带的笔记之外，对全部行李又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有点暴露的材料，都丢在粪坑里。这件事对我们有很大教训。

到达四川的广元后，我们研究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由余代生带领王相才、彭世荣、韩文炳等共四人，

直接去南充，成立川北工委，由余代生兼任书记。邹风平和我为一路，继续前进，经绵阳去成都。

我和邹风平到达绵阳后商定：汽车票买到成都，中途在新都县（距成都四十华里）下车，改乘黄包车（人力车）入成都。我们坐黄包车到了成都市北门外之后，停车假意休息，观察了黄包车入城情况，看见来来往往的黄包车络绎不绝，根本无人过问。我们就顺利进城了，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我们在市中心盐市口找了一个旅馆住下，即先同罗世文联系，又找张曙时见了面。他们分别给我们介绍了成都以及全川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就和邹风平商量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我们决定必须先做两件事：第一，要赶紧把机关建立起来；第二，要立即着手清理组织

当时，国民党对所有旅馆经常进行检查，久居旅馆很不安全，所以，找几间房子把机关建立起来是开展工作的当务之急。我们根据市区内张贴的租赁房屋告示，在平安桥马道街法国天主教堂旁边租下了一个小院。邹风平和我，以及耿大姐（耿建华）、陶桓馥（在我们到前她已到成都，韩天石和罗青的组织关系就是由她转来的。以后陶回北方，调来甘棠）住了进去。这样，机关就正式建立起来了。

我们一边建立机关，一边清理有党员（有的有关系，有的无关系）在其中活动的一些“小组织”。这

些群众性的救国“小组织”，成都、重庆、泸州、宜宾等地都有。领导人中，有的人是有党的关系但刚刚转来，有的人是有党的关系但尚未转到，有的人是失掉党的关系的，有的人是被捕出狱后未找到组织的。还有些是抗日积极分子（群众）组织的（这类小团体甚多，因无党员就未去清理），都在进行抗日活动。他们都自称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对别人则不相信。因而，各组织间互不信任，各自为政，不能一致地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这些救国“小组织”中，较为重要的：

成都市有：

一九三六年韩天石（一九三七年十月党的关系正式转到）组织的“民先”，比较严密，群众基础较好。其中有一个韩天石任组长的党小组，我们到成都后就接收了。

一九三七年四月饶世俊（饶孟文，是被捕出狱后未找到党的）、侯太阶等自行组建的“中共成都特支”，并于夏天成立了“海燕社”。他们这个组织，人数不多，但很活跃。他们打进一些群众组织做工作，但他们还没有一个有党的关系。

李储力（张黎群）等组织的“青年救国会”，自称为党，但不是党的组织。

一九三八年春犹风岐（失掉关系的党员）等人组织的“群力社”。

还有很多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如成都市各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等。这些就未清理了，只是派党员进去发展党员，争取领导。

还有一些进步报刊：进步刊物，如：一九三八年民先主办、车耀先发行的《大声周刊》，民先主办、胡绩伟主编的《星芒报》（以后即在党领导下），民先队员熊复主编的《救亡周刊》等；进步报纸，如：杜桴生主编的《四川日报》，还有《新民晚报》和《华西日报》等等。这些报刊，都积极宣传我党主张，宣传抗日救国。

重庆市有：

一九三六年冬漆鲁鱼、郝威、杜延庆、黄觉庵、黄亦人（丁天一）等组织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包括职业青年救国会、文化教育界救国会〔会员最多〕、学生救国会，后又成立工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漆鲁鱼是红军医生，战斗中被打散，讨口回到四川，在重庆《新蜀报》作编辑，进行抗日活动，组织了“救国会”，群众基础最大。一九三七年十月罗世文去重庆把他们审查清楚后，就决定由漆鲁鱼、郝威（北方局转来了关系）、杜延庆（上海转来了关系）三人组成了重庆市工委，由漆鲁鱼担任书记，杜延庆任组织部长，郝威任宣传部长，都是市工委委

员，并要他们大量发展党员。十二月省工委邹风平和我听了罗世文介绍后，同意了他的意见，正式批准成立市工委。

饶国模女士的几个儿女刘参化、刘圣化、刘纯化以及侄子刘文化、侄女饶友瑚等，因为饶的一个哥哥饶国梁是著名的广州七十二烈士之一，全家受影响较深，他们也搞救亡运动，也说是共产党领导的。

泸州、宜宾有：

一九三六年底，复兴社分子冯筠连在张秀熟同志的影响下转变过来后，组织了“信义互助储蓄会”，也搞救亡工作。一九三七年二月张秀熟要万静修、廖寒飞、何作洲等接着在该组织中进行工作。

此外，万县等许多县也都有没有党的关系的人在活动，发动、组织群众，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上述成都、重庆等地的救亡组织和进步报刊，对于团结进步青年，提高广大青年的政治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实际上为扩大党的影响，重建四川秘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成都市、重庆市和有些县，党的组织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了。

对于这样多的组织（都是些进步程度不同的群众救亡组织，个别的如“民先”，实际上有党的领导，也是先进的）和人，按照什么原则，采取什么办法，怎样加以清理呢？我们决定：先清理党的关系，然后

再发展党员。有党的关系的就接上关系，正式编入党的组织；其余按照党章规定的原则，分别审查，个别吸收。即一个组织一个组织、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审查，对于失去关系的，如果政历清楚、积极抗日、符合党的要求并有人证明“合格”的，就承认其党籍，或恢复关系。对于抗日积极分子，如符合上述要求，又有党员介绍，经过审查，就可履行手续，吸收入党。经过两个来月认真、仔细的审查工作，弄清了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要革命的。除了极少数尚待考察外，其余凡是“合格”的，都解决了他们的党的关系。

还有几个从上海或其他组织派来负有特殊任务的分散的党员，该管的也管起来了。

邹风平和我到达成都时，罗世文、张曙时领导的党员，成都有三十多人，重庆有五人，泸州、宜宾有四十多人。除二十余人是上层统战、情报关系仍由罗世文、张曙时直接领导外，其余移交我们，经过审查“合格”的，我们就接收了。韩天石领导下的几个党员都合格，都正式编入支部了。

还有个“托派”问题。一九三八年春，有两个人（原来是党员，以后脱离了）找到邹风平声明他们已与“托派”脱离了关系，要求党与他们联系，仍做党的工作。邹风平告诉了我，并说：是不是人多些好？我说：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对“托派”的组织、活动

情况都不了解，他们是否真正脱离“托派”？是否还能做党员？我们不能马虎决定，也不能发表什么倾向性的意见，应请示中央决定。邹风平同意我的意见。就此专门给中央写了一份秘密报告。“七大”以后，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彭真同志，他说：有这个报告，我还保存着。

另外，在清理组织的同时，我们成立了一个“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由曹福源负责。一方面多推销《新华日报》，扩大我党的影响；另一方面给失掉关系的同志提供一个找党组织的方便条件。当时，许多同志都是通过这个“推销处”找到我们的。这也是我们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一条经验。

一九三八年初，省工委增加张曙时为委员；四月份，长江局派程子健回川，亦参加省工委。此时，省工委才正式分工：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任副书记兼组织（六月份，廖去重庆兼市委书记，组织由邹风平兼任），程子健任宣传。七、八月份，郑伯克回川，即由郑任宣传，程改任职工书记，张曙时仍做情报工作，余代生仍兼任川北工委书记。

四月份，罗世文从汉口返回成都，传达长江局指示说：一、四川省工委原由中央直接领导，此后改由长江局领导；二、要继续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三、调廖志高到重庆兼任市委书记；四、决定

自六月份起，全川就原有党员数量发展十倍，成都、重庆、自贡三市各自都要发展到一千党员，限三个月完成。之后，我们就在长江局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在此期间，我们相继建立了各地党的组织，并发展了一大批党员。

一九三七年底，成都市各大、中学已发展了一批党员。为了统一领导，加强学生工作，省工委下面成立了成都市学委，由韩天石任书记，康乃尔、张文澄等任委员。

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了成都市委，由杜桴生任书记。五月撤销“学委”，由韩天石任市委书记。

在成立成都市委后，派赵利群到宜宾去建立县工委，侯太阶去乐山建立县工委；田家英（陈野苹）去庆符县任县委书记，欧阳克明任万县特支书记，赵章明任梁山特支书记。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份，杨述到重庆。五月重庆党员已发展到数十人，省工委根据罗世文传达的长江局的决定，将重庆市工委撤销，正式成立重庆市委，由廖志高兼任书记（六月到任），漆鲁鱼任宣传部长，杨述任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秋季，李应吉（宋林）到重庆，即由李任组织部长；王亦清亦到重庆，任职工部长，黄亦人任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们根据张秀熟、罗世文的介

绍，研究决定建立川南工委，由万静修任书记，要他们发展党员。七月，撤销川南工委，分别成立泸州、宜宾中心县委。泸州中心县委书记由李亚群担任，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先由廖寒非，后由韩天石担任。

同时，还派饶孟文到自流井建立组织，发展党员。

至此，川西、川东、川南、川北，分别以成都、重庆、泸州、南充为中心，都有了党的正式组织，全川党的关系归于统一，各市、县的工作完全置于省工委的领导之下。

根据中央的指示，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发展党员的工作。四、五月份，传达了长江局“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的指示后，我们就集中力量抓发展党员的工作。三月底统计，全川党员数为三百四十多人，到十月底统计，党员数已发展到了三千四百余人（其中重庆市及所属各县八百多人），增加了十倍。

大量发展党员，在哪里发展呢？我们研究确定：着重在大学、高中的青年学生和中、小学教员、产业工人以及国民党的机关职员中发展，同时要注意尽可能的发展农民入党。结果，发展的青年学生党员最多，占一半以上，其次是工人、职员，农民极少。

当时，我们很注意开展产业工人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重要工厂中的工人工作。所以，我们从大、中学生党员中动员了一批人到工厂中去工作。一方面

锻炼他们，使他们逐步建立工农感情；另一方面重要的是让他们去向工人讲解革命的道理，宣传党的主张，把工人发动、组织起来。例如，国民党泸州二十三兵工厂（化学兵工厂），有一个劳工课长张荫堂是党员，我们通过他先后介绍了肖泽宽、江浩然、徐坚等十几名大、中学生党员到该厂。这些同志进厂后有做苦工的，有打杂的，有当低级职员，工作都很辛苦。他们接近工人，关心工人疾苦，同工人的关系搞得很好，不久成立了“工人读书会”、俱乐部，发动、组织工人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员。他们在这个厂的工作颇有成效，发展了几十名党员，打下了群众基础。

为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把四川党组织建成秘密的坚强的党组织，警惕国民党的突然叛变的指示，我们在大量发展党员的过程中，注意了及时地对新党员进行教育、训练工作，还开办了训练班。我们对党员进行教育、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党的建设、秘密工作、党的纪律、统一战线（包括陈独秀错误的教训）、中国革命、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有时也讲形势。同时，还派党员参加南方局举办的训练班。这对新党员了解党的基本知识，提高革命觉悟，加强组织纪律性，保守党的秘密等都很有好处，特别是结合实际进行讲解，效果更好。历史已经证明：要使党员树立革命信心，增强党性、严守纪律，及时地对新党员进行教育非常

重要。

此外，在这个时期，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亦有发展。特别是成都利用国民党的“抗敌救援会”，重庆利用宋庆龄为理事长的“妇女慰劳会”等公开的合法组织，搞救亡工作效果很好。

在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抗日救亡运动有很大发展的情况下，为了加强领导，省工委于一九三八年十月间在成都杨德基同志家里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四川省委。正当各地汇报工作时，王明、林老（伯渠）、吴老（玉章）等路经成都，他们决定：撤销四川省工委，不成立四川省委，四川分为川西（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建立西康省后川西才改为川康，包括成都及川西、川北、川南一部分和康边）、川东（包括重庆及川东一带的县，如万县、涪陵，还有泸州、宜宾等数十县）两个特委。川西特委人选在这次会上议定，川东特委人选，由廖志高回重庆请示决定。罗世文传达了这些决定后，到会同志交流了一下经验，会议就告结束。

至此，四川省工委即告结束。之后，川西、川东两个特委分别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互不发生关系。

(二)川东特委的成立，继续大量发展党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从成都回到重庆，立即向博古、董老（必武）、叶剑英、凯丰、邓颖超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请示。在博古的主持下，会议研究决定：

川东特委兼行重庆市委职权，两级机构合一，一套人员。

特委书记：廖志高

组织部长：李应吉

宣传部长：漆鲁鱼

工委书记：王亦清

青委书记：杨述

还一致同意邓颖超同志的提议，由陈奇雪担任妇委书记，管妇女运动。

以上各方面负责同志皆为特委委员。

十一月，川东特委遂告正式成立。之后，宜宾、泸州两个中心县委又划归川东特委领导。

一九三八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一九三九年一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南方局机关先是设在重庆市中区机房街七十号，这年“五三”、“五四”日机轰炸

重庆，机房街房屋被毁，遂搬至市郊化龙桥红岩咀。

南方局在机房街的房子被炸前，为了准备市区被炸后有个适当的办公地址，要我们设法在郊区找一个地方。我想到红岩这个地方在郊区山上，主人饶国模虽是个地主，但为人开明，并且她的儿女都是我们的党员。特委认为这个地方适当。我请示南方局得到同意后，就要刘圣化和他的兄弟们去同他妈妈商量，饶国模欣然应允。以后就由办事处副处长周怡等去同她接洽。饶国模的哥哥饶国梁是黄花岩七十二烈士之一，她早年就受革命思想影响。这个人胆子大，同意我们在那里修房子。在备料和修建过程中为我们出了很多力。房子动工后，我们地下党同志就不与她家往来了，她的工作全由南方局（或办事处）的同志去做。不久，她的儿女们由南方局先后送到了延安学习。红岩这个地方就成了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基地。

红岩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都在那里。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各方面的工作是由南方局领导的。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从南方局在重庆设立，到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撤走，红岩这个据点都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无论在机房街，还是在红岩咀，南方局都是设在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里面。南方局对外不公开。从南方局成立到一九四三年，川东特委一直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

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工作：一九三九年继续大量发展党员；开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对新党员进行教育。九月中央下达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以后，十月，我们召开了川东特委扩大会议，确定我们的工作重点应即逐渐转入巩固党的工作。一九四〇年，在没有党员或者党员极少的地方，还可继续发展党员（这一年，发展了四、五百人），继续开展群众运动。一九四一年一月初，川东地区才完全停止发展党员。这时统计（根据一九四一年一月底向中央的报告），除去一九四〇年底以前被破坏及撤走的以外，还有党员二千四百七十多人。

川东地区发展党员最多的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两年。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继续大量发展党员，必须注意质量，按中央指示建立秘密的党组织，警惕国民党的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去做。这些指示，我们都作了传达贯彻，而且在一九三九年我们一再强调质量，反对“拉夫主义”，加强教育工作。同时仍然强调要按照过去的规定：入党人要写申请书，要有介绍人和介绍人的意见，经过审查批准后，要个别举行入党仪式，

由上级负责人、介绍人、入党人参加，都要讲话。入党后要按规定交党费。一九三九年底统计，这一年又新发展了党员一千一百多人。但以后检查，因为一九三八年发展的大都是些“救亡”积极分子，比较暴露，比较“红”，特别是受王明的右倾错误影响，规定指标，限定时间完成（长江局限我们在三个月以内发展党员到一千人），以致许多地方降低了党员标准，有的只要是抗日积极分子就接收；有的只要是工农成份、政治纯洁，就不管觉悟程度；有的只看到他拥护党，就不管其他条件；有些是几个人在一起举行入党仪式；有的在审查入党申请书时，对政历审查不仔细，以致吸收了一些落后分子，混进一些投机分子和坏人；许多地方未严格执行后补期，有些后补党员也介绍别人入党。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又检查纠正得慢，以致后来遭受一些损失。

现在看起来，当时漆鲁鱼等同志组织的“重庆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为党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他们对川东地下党在短时间内很快得到发展是有贡献的。但是，也留下一些问题，暴露的人不少，加上发展时的缺点错误，就给巩固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

一九三九年，我们普遍在大、中、小城市和各县发展党员，主要是吸收合格的工人、学生、教职员和农民入党，在各县发展了许多小学教员和一些农民入

党。夏初，我到万县地区检查工作时，在云阳县的一个学校，发现了一些小学教员同农民的关系搞得很好，发展了一些农民入党。我向特委汇报后，特委就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并要他们很好注意做盐厂工人的工作，发展工人入党。

一九三九年底，对于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我们缩小了规模，改变了形式，继续进行。这时，停止“救国会”的工作，不再采用过去那样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形式了。主要是成立比较小的、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的读书会、联谊会、友谊会等。利用这样一些名义做群众工作，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同时还尽量利用公开的合法组织搞抗日救亡工作。如在邓颖超的指导下建立的“妇女慰劳会”，我们就是凭借该会理事长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名望开展工作的。又如搬到长寿县的重庆联中，一九三九年下半年，一场广大学生反对反动校长（青年党分子）的斗争取得胜利，就是统一战线做得好的典型。当时，学校当局开除进步学生，引起学生不满。我党支部组织进步学生、团结三青团和无党派学生，大家联合起来反对校长的这种做法。这次风潮闹得很厉害。结果这个校长被省教育厅撤换了。参加斗争的群众和领袖没有一个被捕或被开除的，而且没有发现是我们党的支部和党员在领导。这就是下层统一战线成功的经验。

另外，也有错误的做法，如在北碚有的同志不认识国民党的真面目，擅自搞“自愿参军运动”，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扩大军队。中心县委批评了他们，特委同意了中心县委的意见。总之，群众工作中的好坏典型都不少，这里不再多举。从一九四一年起，主要是做交朋友的工作。

（三）各级党组织及领导人发展变化情况

川东特委：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成立；到一九四三年九月川东特委撤销，分别建立上川东特委、下川东特委，历时共四年零十个月。其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川东特委还兼行重庆市委职权。

这五年，川东特委书记一直由廖志高担任。那时，廖对外用过汪平、汪琦等若干个化名。廖志高是学名，在校读书、参加长征和重返延安以及建国后都用的是此名。

组织部长：先后有李应吉、余代生、曾淳

宣传部长：先后有漆鲁鱼、林蒙、荣高棠（兼）

工运部长：先后是王亦清、王致中

青委书记：先后是杨述（杨德基、陈光）、许立群（杨耳，代理书记）、荣高棠、孙敬文

妇委书记：陈奇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底），陈调延安后未再补上。

以上均为特委委员。

秘书长：李维（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四月）

海员工作委员会（特委直接领导的一个重要部门，专管长江轮船公司——民生公司经营的几十条轮船的海员工作）：书记先后有黄亦仁、江浩然、马六甲等；樊恒才、许建业也在其中负过责。下面分别建立有：水手、轮舵工、理货、领江等工会和支部，有的只有个别党员。他们的工作颇有成绩。

还有郝威、许晓轩、冯兰瑞、杨修范等任过特委青委委员，汪敏、徐邦贤等任过特委妇委委员。

重庆市委：从一九四〇年一月单独成立到一九四三年九月，其间先后负责人如下：

开始时（一九四〇年一月至九月）：

书记：王致中（兼）

组织部长：郭汶（郭祖烈）

宣传部长：赵立峰（赵秀谈）

妇委书记：汪敏

一九四〇年九月改组后：

书记：江涛（莫止、李德春）

组织部长：汪敏

宣传部长：刘传蒴

妇委书记：汪敏（兼）

一九四二年冬重庆市委书记是孙仁（湖南人，听说一九四八年 在华釜山牺牲）。委员有彭咏梧、何文逵。

一九四三年九月川东特委撤销，分为上、下川东特委以后：

上川东特委：书记孙敬文

下川东特委：书记曾淳

重庆市所属各区、县委：

城区区委：书记先后是甘丹、樊恒才、汪敏、白英。委员有过温士一、王文、李治平等。以后分为上城区区委、下城区区委。下城区区委书记是白英，委员有曾冕、黄晓行等。上城区区委书记是甘丹，委员有王文等。

新市区委：书记先后是江涛（莫止、李德春）、熊宇忠、魏新学。委员最初有汪敏、乌江、王世槐、许晓轩。

砂磁区委：书记先后是兰毓钟、陈实、黄大明、刘作先、荣高棠（兼）、魏琼。委员有过沙玉瀛（女，南京人）、曹子明（重大学生）、徐淡庐等等。

化龙桥区委：书记先后是白英、王大化。委员有过赵忍安、李道源等。

江北县委（后划归江巴中心县）：书记先后是郝威、黄觉庵、田家英、郑理中、曾德林。委员曾有王健明、刘大震、黄致祥、李光明等。

巴县县委（后划归江巴中心县委）：书记先后是罗浩（欧汝钦）、肖泽宽等。委员曾有徐邦贤、蒋浪歌、李思源、李书直等。

川东特委直属各中心县委和县级组织：

宜宾中心县委：书记（一九四〇年初划归川康特委前后）先后是廖寒非、韩天石、林蒙、李维、彭世荣等。

泸州中心县委：书记先后是李亚群、涂万鹏、田家英、郭福玉（代理）、罗浩、廖林生等。李亚群任书记时，刘隆华（女）任中心县妇委书记，万进修、何作舟、曾仲牧任常委，涂万鹏任江安县委书记。以后肖泽宽曾任中心县职工部长。

北碚中心县委（即合川中心县委）：北碚最先是成立特区区委，书记是沈钧，组织部长江浩然，宣传部长方璞德。以后成立中心县委，书记先是李亚群，王世槐任宣传部长，江浩然任组织部长，妇委书记刘隆华（也兼任过一段组织部长），青委书记朱鸣（或徐鸣）。江浩然去延安后，冉启西任组织部长；李亚群走后，艾英（杨德培）任书记。

万县由特支发展到中心县委：特支书记是欧阳克

明，中心县委书记先后是黄树澄、杨正南、艾英、彭咏梧。（因有的组织被破坏，万县中心县委即移到梁山县，成立梁大中心县委）

南充中心县委：书记（一九四〇年初由川康特委划归川东特委前后）先后是刘传福、陈震、田家英（这时中心县委移到广安）、杨正南（中心县委又移回南充）。

江巴中心县委：书记先后是赖少尧、罗浩、肖泽宽。委员有李治平等。

五县工委：书记是张显仪（王家释）等。

綦（江）、南（川）工委：书记先后是夏奇峰、陈慕桥、周应培、李思源、李治平。

江津县委：一九四一年重建，书记先后是秦朝亨、周朝生、周平。属江巴中心县委领导。

永（川）、荣（昌）、隆（昌）工委：书记先后是周平、廖林生。组织部长何乃述，宣传部长何君辉。

（四）川东地下党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事件

一九三九年冬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制订了许多反共条令，如《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方案》等等，千方百计地破

坏我地下党。川东地下党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事件，主要是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回忆起来，川东曾发生过以下破坏事件：

一九三九年“五·一”节那天，特委青委书记杨述不慎被捕。当时杨述等组织了几千人在夫子池召开庆祝大会，宣传我党的主张，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国民党不好公开反对，就派宪兵守卫会场，以维持秩序之名进行监视。大会事前规定：与会人员都要按组织整队集体入场。杨述因去沙坪坝联系一个党员，回来时想参加大会，被宪兵阻挡，他坚持要进，就同宪兵打了起来，身上带的一些《新华日报》等红色材料掉到了地上，宪兵立即把他抓起来送往宪兵司令部。途中，杨述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当时，我和宋林、徐邦贤（女）三人住在一处，是杨述他们中途经过之地。我们听到街上闹哄哄的，打开窗子一看，见杨述被抓，就立即报告了南方局。南方局当即同国民党交涉，说杨述是我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想去参加庆祝“五·一”节大会，同宪兵发生冲突被抓了，要他们立即放回。结果，第二天国民党就把杨述放回南方局。南方局考察后，决定给予几年之内不能担负领导职务的处分。不久，即送回延安。

本来，这件事是清楚的，杨述没有自首、叛变问题。但以后，杨述为此不知被整了多少次，特别

是延安抢救运动，康生有意诬陷好人，对杨述揪住不放，并多次残酷毒打。直到一九四三年我回到延安后，才给杨述澄清了这个问题。

一九三九年六月，特委组织部干事赵万齐去飞机场联系同志，因“行动可疑”被捕。关押在国民党重庆市公安局，可能自首供人，但实际并未扩大破坏，释放出来后，去八路军办事处接关系未获准。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重庆市南岸党员胡甫章，被敌人逮捕后叛变了。供出了两个同志：一个是川盐银行茶房（勤杂工）谭世明。接着，谭世明被捕。谭被捕后表现很好，立场非常坚定，什么都不讲。所以，与他联系的同志都没有受影响。谭世明被国民党关押至死，是个坚贞不屈的好同志。另一个是南岸铜元局兵工厂工人党员，被捕后表现不详。重庆市委开除了胡甫章。

一九三九年十月，江津特支书记王世焕被捕。南方局通知说他已叛变，我们就把他开除了。以后调查，这次破坏还有四人被捕，即：方圭德，安徽中学学生，特支宣传干事，自首了；熊汇萱，安徽中学学生；岳清刚，国民党军政部被服厂工人。

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奉节县委书记被捕叛变，使全县三十多人被捕。同时使开县全县党组织也遭破坏。

一九四〇年，新市区委许晓轩（相当于区委常委）

去汉阳兵工厂工人支部接头，这个被接头的人就把许晓轩抓捕了。以后听说这个被接头的人就是特务打进党来搞破坏活动的。许晓轩当时的社会职业是黄炎培组织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员，被捕后表现得非常坚强，任凭敌人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什么都不讲。新市区委负责人员一直安全无事。就这样，国民党把他视为要犯，关押在渣滓洞，以后壮烈牺牲了。

一九四〇年五月，黄晓行（城区区委委员）被捕。黄去参加一个新党员入党仪式，被这个新党员（内奸）指引特务逮捕。当时黄发觉后曾由下半城跑到上半城，在临江路某委托商行，敌人使用瓦斯枪，黄中毒昏迷，被捕自首。出狱后曾写有材料，川东特委未批准其恢复党籍。黄系延安马列学院学生，后来到贵州去了。介绍那个内奸入党者是“新中国书店”之陈某（名字记不起了）。这几个人都割断了关系，并通知了他们所知道的人立即转移。

一九四〇年，江北尹家被搜事件。尹家被搜查，尹××（女）及其母被捕。原因及以后情况均不明。

民生公司职员汪漂萍被捕，先后情况不明。

五县工委下面一些同志被捕，书记张显仪（王琛）却只身跑到重庆向办事处报告。究竟是什么原因始终没有查清楚。当时，涪陵、丰都、忠县等三个县被破坏得厉害，丰都县三十三名党员均被逮捕，但石柱、

长寿两县还保存得比较好。

一九四〇年初，南充中心县委由川康特委划归川东特委领导，派人去联系时已遭破坏。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彭红岩，被捕逃出后因要一个小孩去机关送信取行李，被特务发觉，驻机关的中心县委秘书余鸿烈和那个小孩都被捕。以后，彭到了重庆，自称“越狱”逃出，川东特委不相信，把他开除出党。余鸿烈被捕后，特务曾持一串名单问余这些人是否党员？余答：有的认识。当时判断余已叛变，并有被特务收买的可能。余知南充一些组织，除个别人被捕外，其余未受波及。所以，今天看来，余是否叛变还不能断言。接着我们就派田家英去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心县委这时移到广安，因广安县委健全无问题，渠县的党组织也较安全）进行清理整顿。以后将田调回红岩。隔了一段，我们又派杨正南去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先做清理整顿工作（这时中心县委又移回南充）。杨去后几个月也被捕，不久被释放，跑到重庆向办事处报告说：国民党没有掌握他的证据，他坚持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又有张表方说情，因而把他关押了几天就释放了。我们把他交由南方局进行审查，以后一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全国解放前，杨在雅安坚持地下工作。雅安解放后，我们派他担任西康省人民政府教育厅长、秘书长，后调任云南省计划委员会主任。

一九四一年，万县国华中学校长曾济舟和其他几个人被捕。详情不明。

一九四一年，泸州中心县委书记郭福玉被捕，原因不明。听说被捕后表现还好，以后送成都集中营拘押。

江巴中心县袁秋芳（袁慕思，妇女委员）被捕，不久出狱。先后情况均不明。

李光明（魏融）的爱人，非党员，因家中居住不便，经组织介绍到某纱厂工作，亦被捕。情况不明。

大竹事件。中心县委代理组织部长刘先慎（一谨），在当地开办有木工厂及织布房，被捕后自首出狱（早已病死）。中心县委代理宣传部长李孝思，任当地城厢小学校长，被捕后自首出狱。小学教员钟××，被捕后，刘、李二人用组织名义叫他自首，出狱与否不详。被破坏的原因是：乡下一个党员与一三青团员往来，泄露了组织秘密，被捕后供出了刘、李二人。

被敌人破坏的原因：多数是自己暴露了，被敌人怀疑逮捕的。有的是被捕后叛变供出其他同志。再就是大量发展党员时审查不严，混进了一些动摇分子和个别特务。幸好，那时多数干部坚决执行了南方局指示的巩固党的一套办法，一个人联系的面也不大，所以，除少数县外，没有发生大批破坏的情况。

(五)巩固党的组织，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隐蔽精干”的方针

一九三九年秋，国民党加强了特务活动，采取秘密逮捕、威胁利诱暴露的党员自首叛变、跟梢、利用叛变的人出来抓人等办法，破坏我党秘密组织。取缔救亡团体，打击进步人士。在此情况下，中央发来了巩固党的决定。遵照南方局指示，特委于当年十月就认真讨论了这个决定，并逐级传达学习、贯彻执行，同时停止了救亡团体活动。一九四〇年七月，又讨论、检查了巩固工作。

一九四〇年，我们先抓学习“决定”，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地下党加紧进行破坏的形势。这是一个大转变。我们除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外，主要抓了审查干部的工作，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一直抓了两年。逐级审查，上一级审查下一级，把所有党员，特别是干部重新审查了一次。经过审查和处理，川东地下党的情况更清楚了，发现了好干部，清洗了一批坏人和动摇、投机分子。这一年在教育方面就抓形势教育，抓“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宣传，以增强革命胜利信心；

抓气节教育，普遍学习革命烈士传，效果很好。重庆《新华日报》的宣传，出版进步书籍（包括怎样做支部工作的书籍），对川东地下党的教育也有很大帮助。

一九四〇年，中央决定增补我为南方局委员，同时还决定成立西南工委，由孔原任书记，钱瑛和我参加。不久，敌人发现了孔原，孔原即被调回红岩担任南方局组织部长，西南工委未能正式开展工作。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国民党军委会宣布“反共为今后主要任务”，并在该党四川县政人员训练班中宣称“你们尽管捉共产党，先斩后奏，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

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南方局又决定成立西南工委，以便在南方局离开时管理西南各省的工作，由钱瑛任书记，廖志高任副书记，调郑瑛来西南工委任秘书。机关准备设在成都，由钱瑛先去成都筹备。临行前要我接收、保存了云、贵两省委的组织关系。但是，钱瑛到成都后，环境不好，过了一段又撤回重庆。所以，西南工委始终没有能正式成立开展工作。实际上郑瑛一直在川东特委任秘书。

一九四一年，中央对于如何保存力量、荫蔽干部、真正埋伏下去做了多次指示。

一九四一年初，南方局指示我们抓紧巩固党，迅

速疏散暴露的党员。是年秋天，南方局又进一步检查、指示我们的工作，叫我去开会，周恩来同志主持，参加的有董老、孔原、钱瑛等，讨论怎样进一步巩固党组织的问题。总的精神是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确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隐蔽精干”的方针。会议中研究了巩固党隐蔽党的办法。

一九四二年春，南方局又检查了我们的工作，进一步作了指示。

经过巩固工作，川东地下党更加纯洁、更加隐蔽了，质量也提高了，战斗力也更强了。

(六)反特务斗争

反特务斗争，是巩固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重庆是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所在地，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特务多。在这里要隐蔽下来，要把秘密党组织巩固起来，工作是极其困难、极其艰苦、极其复杂的。要使党长期埋伏下来，并积蓄力量，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坚决同内奸、特务作斗争。内奸比特务更危险，因为他们知道内情。

要保护自己，首先要提高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防止奸特破坏的警惕性，绝不能麻木不仁，麻痹大意。

要保护自己，反对奸特的破坏，就要调查研究他们的政策、方法。这一点，除了南方局经常及时通知我们有关的情况外，要经常及时总结各地被破坏的教训，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加以对付，并用以教育干部和党员，这样做最为有效。

南方局得到情报，一些与我们有关的情况，孔原或荣高棠就及时设法告诉我们，我们就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样，到一九四二年，就没有什么大的破坏了。党的组织基本上巩固下来了，特别是各级骨干绝大多数都保存下来了。

要继续加强秘密工作的教育、反特务奸细斗争的教育和共产党员气节的教育。气节教育，主要是讲共产党员先烈们的英勇悲壮、坚贞不屈的伟大事迹，坚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和英勇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斗争，保卫党的利益，严守党的秘密纪律，不自首、不叛变。要经常给大家讲形势，以鼓舞大家的信心和斗志。还有抓增强党性和整顿党风精神的教育，对巩固党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任何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在这几年里，特别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有一部分党员，主要是基层的党员，被敌人的嚣张气焰吓倒了，自动退党的约有三、四百人。

总之，从一九三九年秋开始，到一九四一年底，川东的党组织陆续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情况，特别是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被破坏得多一些。但是，川东特委、重庆市委及所属各区委，除个别人出事外，党组织都没有被破坏过。一部分中心县和县的党组织也没有遭破坏，到一九四三年九月间川东特委撤销时为止，它们始终正常地工作着。

(七) 撤销川东特委，返回延安

一九四三年夏，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党的“七大”也将要召开，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把我调回办事处待机返延安，同时将川东特委撤销，分别成立了下川东特委和上川东特委。我在办事处住了半年多时间，于一九四四年三月间回到了延安。从此，我就结束了地下党的革命生活。

(八) 历史事实，不容颠倒

这里，我有责任，也很有必要，为四川党组织的这段历史，提出实事求是的看法，把一度被康生之流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一九四二年延安“抢救”运动时，康生以极左的

面貌出现，有意诬陷好人，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刑逼供。从四川回到延安参加“抢救”运动的人，有的人在被逼供的情况下，乱说四川党是国民党搞的，是假党，实际上是特务组织。据此，康生就把四川党诬之为“红旗党”，进而对四川党的许多同志倍加折磨，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个问题中央已经发文平了反。

抗日战争时期重新建立的四川党组织，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的。省工委成员都是中央确定的；各地党组织是省工委直接派人去按照党的指示发展建立的。川东特委所有先后成员，除杨述一人曾被捕，但表现很好，经南方局很快营救出狱外，其余的同志都未出问题，坚持工作到南方局将其调走。这个时期的四川党组织，根本不存在什么“假党”、“红旗党”之类的问题。所谓“红旗党”之说，纯系是对四川党组织历史的诬陷。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到“七大”以后的一次会议时才有了一致的看法。当时参加会议的十几个四川干部一致认为：四川党组织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近一年的时间内，虽然也受了王明右倾思想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在发展党员的问题上，要求过急，降低了党员入党条件，以致有一部分党员质量差，不仅影响党的战斗力，还增加了以后巩固工作的困难；但总的来说，基本上还是执行了

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特别是南方局成立以后，四川党组织在周恩来同志的长期亲自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重大成绩。四川党组织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有些我们应负重要责任，但成绩是主要的。所有在四川坚持了地下斗争的同志，对革命都是做了一定贡献的。诬蔑不实之词必须推翻，历史事实不容颠倒。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委组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是中共南方局下面两大工委之一。南委存在的历史虽然不长（从一九四〇年十月建立，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机关被破坏，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对南方几省工作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建立经过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建立的。

一九四〇年九月，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即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书记方方奉命到达重庆，十月间参加南方局在红岩召开的一次会议。会上，博古代表南方局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统一南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由方方、张文彬、涂振农、王涛、郭潜等五

人组成，方方为书记，张文彬为副书记。会议还决定，南委机关设在广东大埔县境内。人事安排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原粤北省委书记张文彬和原江西省委书记郭潜调南委工作，原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谢育才调江西省委书记，原湘南特委书记王涛调闽西特委书记。

同年十一月初，方方回到韶关与张文彬研究之后，即回到闽粤赣边省委所在地广东梅县，召开部分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和南方局关于成立南委的决定。会上，研究了有关筹建南委的具体工作问题，决定撤销原闽粤赣边省委，其所属的党组织分为潮梅、闽西、闽南三个特委。并决定原在闽南工作的钱兴调往广西，闽南特委由朱曼平负责。闽西特委由王涛负责，潮梅特委由姚铎负责。对其他干部也作了适当安排。随后，方方等及机关工作人员，先后移驻埔北漳溪黄沙一带，方方本人住大溪背饶德安家里。

一九四一年二、三月，南委机关迁至埔南恭州，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研究了南委的分工：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兼组织部长），组织部副部长郭潜（后来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涂振农，委员王涛（兼闽西特委书记），秘书长姚铎。其时，南委电台已迁到平和长乐，并已正式工作，和各地党组织电台开始联系。

同年四月，张文彬、郭潜、涂振农等先后到职。

七月，姚铎也调离潮梅特委到南委任秘书长，南委工作逐步转入正常。

二、南委机关、下属组织及人事安排

(一)南委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南委机关一直设在广东省大埔县境内。一九四一年初，设在大埔西河漳北黄沙一带；同年二月，迁至恭州；九月经高陂迁至埔东，在大埔角、墩背、百侯设三个点：

大埔角新墟开设“天成”杂货店，作为机关的掩护。方方化名“王子华”为老板，店员有曾友深、涂锐添、段俊豪等人；当时方方住在二里外的黄维礼家，同住的有郑小平（方方当时的爱人）、章姆、许英、陈锦卿等人；

墩背罗梯云家，住涂振农、姚铎及机关工作人员蔡瑜、张子芳（王涛的爱人）等；刘永生、黄月英夫妇亦住在近处；

百侯大产坵杨保华家，住南委秘书陈华和机要交通陈铁；张文彬等亦曾在此短期住过。

南委机关工作人员的主要分工是：李碧山负责选定南委机关驻地，领导南委机关所在地的党组织，以及南委电台的全面工作；秘书陈华主管对内对外联络、

交通和南委电台的后勤保障工作；方东平负责政治联络工作；蔡瑜为机关支部书记；刘永生、黄月英负责南委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

（二）南委所属各省委、特委组织

机构与主要干部配备（略）^①

（三）南委的秘密电台（即平和台）

南委电台的前身，是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即闽粤赣边省委）电台。特委电台建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地点在广东梅县雁洋南福村陈卜人的家里。一九四〇年夏，特委电台先迁至梅县与松口之间的悦来村，接着又于同年八月迁到福建省永定地区的沿田村和大埔西河的拖竹岭，这以后即开始着手筹备扩建为南委秘密电台的工作。

一九四〇年十月，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又增派电台和机要人员来沿田，参加建南委电台工作。一九四一年二月（春节前），在李碧山同志的亲自安排下，电台全部人员先后由永定沿田出发，安全转移到福建平和长乐地区，在下村大窠里的乌旗山上搭寮建台，中共南委秘密电台（即平和台）宣告成立，并即开始工作。

^① 见本书17、18、19页。

一九四一年六月，根据南委的决定，南委电台抽出部分人员，建立了一预备台（即新闻台）以应付紧急需要。预备台设在广东大埔百侯村山下坪见南轩，离南委电台约七十华里。

南委电台从建台至一九四二年六月南委事件时结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全体人员的艰苦奋斗和群众的支援，出色地完成了同上级领导机关电台和有关党组织电台的电讯联络工作。当时曾经建立正式联系的计有：中央台（延安中央军委三局电台）、重庆台（中共南方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桂林台；还有粤北省委电台、粤南省委电台、江西省委电台和东江电台。

南委电台人员最集中时约有三十人。其主要工作人员是：台长王清生；政治指导员温碧珍；报务主任钟尚清；机要科负责人袁克伦等。

（四）南委的交通站

南委的交通站共有八处：

百侯交通站（设在茶亭下侯西小学），刘旭负责，由南委直接管理；

高陂交通站（设在大埔高陂镇河边街，以“鸿达糖粉行”为掩护），杜国宗负责，由南委直接管理；

大麻交通站（设在裕州小学），委托埔南县委代

管；

梅县交通站（设在中华印刷所），王华生负责，由南委直接管理；梅县另一交通站设在米铺，由潮梅特委代管；

兴宁交通站（设在健生药房），吴仕良负责，由潮梅特委代管；

曲江交通站（即南委曲江办事处，设在风渡中印刷所、纸铺等处），司徒丙鹤负责，由粤北省委代管；

桂林联络站，徐扬、王珉负责；

一九四一年六月，南委曾派张克、汤诚等赴上海，拟开辟汕头——香港——上海交通线，并与新四军建立联系，后因南委事件发生未能实现。

三、南委成立后的工作情况

南委成立之际，正是国民党反共逆流冲击到南方各地的高潮时期。南委的工作，是根据中共南方局关于一切工作以巩固党组织为当前中心工作的指示，继续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关于老苏区、老游击区的工作方针进行的。

贯彻“荫蔽精干”方针，转移暴露色彩的干部。

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一九四〇年初，我党领导的公开群众组织即先后被迫解散和停止活动。南委成立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撤退和转移已经暴露的干部和党员，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被送到新四军和延安等地；有的在本地区进行交流，比如，从潮汕调到兴梅，兴梅调到闽西南等地，有效地保存了党的力量。

组织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机会，广泛打入国民党所统管的管、教、养、卫等各个部门（即国民党的政府、文化教育、生产和武装保卫部门）。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放在“合法斗争”方面，密切联系群众，长期埋伏。

审查党员、干部（逐级普查至区一级）。这项工作实际上一九四〇年春就已开始，目的是巩固党组织，以应付突然事变，把有自首行为的人和敌对、堕落腐化分子清除出去；把觉悟不高、消极的分子“放弃”（即不再联系）。经过审查，虽然党员人数几乎减少一半，但队伍更加精干了。同时，加强党员教育，特别是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为此，南委还创办了党内刊物《学习》，刊登报道有关上述精神的文章，交流情况，供党内同志学习。

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如调查研究国民党十二集团军，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妇女会问题等。

改变党的领导体制。一九四一年春，闽西地区国民党顽固派集结兵力袭击老苏区的一些村庄，强迫青年签名自首；在潮梅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压迫进步力量，取消进步团体，逮捕共产党员等事件不断发生。针对这个情况，南委指示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南方局指示，切实做好隐蔽工作，改变活动方式，并决定改变整个领导体制，由党委负责制改为特派员负责制，实行单线联系，不召开会议，建立单线组织。一九四一年九月，南委曾对粤南省委发出如下指示：“为了适应长期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组织工作仍以巩固发展、稳扎稳打为主，对已被破坏及暴露地区，应坚持执行周恩来同志指示，抛弃一切已暴露的关系和组织，坚决建立自上而下的平行组织，甚至建立平行特委组织，彼此绝不发生横的联系”。

南委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老苏区、老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积极加强对武装斗争工作的领导。当时，南委所属琼崖、东江和潮汕沦陷区等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正蓬勃发展；闽西南等老苏区、老游击区继续坚持了武装斗争。这些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具有长期的反共经验，手段又极其残酷，为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闽西南的党组织依靠革命武装力量，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反顽斗争，及时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为保卫老苏区人民群众的利益，保

存党的力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对香港、九龙发起进攻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滞留香港、九龙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一些国际友人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于是，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即在香港、惠阳召集广东党组织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尹林平、梁广、梁鸿钧、连贯、曾生、王作尧、杨康华、黄宇、乔冠华、刘少文等进行研究部署。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战斗，胜利完成了任务，抢救出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何香凝、柳亚子、茅盾等共三百多人，安全护送到大后方；并抢救了英、美、荷、比、印等一批国际友人，受到中央的表扬，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适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发展，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南方局有关指示精神，南委副书记张文彬曾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深入中共粤北、粤南省委领导的地区，召开会议，视察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并检查、总结和指导了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召开的中共粤南省委扩大会议上，张文彬代表南委宣布了撤销粤南省委和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广东军政委员会以尹林平为书记，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杨康华、林锵云、罗范

群为委员，统一领导东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的党、政、军工作。粤南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决定健全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建制，设立总队部和政治部。梁鸿钧任总队长，尹林平任政委，曾生任副总队长，王作尧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杨康华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东明任政治部副主任，邬强任参谋处长。整编了队伍，成立了五个大队，为后来东江部队的壮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四二年春，闽粤边委成立后，为发展党的工作、保存革命力量、坚持和发展武装斗争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四二年春，南委总结一年多来的工作，写出了有关组织、宣传、反顽和公开合法斗争等书面总结，并通过电台向南方局和党中央汇报。后因发生事变，有关组织、宣传两项未能发出，许多工作也不得不中断。

四、南委事件始末

一九四二年六月，南委因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这是继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又一严重反共事件。

一九四一年五月，谢育才和他的妻子王勛一同离南委去江西接任江西省委书记职务（其时原省委书记

郭潜已离任，由军事部长颜福华代理书记，谢、郭未见面），六月抵江西吉安，住省委统战部长林民风（鸣凤）家。七月初，同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一同前往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安福山（即安福、永新、莲花三县边界之洋溪山）。谢妻王勛将临产，骆妻生病，均留在吉安。

谢育才到达省委机关之后，看了前任省委书记郭潜写的三年工作总结报告，又听了代理书记颜福华的情况介绍，知道在郭潜离开江西之前，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除赣西南特委之外，已经遭到破坏，省委机关也不健全。但在郭潜对中央和南委的报告中，并未真实地反映全面情况。他即在上山的第四天，向南委发了第一次电报，隔天，南委复电，要他立即到广东曲江某地联系。谢育才遂决定先到吉安搞到路条之后再前往曲江，即与骆奇勋一起，跟着省委交通李铁拐下山奔吉安。七月十五日到达吉安，住木匠街一家旅馆。当晚八时，谢育才和骆奇勋分别遭国民党中统局设在江西的特务机关江西省调统室的行动队密捕。

原来，江西省委交通李铁拐（原名萧三省）以及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等，不久前已被捕叛变。他们是在敌人指使下，将谢、骆带回吉安进行逮捕的。骆奇勋被捕后即叛变，并向敌人供出谢育才此行是准备到曲江与南委联系，以及谢妻隐蔽在吉安林民风家

里等等情况。随后，谢妻王勛及林民风夫妇也先后被捕。

谢育才被捕后，敌人即假借谢育才的名义，写信给代理省委书记颜福华，诈称谢病滞留吉安，要他来吉商讨工作。颜福华即来吉安而被捕。不久颜福华也叛变投敌，并死心塌地为国民党特务卖命。接着，江西省委电台被破坏，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全部被捕，在中统特务和叛徒颜福华的裹胁下，电台台长林云生等也先后叛变。从此，江西省委机关遂为中统局江西特务机关所控制。

一九四一年八月，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冯琦（叛徒，原名徐锡根，投敌后任中统局委员、高干会主席兼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来到吉安，会同江西调统室代理主任张殷白和特种工作办事处总干事庄祖芳，共同策划破坏南委及其所属组织的阴谋。他们为了对南委严密封锁消息，将在吉安的所有与广东有关的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全部拘捕；并命原江西省委的电台人员，仍照过去的信号、波长、密码，时断时续地对南委电台发出呼叫，企图骗取南委的信任。

为了获取有关南委的情报，敌人加紧了对谢育才的逼迫。开始，由庄祖芳等特务头目亲自审讯、迫降；继而又让叛徒颜福华前去诱劝，均遭拒绝。后来又把谢育才夫妇及未满月的婴儿，一起押解泰和（当时为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所在地），囚禁于马家洲集中营。一九四二年二月，调统室行动队特务又对谢育才夫妇施以酷刑。据谢育才后来交代：他通过与这些叛徒、特务的接触，判明江西省委已遭彻底破坏，敌人主要目标已对准南委，情势十分危急。为了向南委报信，应付敌人，争取出狱，遂填写了自首书。敌人为争取谢育才为他们卖命，将谢、王夫妇放出集中营，软禁于吉安庄祖芳寓所院内，在生活上给以优待。

一九四二年二月（春节后），南委电台接到重庆电台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内，南委电台正在与其它电台通电时，江西电台突然用同样的波长插了进来，诡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起初，南委负责同志认为江西电台已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应有所警惕，于是决定：首先，考查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它说明中断原因；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江西的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则诡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和“情况不明”等等。南委书记方方曾将此情况提交涂振农、郭潜等研究，他们都认为没有问题。于是，四月，南委决定派郭潜到曲江传达一年工作总结

和检查江西的工作。并给谢育才发了一封明文隐语的信，要他于五月中旬到曲江某处（开列了曲江接头地点）与“二叔”（即郭潜）见面。郭潜随后即离南委去曲江。

敌人获取了南委通知谢育才去曲江联系的重要情报之后，立即商议诱捕郭潜的阴谋。据谢育才后来交代：这期间敌人讯问过他有关南委驻地和“全福处”是人名还是地名等情况。他搪塞敌人说“全福处”是地名，在龙岩白土区（实际上“全福”即张全福，当时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的区委书记）。

谢育才预感到南委危在旦夕；同时又从敌人口中猜测到如找到张全福就可以找到南委。于是，夫妇两人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深夜，趁看守人员的疏忽，丢下婴儿，越窗跳墙逃跑。五月二十二日逃到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的下洋村，找到张全福（区委书记，并负责南委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正好负责南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刘永生也在。谢即向他们汇报了江西省委已遭破坏的情况，刘永生要他连夜写个简要的书面报告。次日，刘亲自将报告带交给南委书记方方。据此，方方指示：立即将谢育才转移监护起来，继续审查，弄清情况；电台准备转移，加强警戒。并于五月二十四日给在曲江的郭潜发了一个密码电报，要他取消与江西的联系，立即撤退。

郭潜于四月离开南委，到曲江小住了一段时间（其妻李健住在曲江）。于五月初到广西桂林领取了南方局汇来给南委的经费十万元，五月二十六日回到曲江。他虽然收到了南委发来的电报，但未及时将密码译出，丝毫不撤离的准备。而国民党中统特务和叛徒们，早已在交通站周围等地，布下了盯梢、监视的密探。是日傍晚，郭潜偕交通员曾平外出吃饭，为叛徒孔昭新、罗卓明发现，两人同时被捕。当晚，敌人就在中统广东调统室禁闭所——“基庐”对郭潜进行突击审讯，郭潜叛变，并和敌人订了协议：1. 将从桂林领回的十万元中给他一万元（实际上后来郭潜要了三万元）；2. 不公开其叛徒面目；3. 保证其人身安全等。郭潜的老婆李健也随即叛变。

郭潜当晚即引领敌人破坏了南委曲江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司徒丙鹤夫妇、交通员曾二叔被捕。二十七日凌晨，郭潜又引领特务到曲江市郊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家中，抓走李大林夫妇、弟妹、译电员、保姆等七人。二十七日早上，郭潜和特务们从李大林家里出来路经五里亭车站附近，正巧遇到从东江老隆回来的粤北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又随即将饶逮捕。也是由于郭潜的引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撤回在乐昌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于五月三十日被捕。

六月初，中统特务庄祖芳等十余人，在叛徒郭潜

的引领下，自曲江出发，专程奔向粤东破坏我南委机关。他们到达兴宁之后，又得到国民党闽粤赣边区司令长官香翰屏的支持，派出政治部主任林鸿翥（又名林雁峰）并数名武装人员同行。

由于南委领导已从谢育才的报告中得悉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并对粤北形势有所警惕，南委书记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作出应变计划。除上述电示郭潜立即撤退之外，主要是：通知在大埔角的南委机关干部，立即转移到百侯隐蔽待命；彻底清理文件；加强电台的保卫工作，准备疏散转移；确定主要干部撤退路线和去处。安排张文彬经兴梅往东江；涂振农经饶平去潮汕；方方先转移到百侯，亲自指挥整个机关的转移撤退，情况如有变化即向福建方面转移等。为了不致引起混乱，一切撤退工作均秘密进行。至五月底，主要据点大埔角已完全撤出，只剩下“天成”号的两个“店员”支撑门面，掩护撤退。

由于六月三日发生了福建保安团袭击平和电台事件（此事与南委事件本身无直接关联，是因为电台摇机员陈学平叛变投敌引起的），进一步促使南委加速人员疏散的行动。方方在安排好南委主要干部及电台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之后，于六月六日离开百侯，安全撤退到埔北山村隐蔽。

六月六日，庄祖芳等一伙武装特务，在叛徒郭潜

的引领下到达大埔高陂镇。于是，接连发生以下情况：

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偕交通员王亚华，于六月五日从墩背出发去潮汕，原定路线是经饶平走山路去的，但他临时改道拟经高陂乘轮船顺韩江而下。他们五日抵高陂，六日中午在高陂轮船码头等南下的轮船，正好碰到郭潜等一伙叛徒、特务从松口乘船南下到达高陂码头，不期而遇，因而被捕。

郭潜等又立即从轮船码头奔向高陂镇，包围了真真照相馆（真真照相馆的楼上，就是南委高陂交通站——“鸿达”糖粉行），交通站负责人杜国宗被捕。当天下午高陂中学一批学生因到真真照相馆取照片也被扣留；该校校长王道生（地下党区委书记）前去交涉，郭潜认得他，因而被捕。

同日下午，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在丘鸿耀（百侯的小学教员、地下党员）、挑夫丘解老妈妈（百侯交通员杨保华的母亲）护送下到达高陂。丘解老妈妈拿着张文彬的信到高陂交通站提取存款，为郭潜所发现，特务们立即追到高陂镇德和旅店逮捕了张文彬，和住在近处茶江旅店的丘鸿耀。

当天晚上，这伙武装特务（包括国民党高陂区署派出的武装人员）在郭潜引领下，逼着涂振农的交通员王亚华带路，直扑大埔角（离高陂五十里）。七日凌晨到达，分头包围了“天成”号和方方在新村的住

地。新村的群众因受过党的教育，发现这一情况立即鸣锣吹号，点起火把，大呼“土匪来了！”敌人不明虚实，仓惶退去。他们害怕墩背还有武装，不敢前去，只在大埔角抓了“天成”号店员曾友深，便慌忙退回高陂。并于当晚押着张文彬、涂振农、杜国宗和丘鸿耀等，乘船离开高陂，而把王道生、丘解老妈妈等，交高陂区署转送到国民党大埔县监狱。

在大埔角发生以上情况时，南委机关另一住地墩背，很快就得到群众报来的信，立即转移。随后，姚铎、蔡瑜、张子房等按原计划经饶平疏散到了潮汕；刘永生、黄月英安全转移到了闽西。

南委机关的另一个点百侯，大多数工作人员在事变期间都已先后撤走。当时，郭潜等也没有去。直到六月十七日，国民党闽粤赣边区司令部才派了政治部主任林雁峰等二十余名武装便衣特务进去，重点注意百侯中学。由于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做得较好，并经罗明（当时是百侯中学的代理校长）等积极活动，推举百侯中学的名誉校长杨德昭（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有一定影响）出来周旋，敌人驻了几天就走了。不过，他们还是设下了一个诱捕南委交通、地下党员杨保华的圈套。杨保华听说张文彬在高陂被捕后，本已出去隐蔽；当地国民党区署欺骗说只要他出来就可以将其母保释出狱。七月初，杨受骗出来，一回村即遭区署逮

捕，并立即被押解曲江陆军监狱。

在中统特务袭击南委机关之后约一个月，即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他们又在叛徒郭潜的引领下前往广西桂林，破坏了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工委副书记苏曼，桂林市委书记兼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市委委员张丽贞、梁耀宝，南委交通员张海萍，以及王祥初、彭维之等共二十九人被捕。省工委书记钱兴幸得房东掩护，脱险撤到灵川。这就是广西“七·九”事件，为南委事件的尾声。

五、南委事件的善后情况

事件发生后，南方局曾及时地多次发出指示，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了事态的发展，保护了广大干部和南方各地党的组织。指示中还一再表达了中央对南委主要领导方方等安全的深切关怀，要方了解“中央以领导干部的安全为第一的重要意义”，要他立即停止工作，转移到安全的地区去；并表达了方方一日不安全，中央和南方局领导就一日不安宁的关切心情。南委事件的善后工作，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有关指示进行的。

粤北省委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八日，粤北省委秘书长严重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一，立即派

人分别通知省委各部和有关同志转移隐蔽；二，通过省委电台电告南委和方方（按：实际上方方直到六月十二日前后才得到消息）；三，向中共南方局周恩来报告粤北省委被破坏的情况，请示应变办法。按照紧急部署，省委各部负责人饶彰风、黄康、李殷丹、陈能兴、张江明等，及省委电台和下属组织的同志，都分别安全撤退到东江部队中和粤北、西江、桂林等地隐蔽；省委秘书长严重则留在曲江做善后工作。

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从粤北省委来电获悉省委被破坏消息后，于六月八日发出《对南委行动的指示》。指示中说：“一，不仅与江西而且与粤北断绝一切来往，南委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首求自保；二，南委与承志同志及香港归来的一切公开关系完全断绝（包括邹、柳两人——按：指邹韬奋、柳亚子），他们的关系，我们另设法联络；三，停止派人往桂林取款，以避波及；四，立即斩断一切上层的公开关系；五，你们直接管辖的下级党部暂作静止，不作声息，不做任何活动；六，立即停止与江西电台联络”（按：由于南委电台六月三日已疏散，方方没有能够及时接到这个指示）。

同年八月，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经请示中央同意，又向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发出电报指示，指出：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

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一律转移到游击区工作，其余干部应利用教书、做工、做小商贩等各种社会职业作掩护，实行勤学、勤职、勤交友等“三勤”活动。何时恢复组织活动，等待中央指示决定。并指示尹林平，迅速传达到他所知道的党组织。

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即迅速传达贯彻。原粤北省委所属党组织，由严重、陈能兴、张江明、王炎光、欧新等传达贯彻；各特委负责同志冯燊、梁嘉、黄松坚、刘田夫、梁威林等，分头到粤中、北江、西江和湛江等地传达贯彻，并认真做好安全转移和隐蔽工作。南路特委得悉中共南方局指示后，经研究认为事件与该地区关系不大，向南方局请示后得到同意，仍坚持活动，并加强安全措施，免受破坏。

六月六日，正当郭潜等一伙叛徒特务包围、搜查高陂南委交通站的时候，潮梅特委委员张克正好到达高陂，目击当时情况，立即赶回揭阳向潮梅副特派员李平汇报。李平认为形势十分严重，估计南委机关可能遭到破坏，便当机立断，采取了如下措施：马上切断与南委的一切交通联系，撤退潮梅与南委交通站有过关系的人员；提高警惕，作好一切必要准备，以防地方党组织受到牵连破坏；把情况火速通知在梅县的潮梅特派员林美南；决定立即派张克到重庆向中共中

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汇报情况，并向设在桂林的南委联络站负责人徐扬等通报情况。

张克到重庆后，将有关情况向周恩来和孔原作了汇报。听完报告后，周恩来指示：继续贯彻中央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南委所管组织暂时停止组织活动（但有些地区个别领导，如潮梅、闽西后来误传成“解散组织”），上下级不要发生组织关系，不发指示，不开会，支部也暂时不开会，不收党费，党员之间互相不发生组织关系，何时恢复组织活动，等待通知决定；暴露的干部中，有的分批撤到重庆转延安学习，有条件的也可自己转移地区；党员的任务是勤学、勤职、勤交朋友。方方在有安全保障的条件下，也应坚决撤退到重庆。

张克同志于九月上旬回到揭阳，先后向林美南、李平并通过林美南向方方传达了南方局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方方根据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情况作了具体补充和部署：一，撤退不是“卷土而走”，要留根子（即“观察员”）。党组织停止活动后，原有支部或小组都必须留一条“根子”。要求“根子”政治上可靠，政治面目没有暴露，能联系群众，其任务是了解党员在停止组织活动期间的言行和思想工作状况，为将来恢复组织作好准备；二，撤退并非溃退，要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先撤退暴露的干部，后撤退外地机要人员。

三，停止工作，组织分散，但对下属要做好具体安置，比如，撤退路线，路条、路费以及隐蔽地点都应做具体部署。方方还根据各地区的斗争实际强调指出：沦陷区（指日占区）的党组织及其领导机关继续保持活动和对敌开展武装斗争，以支持群众、保护群众利益；闽西南已开展武装斗争的特殊区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以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方方还指定了李碧山为联络员，一面负责与中央联络；一面负责与潮梅和闽西南等地的联络。

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和南委的部署，中共潮梅特派员林美南、副特派员李平以及方东平、罗天、方向明、吴南生等分头向潮汕、兴梅等地各级党组织逐级传达；闽西南则由李碧山负责传达。李碧山不仅组织干部转向生产进行隐蔽，而且坚持做好上与中共南方局、下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林美南以在梅县开办的农场为掩护，坚守岗位，切实做好疏散、转移干部的工作；闽粤边委领导朱曼平、魏金水和张招娣，深入闽西南山区，一面组织生产，一面坚持领导武装斗争。由于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同志沉着、冷静，使撤退转移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方方把南委所属各地党组织的工作部署完毕后，即转移到梅县桃源，以商人身分隐蔽在地下党员张春

汉家里，后又转移到闽粤边峰市（属福建永定地区）。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深夜，被当地土匪当作富商绑架，后经组织营救赎出，为避免意外的牵连，遂离梅赴揭阳，住在林美南乡下的亲戚家。

十月下旬，李平按方方指示前往重庆，向南方局周恩来、孔原汇报南委事件经过和善后工作等情况，以后他就留在南方局机关了。

同年十二月中旬，张克从重庆回来，传达了南方局要方方尽快赴渝的指示。方方即作去渝准备：先从澄海东陇调王华生到揭阳来，利用社会关系，在揭阳开了一家木炭行，以参加商会和取得“合法”身份。至一九四三年四月，准备基本就绪，又接南方局指示，要他经大后方路线赴渝。他们遂办理了进货、交税和路条等手续，于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出发。先由吴南生同志送到丰顺汤坑，以后又在王华生的陪送下，沿着大后方路线（即经兴梅、曲江、衡阳、贵阳等地）奔赴重庆，回到了南方局领导机关。同年六月二十八日，方方随周恩来回延安。

南委所属各地党组织的绝大多数党员（包括个别地区将南方局关于“暂时停止组织活动”指示误传为“解散组织”，因而散失组织关系的多数同志），都能认真贯彻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广交朋友，认真开展好“三勤”活动，团

结了广大群众，保持共产党员本色。一九四二年底，中共南方局根据形势的发展，指示广东党组织，以尹林平、梁广、连贯组成临时省委。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成立，以尹林平为书记。省临委成立后，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地恢复组织活动。一九四四年以后，各地党组织陆续恢复活动，工作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日寇侵占韶关，打通粤汉线时，各地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东江纵队和各地抗日游击队。粤北乐昌、坪石的中山大学地下党组织，先后动员大批党员和知识青年参加东江纵队，扩大发展抗日武装队伍。潮汕地区恢复党组织活动后，也动员了大批共产党员、知识青年和进步分子参加人民抗日武装，使潮汕游击队从几十个人的队伍，迅速发展成为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千多人的韩江纵队。闽西南和粤东地区，在中共闽粤边委的领导下，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建立经济武装工作队，开展武装斗争；一九四三年底恢复了党组织活动；一九四四年十月，在经济武装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王涛支队（即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闽粤赣边纵队的前身）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转战闽粤赣边，为迎接全国解放，锻炼和造就了一批军事工作骨干。

在南委事件被捕的人员中，除郭潜、涂振农等极少数败类变节投敌外，绝大多数同志坚持斗争，百折

不挠，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廖承志在狱中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南方局不断交涉、抗议，和在旧政协会议上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当局对廖承志无条件释放。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在狱中长期坚持对敌斗争，铁骨铮铮，正义凛然，受尽折磨，为党的正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张文彬的护送人员丘鸿耀，南委交通杨保华等，都为保守党的机密，维护革命利益，受尽酷刑，英勇牺牲。他们的高风亮节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将受到人们的永远敬仰和怀念！

回忆南方局成立前后 湖南地下党的工作

高文华

南方局成立前

湖南地下党组织，自“七七”事变后着手恢复、组建，发展到成立省委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从省到许多县及其所属各级，都有党的组织网络。党员成份，由初期的三股主要力量（即“七七”事变后返湘和当地的爱国学生、进步知识分子，党中央从延安及外地派来湖南的党员，大革命失败后长期隐蔽下来的党员），发展到工、农、商、学、兵兼有。在党组织的恢复、发展过程中，革命的知识分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最早返湘并着手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的，是北京“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曹国枢（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曹国智（北师大历史系学生）、肖敏颂（北大

政治系学生)等。他们都是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入党的，毕业后响应党组织提出的“返乡运动”，返回长沙。

他们到长沙没有几天，就发生了“七七”事变。他们找到了当地学生中“民先队”的老关系，在长沙自治女校办了个暑期补习班，共收了一百来个学生，由曹国枢、李荫深、陈训英、徐德芳等利用文化补习的机会，宣传民族危亡的局势，宣传爱国的民族英雄，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后，湖南的国民党军阀何键也做出支持前线抗日将士的姿态，还登报宣称组织“湖南省妇女界慰劳前线抗战将士委员会”（简称“妇慰会”），并让其女儿何梅当主任，号召各界妇女参加。曹国枢等商定派李荫深等带了一百来名女学生去参加成立大会。我们的人占了一半。提名选举理事时，曹国枢、李荫深等三、四位同志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理事。

随后，返湘的文化界的党员和爱国人士谭丕谟、吕振羽、李仲融、张署和返湘的青年学生曹国枢、杨隆玉（杨根）、吴磊伯、黎澍苍（黎澍）、黄启威、黄克新、宋绍尧、陈泽云（于刚）、程绯英（陈德明）、苏镜、冯秀藻、杨润湘、李声玄，以及当地的进步青年学生廖申之（廖意林）、章东岩、李含威、黄时宇等发起组织了“前进社”，并推选曹国枢为社长。还

决定出版《前进》周刊，由肖敏颂担任总编辑，黄启威任经理。不久李声玄等又创办了《民族呼声》。

这年九月，曹国枢利用国民党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机会，吸收了一百多人，组织“战时劳动服务团”，走上街头，演剧唱歌、办墙报、慰劳伤兵。

随后，杨隆玉、黎澍、王德昭、汤德明、曹国枢、潘开茨等发起创办《观察日报》。唐文燮和邓克生从家里拿出了几千块光洋资助办报。报社总经理是唐文燮，社长先是王南秋，后是潘开茨；总编辑是杨隆玉；主笔是李声玄。

到十一月，来长沙的文化界爱国人士愈来愈多。陈润潜、李仲融、谭丕谟、吕振羽、张天翼等人主张以“前进社”和《观察日报》为基础，组织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吸收了大批旅湘的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了理事会。理事长由国民党省党部常委陈大容兼任。

“文抗会”出版会刊，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组织歌咏队、街头剧队、新文字世界语宣传团；举行讲演会、讨论会，“战时问题讲座”等活动。

“文抗会”在湘潭、衡阳等七个县成立了分会。“文抗会”内成立了六个党支部，负责与长沙周围地区的积极分子联系。

在各群众组织中，“文抗会”最有影响。

一九三七年九月，徐特立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公开身份来湘组建八路军驻长沙通讯处（后改为办事处），处长是王凌波。徐老积极地在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物中间做统战工作，并指导党内工作。他每个星期都要应邀到抗日救亡团体去演讲，每次演讲都吸引了很多人。徐老的活动在长沙影响很大，使各界人士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使我党的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文抗会”自邀请徐老作了一次团结抗日的报告后，声誉大振，许多进步青年踊跃而来，要求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这些青年，有的被介绍去了延安，有的在“文抗会”的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经董必武同志交涉，任作民从国民党“武汉反省院”释放出来。他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派到湖南与曹国枢接头。曹向他介绍了党的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情况。随后，任作民又分别与“文抗会”、“中苏友好文化协会”（由吕振羽发起组织的）、“学生抗敌后援会”（由丁务淳、苏镜组织的）及《观察日报》、《现实》（廖申之主编）、《前线》（肖敏颂主编）、《火线下》（杨隆玉、黎澍、唐文燮等主编）、《民族呼声》（李声玄、魏孟光、冯秀藻、杨荣国主编）、《抗战日报》（田汉、廖沫沙等主编）等团体、报刊取

得联系。并以“文抗会”为主要力量，先组成了长沙市文委，书记是丁务淳，一个月后由李声玄接任。文委领导十几个支部，如文抗支部、银行支部、中学支部、一九三六剧社支部、新声歌咏队支部、邮电支部、职抗支部等等。至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正式成立了长沙市委，任作民为书记。市委下设二个区委：一是南区区委，另一是北区区委。与此同时，任作民还与湘北特委（也叫湘江特委，活动于长沙、益阳、岳阳、湘阴等地，原属湘鄂赣苏区领导）和湘南特委（原属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领导）取得联系。然后把这三部分党组织（即长沙市、湘北、湘南）合在一起，成立了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省工委书记任作民，组织部长袁策夷，宣传部长谭丕谟。任作民仍兼任长沙市委书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我从延安到湖南接替任作民的工作。同到湖南的有郭光洲、白云（王铁铮）、欧阳奔程（欧阳方）、邹克之、张竹如和我爱人贾琏等。我和郭光洲留在省工委；白云到“文抗会”，并与陈泽云和李锐等组建了“青年运动委员会”（陈泽云是青委书记）；欧阳奔程到长沙市委；邹克之和张竹如搞妇女工作。一九三八年初帅孟奇也来到长沙，负责全省的妇女工作。贾琏来长沙后也搞妇女工作。

一九三八年五月，袁策夷调延安。任作民也要去

延安，经我挽留未成行。于是长江局先后派来聂洪钧、蔡书彬二同志。我们重新调整了省工委的领导：书记高文华，组织部长郭光洲，宣传部长谭丕谟，军事部长聂洪钧，秘书长帅孟奇，委员王涛（湘南特委负责人）。任作民的长沙市委书记职务，由丁务淳接任。

新的省工委组成后，我们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寻找“旧关系”，利用“旧关系”建立“新关系”。“七七”事变后派来湖南的同志中，有好多是湖南籍或曾在湖南工作过的，因此，省工委要求他们尽力设法寻找“老关系”，建立可依靠的基础。通过这些基础力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实际斗争的考验中，恢复一些老同志的组织关系和发展党的组织。

二是加强对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的领导，扩大我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影响。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长沙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不同类型的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涌现。这些救亡团体的政治倾向，大致分两类：一是在我党领导或影响下组建的；一是国民党省政府或省党部搞起来的。虽然还有一些是由第三势力（或中间势力）组织的，但总是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摆动。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掌握各群众团体的政治倾向，对于那些国民党组织的或有国民党为政治背景的群众团体，我们则采取既与其团结抗战，

又警惕其可能出现的反动的一面。并派我们的同志，参加这类组织，尽力做争取工作。

三是举办各类训练班，培养党的骨干力量。当时，各类训练班办得很多，有“党的政策训练班”、“战时教育训练班”、“战时救护训练班”、“游击战争干部训练班”、“党内工作干部训练班”等等。省工委、各中心县委和党的基层组织层层办班。这些训练班，为党输送了很多人才，为抗日救亡运动增添了生力军。在这些同志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四是向全省各地，特别是我党工作的“死角”之地选派党的骨干分子去开展工作；充实各级党组织的核心力量，把抗日救亡的大好形势，由长沙向全省发展。如新化县的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后，一直未恢复起来，派苏镜、张竹如回去后，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五是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宣传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坚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不记旧仇，一心抗日的英勇事迹。我们把《观察日报》改为省工委的机关报，作为及时转达省工委意图的喉舌。还有党内同志主办的《火线下》三日刊、《现实》半月刊、《前进》周刊、《民族呼声》、《大众日报》等，都在面向自己的读者，有针对性地报道抗日消息，阐述革命的道理。廖申之、唐荣前等主办的《现实》半月刊，

是面向广大妇女和一般知识青年的读物。它积极呼吁“全面抗战”、“对日绝交”，反对不让民众起来的半心半意的抗战。黎澍等主办的《火线下》，是“工人的、农民的、市民的、学生的通俗读物”，立足于“中国民众的政治教育，号召中国民众的广大队伍参加抗日战争”，为捍卫祖国，投身于抗日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中去。黎澍等文化界的党员，还利用各种关系时常在国民党办的报刊上，巧妙地开展我们的宣传。

与此同时，以店员、工人为主的职业抗敌后援会和以青年学生、小学教员为主的抗敌工作团或宣传团等群众团体，或宣传于市镇大街小巷，或奔波于穷土僻壤的乡间；各类宣传基站、书店，频繁地交流和发行革命书刊。

六是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在国民党各派系中，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顽固派，一是何键时期各地团防系统的首脑。他们控制了地方武装，并与汉口的大小汉奸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我党同志和革命群众大加残害。二是窃据各县党部书记长及各中等学校校长之职的CC派。他们是反共积极分子、抗战的动摇派。三是中央军队和省政府、各县党部、三青团中的薛岳势力。四是商业界的反动资本家。他们是何键剿共的基本支持势力。

保持中间状态的势力，一是各地乡、保长。他们中

间大多是中、小地主或富农、中农，也有一些贫寒的知识分子和活动能力较强的老贫农。这些人主张抗战，但对我有恐惧心。二是大学、中学的教员和就职于国民党各级党、政、军机构中的公务人员。他们多数是中小地主或居于社会上层的小资产阶级，主张抗战，对我无惧怕心或惧怕心很小。三是杂牌军和地方武装。杂牌军在国民党内部“排斥异己”的倾轧中吃够了苦头；掌握地方团防武装的乡长，有不少是我们的人或倾向于我们的人。所以，杂牌军和各县团防武装，大都靠近于我，主张抗战。四是中等商人和厂主（或资本家）。这一部分人对国民党政治上专横统治，经济上贪污腐化、重税苛捐相加极为不满，不主张“制造磨擦反共”，而赞同联合抗日的主张。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上层（即省级），但主要对象应放在下层。要求党内的同志，要广泛地交朋友。但要求在交朋友的过程中，不经省工委慎审研究决定，一般不以党员的面目出现，而应以亲戚朋友、爱国民族志士等面目相来往。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广泛地开展了工作。

随着以上六个方面工作的不断进展，整个湖南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的组织也发展壮大。就党员人数来说，湘中最多，其次是湘南、湘北。湘西，虽然党员人数比以上三个地区少，但也建立了党的组织。

在全省七十五个县中，有党员的县是五十六个。

为了便于领导，在省工委之下，又分别设立了湘南特委、湘西工作委员会，以及湘宁、两衡、常益、宝属四个中心县委和长沙市委。由中心县委直接领导各县。

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组织部长周里。其管辖范围是郴州、耒阳、常宁、桂阳、宜章、乐昌、资兴、汝城、酃县、桂东等。

湘西工作委员会：书记尹泽南，后由梁春阳、李文定、白云先后接替。其管辖范围是沅陵、溆浦、辰溪、乾城、怀化、凤凰、芷江、麻阳、晃县、大庸等。

湘宁中心县委：书记袁德胜（袁学之）。其管辖范围是湘潭、湘乡、宁乡、长沙西乡、兰田、锡矿山等。

两衡中心县委：负责人宋濂，还有欧阳奔程，屈森成。管辖衡阳、衡山、祁阳、零陵等。

常益中心县委：书记帅孟奇，组织部长文士桢。管辖常德、益阳、汉寿、沅江、桃源、澧县、临澧等。

宝属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主管邵阳、新化、武冈、城步、新宁、绥宁、东安、洞口等。

南方局成立后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

成立的。当时，我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会上决定撤销王明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中央中原局。

会议期间，日寇占领了汉口、岳阳。湖南国民党当局奉蒋介石“焦土抗战”的密令，火烧长沙。长沙大火后，湖南地下党省工委迁至邵阳。因而大会结束后，我就不能再经汉口直接回湖南了，只好绕道而行。与我同行的有徐特立、张文彬、涂振农（后叛变）、曾山和其爱人邓六金、涂国林和一位红军团长。我们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国民党当局得知我们是去后方工作的，便横加阻挠，不予放行。几天后，张文彬先坐飞机走了。随后，徐老和我也相继出发。而其余的十几个人，一直到年底，才被批准放行。

我坐军用卡车，于十一月底到达重庆。由于日寇步步进逼，国民党反动派不战自败，局势日益严重。南方局筹备处的领导同志让我马上回湖南，迅速以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统一党内思想，指导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乘船从水路到了湖北石首县藕池码头，再搭乘小民船经南县、安化、沅江、益阳、宁乡、湘潭、湘乡、永丰（双峰），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到达邵阳。

我向省工委的同志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决定在二月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当时叫“省党代表

会”)。会议是在邵阳迴澜街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楼上召开的。来参加会的有三十多人，都是各地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我记得的有李锐（大会秘书）、白云、李声玄、李文定、苏镜、欧阳奔程、梁春阳、毛达恂、曾恂、张迈群、谭伟、宋廉、毛特夫、唐荣前、曾胡子（曾国棋）、李业勤（丁波）、陈次林等。

南方局派博古、叶剑英同志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由博古同志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了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要求。我和聂洪钧、袁德胜、郭光洲等都讲了话。我报告了六届六中全会的情况，部署了新形势下湖南党组织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并反复强调了博古同志讲的：“应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工作既要软，又要硬。软呢，不能软到丧失立场；硬呢，不能硬得破坏统一战线。”还强调了在新局面下，更要严格把握干部标准，“没有德，不能当干部；没有才，也不能当干部。”聂洪钧报告了他的“湘西之行”。苏镜是新化县县委书记，报告了如何以妇女为核心力量，开展全县的抗日救亡工作等。毛特夫报告了湘乡“战时工作团”的工作。

会上，民主提候选人，选举产生了湖南省委。正式委员七名：高文华（书记）、郭光洲（组织部长）、任作民（宣传部长）、徐老（公开身份是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中共中央代表，对内指导地下党工作，参加

省委负责统战工作）、聂洪钧（军事部长）、蔡书彬（负责学运）、王涛（湘南特委书记）。候补委员二名：帅孟奇（常益中心县委书记）、袁德胜（湘宁中心县委书记）。不久蔡书彬调湖北，帅孟奇补为正式委员。涂国林为省委秘书长。

大会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确定了湖南省委的中心工作，一是巩固发展党的组织；二是广泛地发展统一战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多结人缘”，“大刀阔斧地打开工作局面”。“多结人缘”，就是贯彻周恩来指示我们的“联合同盟者，团结进步派，争取中间派，打击顽固派”，“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会议期间，我们派人陪叶剑英同志观察了雪峰山脉等处，部署了开展游击战争的规划。

会议结束后，博古、叶剑英同志返回重庆。省委在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下，遵照南方局指示“组织工作要严密，统战工作要广泛”的原则，为开创新局面做了许多工作。

一、积极稳妥地发展党，全面培训党员

我们在发展党员工作中，不是一哄而起，大批拉进，而是坚持在抗日救亡的活动中一个一个的发展。首先在支部内，由大家报告各自发现的抗日救亡积极

分子，介绍情况，研究确定重点对象，然后在实际斗争中注意培养。过一段时间，经过考查合格者，才准予填表审查，并进行个别谈话，方可吸收入党。还定有三个月的预备期。到一九三九年六月，党员人数由省委成立时的三千人，发展到五千多人。没有党员的县，已剩很少几个了。

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战斗素质，省委设有“党内教育委员会”，领导全省党员的培训工作。省委举办了几期党训班、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县级以上的干部。各特委、中心县委、县委，主要训练区级、支委以上的干部。区和支部则训练一般党员。从一九三九年二月至十月，省委训练了六、七十人，各特委、中心县委训练了二百多人。这些同志受训后返回自己的岗位，又逐步开展训练党员的工作。塘田战时讲学院和桂阳战时中学等学校，除着重训练校内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外，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协助周围各县党组织开展培训工作。全国的名教授翦伯赞、张天翼等，都在塘田讲过学。训练班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史及党的建设、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秘密工作等有关指示、文件。

通过这些训练，使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较快

地与全省党员见了面，党内的马列主义水平、政策水平，普遍提高，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迅速发展。

二、广泛宣传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

自汪精卫出走河内，发表公开背叛祖国的“艳电”以后，国内的投降、反共的势头开始抬头。一九三九年三月，蒋介石伪政府在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的同时，又秘密地颁发了早在一月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一系列反共防共的法令。严令在中国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实行“连保连坐法”，把打击日寇的枪口转向了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国统区加紧破坏我党组织，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爱国人士。我党中央在“四五”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精神总动员”有两面性，一是为抗日的，一是为防共的。我党采取的立场应是：一方面运用与发挥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提高全民族的觉悟，振奋革命精神，为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牺牲；另一方面要反对与打击一切反共防共阴谋和反民族分子的观点。南方局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参加“精神总动员”的行列，进行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宣传

与组织工作，认真地拥护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联系当地反贪污腐化等斗争，去减弱、打破国民党省党部和政府防共、反共的阴谋活动。使“精神总动员”“成为我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反对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

不久，南方局又指示我们：向国民党提出共同开展反汪运动，这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是一打击，为我党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巩固国共合作，继续抗日。为此目的，党应当更亲密的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及国民党党员群众联系，向他们说明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是准备投降；并与他们共同动员人民群众，动员舆论，来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动员群众和巩固国共合作，就是反对投降、反共的最好办法。

我们接到这些指示后，多次研究并提出了宣传方案：一是利用我们自己的宣传系统；二是利用地方报纸期刊。

当时，由党内同志筹资开设的书店，除《生活新知》及其分销处、代售处外，还有资金在五百至三千元的十四家。在全省的城市和乡村中，凡是有地下党组织和救亡团体的县，普遍设有书报推销站或宣传基站。乡村中，还设有革命书刊订购处、借阅处及售书货郎。由于这些同志的努力，革命书刊发行量大，党

的方针政策被广泛地传播开来。我们翻印的和报纸转载的《论新阶段》，曾发行到八千多份。还有一些通过我党同志或同情者的关系，直接订阅购买革命书刊的“关系户”。这些“关系户”以学校居多。

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发行量达二千多份，省委领导的《抗战日报》发行千余份。还有地方党组织办的《沅陵日报》（社长周立波，廖沫沙也在这里工作过一段）、《醒报》、《商报》、《工余报》、《真理日报》等。其中发行量最多的是《真理日报》，发行六百多份。

为了扩大宣传，省委又组织创办了《真理》半月刊、《学生时代》半月刊、《中苏》半月刊等刊物（均未出至十期而被迫停刊）。

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全省性的“官”办报刊，如《中央》、《力报》、《大刚》、《正中》、《开明》、《华复》、《国民政府报》、《大公》、《阵中日报》等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利用它们作宣传阵地的可能性。

在这些报刊中，《力报》主笔是我党党员唐旭之。在唐于一九四〇年五月被迫离开《力报》以前，报上的社论大都是他和中心县委的同志写的。编辑部人员对我的态度大都友好。

《开明》，名义上是刘嶽厚主办，实为我党党员黎澍苍一手筹办的。黎为总编辑，编辑部人员多是靠

近我党的进步青年。其它各报，其主编或为与我党有联系的人，或为进步青年。

这些人对我党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持的积极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关系层，及其所办报刊的读者，为我们的扩大统战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时，湖南各地的宣传基站，是通过周恩来、郭沫若及其主办的《救亡日报》的关系，相继成立的。宣传基站，名义上由国民党政府开办，经费、衣服和宣传材料，都是三厅发的。而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同志组织的。比如湘潭宣传基站站长谭伟，是我地下党湘潭县委书记。宣传基站成立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拥蒋反汪”。汪精卫由于多年经营，各省党部都有他的势力，因而省党部投降派占多数。蒋介石是复兴社、CC头子。相比之下，复兴社抗战成份多一点。汪蒋矛盾暴露之后，我们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反对汪精卫背叛投敌”的口号，复兴社极力赞称，而省、县国民党党部却极不痛快。湘潭等地宣传基站，利用国民党内两派的矛盾，搞了个“拥蒋讨汪”大会。在各学校，普遍开展了演讲、演戏、唱歌等声讨汪精卫，宣传抗日爱国的活动。

湘乡党组织的战时工作团，在当时影响很大。长沙大火后，国民党畏惧日寇，望风而逃。共产党人却

在人民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毛特夫、孙仁、傅三、胡开骊、王礼中等积极组织募捐，慰问伤兵，尽力解决灾民的饥苦，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战时工作团里有一位六十多岁的长者叫曾士梧，是陈赓大将的亲家（陈克黄的岳父），担任湘乡县中学校长。他集合了三十多个男女青年学生，组成战时工作团，亲自当团长，组织大家整天演戏、唱歌、开会、游行、示威、慰问伤员，宣传我党的抗日十大纲领等方针政策。

三、加强湘宁中心县委的领导力量， 配齐各级组织领导班子

湘宁中心县委党员人数多，摊子大，对社会的影响也大。为加强领导力量，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派省委委员袁德胜去湘宁担任中心县委书记。袁德胜去后，用一、二个月的时间配齐了上下各级组织领导班子。中心县委书记袁德胜，组织部长孙仁，宣传部长于刚。把原湘乡县委成员胡开骊、王礼中调中心县委负责统战。中心县委机关设在湘乡县龙家祠堂侧边姓曾的屋里。

中心县委下设几个县委：

湘潭县委：书记谭伟，之后是邹祖培、胡庆熙。

湘乡县委：县委书记先后更换了四任：第一任毛特夫，第二任胡开骊，第三任熊怒飞，第四任是刘资

生（直到解放前夕）。

望城县委（当时叫长沙西乡）：这里党的基础是滕代远在大革命时期搞起来的。当时他是长沙近郊区委书记，搞农运时发展了杨东泽、杨南轩等一批党员。抗战爆发后，“隐居”多年的杨东泽、杨南轩联络了老党员，成立了党组织。我们派人审查后，恢复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到一九四〇年，他们发展了一、二百名党员。我们让杨东泽、杨南轩搞了个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仓库，实为省委办训练班的场所。徐老、王汉兴都曾在这里讲过课。杨南轩牺牲后，由刘鼎负责。长沙西乡的党员发展得很快，曾达一千五百人。

湘宁中心县委书记袁德胜，一九四〇年四月调省委，由原长沙县委书记毛达恂接他的工作。

四、局势逆转，全面地组织隐蔽撤退， 积蓄革命力量

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之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局面，遭到了破坏。

湖南反革命逆流，初起于查封革命书店、报馆。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我设在常德的“金城”、“新知”、“大上海”书店分店和“自力”等书店被查封。

四月二十二日，衡阳“生活书店”被搜查，使《群众》、《抗战三日刊》等七百余册进步书刊毁于敌手。继此之后，抄搜、封闭之风在全省各地骤起蔓延。八月，国民党省党部强行改组“文抗会”，逼使我党撤出。

一九三九年二、三月，国民党湖南《中央日报》发了条消息，说“外埠军队无权在湘设办事处”，意在“驱逐”我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四月二十五日塘田战时讲学院被查封，我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创办于长沙，长沙大火后转移至宝庆，一九三九年转移至衡阳，社长姚永，总编辑潘开茨）也被查封。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被迫转移。

在这年三、四月间，湖南个别地区的反动势力就已开始大露杀机。六月十二日，便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平江惨案”。

“平江惨案”后，湖南各地的反动派杀气腾腾地向我袭来。党中央鉴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且在各地制造军事磨擦和反共事件，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保存党员干部的指示》。南方局在传达时强调，应注意保护党员干部，执行中央前已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一九三九年七月下旬，南方局发出关于秘密工作的指示，要求党的组织应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地下党）的形式及采

取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听了任作民的汇报后，对湖南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规定湖南党的工作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应按照这一方针来个彻底转变。巩固党的组织是湖南党最急切的任务。农村支部应以短小精干为原则，要不断提高党员的阶级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教育工作水平。在领导方式上，省委应着重把握住政治路线，深刻研究各项专门问题并找出它们的规律性，总结工作经验与教训，培养下级党组织的独立工作能力，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会议与接头；各级领导应不离职业；各级领导机关所在地要注意社会的掩护；上下级联系简单化。要真正做到团结进步分子，孤立并打击顽固分子，就要特别着重于争取广大的中间分子。不要把整个国民党的党员和三青团的团员看做是一样的。关于群众工作，一般的要善于利用各种合法团体，同时要组织各种小规模不引起别人注意而能团结少数积极分子的学习、娱乐、运动等活动。

不久，南方局又传达了中央五月四日给东南局的《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示精神，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作方针，应和战争区、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

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党的机关，则应“极端秘密”。

我们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确立了“力求隐蔽力量，严密党的组织”的方针，号召各级党组织及成员，要寻找社会职业，隐蔽在各行各业之中。“平江惨案”后，我们首先撤销了暴露的组织，转移了已暴露的干部，审查整顿党的队伍。由于当时没有严格地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区别开来，不仅使一些同志的身份有所暴露，就连省委、中心县委、县委、区委机关的某些联络机关，也处于公开、半公开的状态。这些机关，有的是党组织负责人的住处或某些同志的家；有的是党组织或同志筹备开设的商店、工矿、学校；有的是隶属伪政府下的机关或地方抗日救亡团体，共三、四十处。我们从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十二月，将这些已暴露的机关全部撤销。对于干部的转移，先是在省内调动，从这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县级以上的干部全部调换）。不能在本省工作的，就分别调广西或南方局转送延安。至一九四〇年春夏，先后转移了六百多名党员、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

对党员的审查，是极严格的。上至省委成员，下至普通党员，我们都逐级进行审查。省委结束审查后，便分头去中心县委、县委、区委、支部审查。审查的重点，放在党组织发展较早、较快，而党员、干部成份较复杂的地区。经过组织处理，全省减少党员一千六百多人。

还有一千一百多人，是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自然失掉关系的。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郴州东、西区的区委书记被害，我们派县委书记先后两次去寻找失散的党员，都未找到。

因此，到一九四〇年六月，省委扩大会议总结工作时，党员总人数由高峰时期的五千多人，下降到二千三百来人。应该肯定，当时中央有关严密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的一系列指示，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极其正确的。但也应该承认，我们在具体执行中，由于客观形势的紧迫，不允许有充分的时间去调查核实，难免冤枉了一些同志。有的人在脱党期间，保持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走到哪里，就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撒到哪里，生命不息，斗争不已；也有的自首、叛变了。

我们采取的第二项措施是精简机关人员，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转向乡村，要求党员和干部地方化、职业化，建立起秘密工作的秩序和适应地下工作的方式方法。

从省委至区委的领导成员一律改为书记、组织、宣传三人制，其它各项工作，分别由这三人兼任。如省委，书记高文华兼职工工作，组织部长王涛兼保卫工作，宣传部长聂洪钧兼军事工作。

紧接着就是转移各级机关。省委机关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从邵阳迁长沙，九月湘北战争，日寇迫近长沙，又迁长沙市郊，并分居宝庆（邵阳）、湘乡、衡阳、长沙几个联络点。设想如果长、衡失陷，省委以宝庆为中心，分途掌握联络各地工作。到十一月，全迁衡阳。一九四〇年二月又从衡阳迁湘潭。在最紧张阶段，我曾假借有病住进湘潭医院，召集省委成员研究组织撤退、转移及设法营救被捕同志。徐老到处奔波，四处寻找失散的同志。我安排了工作之后，到重庆南方局向周恩来汇报。他一见到我惊喜地问：“你们跑到哪儿去了？连点消息也没有，我们正为你们着急呢。”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说，湖南局势很危急，应加紧转移已暴露的干部，隐蔽党的组织。以隐蔽求生存，秘密开展活动。适应群众斗争的需要，进行些力所能及的斗争。

我回来后，按照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着手转移大批下级干部、党员的同时，也先后安排了省委成员的转移。一九三九年撤离湖南的有蔡书彬、帅孟奇、任作民。一九四〇年上半年郭光洲调走，王

涛调去福建；下半年徐老、聂洪钧调走。至此省委成员仅剩我和袁德胜二人。经南方局请求中央调派一人，中央派来了文士桢。他来后组成了高、袁、文三人领导小组。到了十月，省委机关三人领导小组便在湘乡县永丰镇（现双峰县）埋伏下来。我化名覃寄名住永丰镇附近，袁德胜住在洪山殿一个老乡家里，文士桢住在街埠头睦邻堂。

在省委机关转移的同时，各中心县委机关也撤离原处。常益中心县委由益阳迁汉寿；湘潭中心县委由湘潭迁湘乡；衡阳中心县委由衡阳迁衡山；长沙县委由东区迁市区；湘南特委由资县迁桂阳，等等。

为了筹建隐蔽党员身份的社会职业机关，省委机关及各中心县委、特委都开办了工厂或作坊作为社会职业机关。县委一级以下机关的党员，一般原有职业。

这些社会职业机关建成之后，坚守秘密工作制度，只搞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的关系。并具体规定：（一）停止集中活动。省委、中心县委、特委、县委、区委各级机关的工作联系，上级指示的传达，一般不由领导成员出面，而由各级通讯、交通站（一般是每级设两处。省委在广西桂林设了两处联络点：一是通讯、交通处；一是省委成员往来处）负责沟通情况。（二）在内部工作的同志不准直接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机关中去与同志联系，在外部工作同志亦不准直接到内

部机关中来，一切事情均由特定人员沟通联系。(三)群众工作中，停止过去的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中领导”、“统一行动”的方式，而以不同的方式分途联系，分途组织，分途进行。

至此，党的组织基本转入地下，大部分党员也都建立了隐身的社会职业。

五、深入基层团结群众，继续扩大我党的影响

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采取新的工作方式，在农村、工厂、学校，以及青年、妇女中继续开展工作。

湖南的党员，农民成分居多，即使有些不是农民成份的党员，与农村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有利条件。在农村，我们利用谈天说地、教识字、记帐等农民喜欢的形式与农民接触，适当地给他们讲一些抗战故事和传看一些抗战的小册子，以提高其文化水平，扩大其政治眼界。在思想上，着重于抗战与民主教育。在伪政府“并保合甲”时，我们积极努力，争取让我党同志成为保、甲长，或使我党的同情者当选。湖南农村中的氏族总管、房长，小学校长，董事会董事之职，在乡间也很有影响。我们也为获得这些职位而努力。

湘宁中心县委组织的阻止日寇长驱进犯的毁路运

动，常益中心县委组织的反食盐商舞弊活动，对其它地区影响很大。

在工人中，我们以组织各业工会、合作社之类的基层组织为中心，在工人群众中积极稳妥地开展活动，逐步将我党的精干力量深深地隐蔽在这些团体中。并重视在兵工厂恢复党组织和巩固矿山支部，因势利导地开展一些文化、思想教育。湖南的产业工人不多。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前，安源因与湖南交界，为了便于工作，划归湖南省委领导，湖南有了一批产业工人党员。三月后因日寇进攻，国民党政府下令炸毁矿井。矿工党员一部分转来湖南，一部分转交给江西万载、莲花、铜鼓一带党组织。湖南当地的工人除了一部分矿工，铁路、公路、轮船交通工人和兵工厂工人外，大部分是手工业工人。这时，我们有二个比较大的工会，一是铜管窑业工会，有三千多会员，其中党员八百多人。工会自设一所陶业学校，一所高小和四所初小，文化教育和思想工作都搞得很活跃。一九四〇年春，三名工会委员被诱降自首，党组织遭受破坏。我们不得不停止了七百多党员的组织生活，结束工会活动。党的工作移于工人群众中秘密进行，侧重于党组织整顿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教育。另一个是益阳总工会，下属各业工会一百二十几个。由于总工会和下属工会都是我益阳县委的同志一手筹建的，因此从

上到下的各级组织人选，不是我党同志，便是我党的同情者。由于我们的同志产生了“左”倾盲动思想，织造业工会组织桃源织布厂二百多名进厂数月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与厂方对峙，直至捣毁锅灶，捆绑经理，结果二百多工人被开除。漂染业、织袜业等工会，也有程度不同的此类行动。益阳总工会主席陈德光自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参加三青团后，背叛我党，成为可耻的敌特工人员，致使益阳总工会的党内同志被迫转移，各业工会停止活动。还有长沙、汉寿、常德等地的一些工会，也停止了活动。我们不得不把工作放在下层党组织的巩固上。

此时的湖南当局，正在各地着手组织各业合作社。我们就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活动，把我们的同志组织在各业合作社中。好多合作社的主席、理事都掌握在我党同志和进步人士手中。这些合作社，在文化学习、生产技术学习，以及义卖、募捐等活动中都走在前头，还受到当局的称赞。我们还派了些同志去参加国民党政府举办的合作社“指导员训练班”、“女工手工技术训练班”。训练结束后，这些同志被分配到各地，组织指导合作社工作。这样既获得了隐蔽身份的合法社会职业，又扩大了我党的工作基点。在我们组织的合作社中，人数最多的是火柴合作社，有几百人；其余的多者二、三十人，少者几人。

在青年学生工作中，主要是在建立学生自治会的过程中，争取在自治会中的职位，合法地开展些校内外活动。在一些我党力量较强的学校，曾出现过包办自治会蛮干的现象。中央青委胡乔木同志来湘视察工作后，基本扭转了这些不利于长期隐蔽的行动。我们主动让出了一些位置，只留一、二名得力的同志在自治会。而各自治会的学术股，则多在我党同志手中掌握。我们要求学生党员要学有专长，以此去团结有共同学科兴趣的同学。要求教员党员要精于职守，使教学效果显著，以此博得社会的好评和学生的爱戴。教育当局虽发现我们的同志思想不甚遂其意，但也不得不图其教学有方而向招聘者推荐。

当时，湖南各地的学校主持人，大都忠于教育事业，有正义感，尤以年长者为甚。我们不管其思想倾向如何，一律尊重，并支持其工作，维护其地位。这使我们在教育界开展工作更为有利。

在妇女工作中，我们着手于妇女较集中的工厂、合作社和学校等下层基础工作，努力争得这些地方的行政职权，进而积极参加妇女会的活动，争取上中层妇女。此时，女党员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的是学校。有二位同志是女合作社主席、理事。有一部分同志是伪县政府中女合作社指导员。我们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广泛地进行工作，在我们的同

志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妇女。

自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又有一些党组织遭到破坏，不少同志被捕、被害。我又一次去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为了便于及时保持联系，我请求建立通讯联系网。南方局派了报务员朱春枝和另一位同志来湘建立无线电台。朱春枝来后与文士桢以假夫妻关系同住在街埠头睦邻堂。同住的还有王淑南（毛泽民的爱人），假称是文士桢的嫂嫂。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电台始终未建成。

到一九四二年冬，我因七年前染上的肺病无药医治，很难再坚持工作。南方局拟定调我去重庆，边养病边工作。不久袁德胜调延安，文士桢也调走。湖南省委三人领导小组改由周里、谷子元和谢竹峰三位同志组成。

我是一九四二年底与贾璉一起离开湖南的。我走以后，周里等同志在南方局的指导下，带领湖南地下党坚持斗争，渡过了难关，迎来了八路军南下抗日支队。军民配合，解放了许多县城，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湖南人民的斗争，汇入全国抗战的洪流，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陶荣祥整理）

建设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 卓越思想和光辉实践

——记周恩来同志领导《新华
日报》的革命活动

郑新如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活动中，他曾经长期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大部分时间又处在斗争的第一线。他担负过党的多方面工作，领导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是他光辉业绩的一个组成部分。

周恩来同志有编办革命报刊的丰富经验，远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在天津主编过革命报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日报）和《觉悟》杂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新华日报》从筹备出版到被国民党封闭的九年多，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周恩来同志为首的

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代表团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战斗的。在领导《新华日报》的革命活动中，周恩来同志的卓越思想和光辉实践，不仅为我们树立了宣传斗争的崇高榜样，而且在建设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上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一、为创办全国性党报而斗争

在党的新闻事业史上，《新华日报》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公开出版的全国性党报。它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时创刊，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时停刊的。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中指出：“由于过去党处在长期秘密工作之下，不能发行全国性党报，因此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只能靠秘密的油印刊物传达，这样就养成同志们不了解党报的作用。在今天新的条件之下，党已建立全国性的党报和杂志，因此必须纠正过去那种观念，使每个同志应当重视党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论文。”指示具体说明全国性党报是《新华日报》，党刊是《解放》周刊、《群众》周刊¹。《新华日报》

¹ 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第86页。

的公开出版，意味着突破了国民党统制舆论、蒙蔽人民的专制主义统治，使党在报刊宣传上夺取了团结人民、揭露敌人和争取同盟者的重要阵地。

为创建全国性党报，周恩来同志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一九三七年，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和国民党的代表为共同抗战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六月，周恩来一上庐山，即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谈判，后回到上海。据夏衍同志回忆，七月十日，即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三天，周恩来同志约见夏衍，向他详谈了党中央决定争取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全国性的党报、党刊，以打破国民党对舆论的封锁和垄断。周恩来同志还指出：尽管国民党当局还在为国共谈判设置障碍，但应该预见到时局发展的趋势，及早地为创办全国性党报作好准备。他考虑抽调经过谈判斗争、刚从国民党监狱获释的潘梓年、章汉夫等同志参加党报的创建工作。为了在更广阔的规模和纵深的阵地上展开党的宣传活动，周恩来同志要求夏衍在华南地区筹办一份宣传团结抗战，为统一战线中左、中、右都能够接受，以非党面目出现的进步报纸。和夏衍谈话后，周恩来同志又约见潘梓年，说服他放弃到革命根据地的要求，立即为创建党报进行准备。之后，国共两党代表又经过在庐山和南京的几轮谈判，九月二十

三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同时也被迫承认我党有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党报的权利。由于周恩来同志的预见和精心擘划，经过短短三个月的筹备，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就在武汉创刊。从此，国民党垄断舆论的局面被打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公开出版了全国性的党报。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机关，从创刊之日起，就以崭新的面貌区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报纸，它以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预见性和对战争的科学分析，以它广泛的群众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当时，文化界有人评论道：“《新华日报》无论就形式或内容来说，都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流的报纸。无论就读者的踊跃，报纸的地位，言论的力量说，《新华日报》的影响，都不在英国《工人日报》或法国的《人道报》之下。”^①但，如所周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办初期，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直接领导。当时，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又是《新华日报》董事会的董事长，在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和专横跋扈的家长制作风的控制下，《新华日报》曾经对一些重大问题作了错误的宣传。一九三八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

^① 见杜若君：《大公报与新华日报》，载《战时文化》一九三八年一卷三期。

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从此，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党报的工作，结束了王明对党报的干扰。十月七日至九日，周恩来同志亲自为党报撰写了连载三天的长篇社论，题为《论目前抗战形势》。它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这篇重要文献中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的观点，有步骤地清除王明散布的思想影响，纠正前一段报纸宣传上的失误。

周恩来同志在领导《新华日报》期间，时刻关心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新闻战士的头脑，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增强大家的党性修养；时刻注意在报纸工作中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大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建立党报的优良风格。周恩来同志不仅经常召集报社的负责同志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参加报社的编委会，制定一定时期报纸的宣传方针、宣传策略；而且领导和组织报社干部的理论学习，向大家讲授党的历史，辅导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他经常审阅、修改报纸的重要新闻和社论、专论的文稿，他还时刻关心报纸的印刷、出版、发行和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工作的。他不顾工作繁剧，亲自参加新闻实践活动，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新华日报》出版的九年中，周恩来同志为报纸撰写并署名的社论、专论和重要的讲演稿共计五十八篇，为各种重要纪念活动的题词十一则，

在党刊《群众》杂志上还发表了他撰写的文章十三篇。在周恩来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艰难险峻处境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斗，为团结人民、揭露和孤立反动派、争取广大同盟者，为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周恩来同志用他的言教和身教培养了一大批党的新闻干部，并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许多卓越思想。通过实践斗争和历史的检验，今天，这些思想仍然给我们以重大教益。

周恩来同志关于建设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卓越思想，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诸如：党报应该具有的品质，它的任务，它的宣传方针，宣传策略；坚持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和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依靠群众办好报纸；通过宣传斗争壮大革命的统一战线；坚持用马列主义武装新闻干部，培养一专多能有强大战斗力的新闻队伍等等。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于发展和建设党的新闻事业，进一步开创新闻工作的新局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努力作团结抗战的号角，人民大众的喉舌

一九四二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

全党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周恩来同志的电报中指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①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要求“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指出党的“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②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同志领导《新华日报》开展整风运动，在报馆全体职工中广泛、深入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为了争取广大群众的帮助，五月二十三日，《新华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批评》，公开向读者征求意见，为报纸在整风基础上进行改革作好准备。为了推进整风工作，党报增辟了《团结》周刊。周恩来同志为《团结》创刊号写了题为《团结旨趣》的代论。文章指出：“我们的党——中共，是经过二十年以上锻炼的党，我们的报——新华，是经过近五年奋斗的报……报是在党的方针下，尽了他为团结抗战的号角，为人民群众

① 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3页。

② 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第126页。

的喉舌的任务的。”九月十八日，《新华日报》正式改版时发表了重要社论：《为本报革新敬告读者》。这篇社论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撰写，并经过他审阅、修改的。社论更明确地阐述道：“本报为中共机关报，它是团结抗战的号角，人民群众的喉舌。”它的具体奋斗目标是：“要使报纸从各方面贯彻党的政策，从各方面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使《新华日报》真正做到不仅是中共的机关报，同时，要成为人民自己的报纸。举凡各抗日党派、团体和人民，有关团结、抗战、进步的主张和办法，我们当尽量予以登载，对于阻碍抗建大业的言论和行动，当予以严格批评；而对于斥敌诛奸，更不给以丝毫的宽假。”

整风改版是《新华日报》发展中的一次飞跃。改版后，报纸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从新闻的编选，言论、副刊的思想内容，到版面编排和语言风格都更加符合党中央对党报提出的要求，显示出更加成熟的党报风格。

作“团结抗战的号角，人民群众的喉舌”，这是周恩来同志根据时代特征、战略全局和《新华日报》所处的具体环境，精辟地阐明了党报的性质、任务、办报宗旨和宣传方针。《新华日报》是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条件下出版的，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战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是

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应该在鼓舞团结抗战上充分发挥集体宣传者、组织者的作用。《新华日报》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全部宣传活动中贯彻了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伟大旗帜，以反侵略斗争的坚定性，反妥协的彻底性和增进团结、进步的鲜明态度，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革命的统一战线日益壮大。党报应该成为“人民大众的喉舌”，这是无产阶级报纸区别于一切反动阶级报纸的根本标志，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党的新闻工作上的体现。反动阶级的报纸、杂志、广播总是用谣言、欺骗来蒙蔽人民，闭塞人民的思想，掩盖他们对人民群众的迫害和压榨。无产阶级的报刊则是向人民报道真实的消息，揭露反动势力对人民的压榨和迫害，启发人民的民主思想，唤起人民对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周恩来同志曾反复阐述这一思想。他教育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①。一九四七年，他为《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的题词，再次提出：“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向导”，

^① 周恩来这一教导，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新华日报》的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曾经引用。

向党的新闻工作者指明，坚持党的立场与人民的立场的一致性。这些思想是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新闻事业的思想完全一致的。一九四二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① 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三、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和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

《新华日报》从创刊之日起，就是在国民党的重重压迫和严密封锁下进行战斗的。针对严峻的形势，周恩来同志经常教育《新华日报》的战士，要发扬党报的战斗精神，要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风格。教育大家“要敢于进行斗争，要善于进行斗争；要敢

^① 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0页。

于说出真理，要善于说出真理；使《新华日报》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和号角。”^① 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对顽固派的封锁、迫害进行了坚韧、顽强的斗争。斗争有时是针锋相对，有时又是灵活曲折的。下面举出几个例子，说明在周恩来同志直接指挥下，《新华日报》反对顽固派封锁、迫害，进行斗争取得胜利的事实。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主席在延安对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的记者发表重要谈话，揭露顽固派加紧反共投降活动造成的时局危机，严正表明共产党对顽固派发动反共磨擦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按照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检查制度，毛主席这篇声讨反动派的檄文是绝不会被检查机关通过的。为了向人民群众指出时局危机，揭露顽固派制造磨擦的狰狞面目，周恩来同志指示《新华日报》，对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用拒不送检的办法刊载毛主席的重要讲话。这样做，党报冒着被停刊、封闭的危险，但为了捍卫党和人民的重大利益，必须坚定地进行斗争。为了胜利地进行这场斗争，报社在编辑、出版、发行上都作了周密部署。九月十九日，党报在显著位置刊载了这一重要文献。

^① 参见《新华日报回忆录》吴克坚、陆诒的回忆文章。

报纸提早出版，晨光熹微中，报纸已大量送到读者手里。一张张报纸象匕首、投枪样刺向敌人，顽固派被激怒得暴跳如雷，出动了大批警察、特务、宪兵没收这一天的报纸。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局给《新华日报》以停刊一日的“处分”。九月二十日，《新华日报》不理睬这一“处分”，照常出版，并以刊登“本报启事”的方式揭露国民党的这一反动行为。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沉重地打击了顽固派反共投降的阴谋活动。

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为，政治上对反动派展开全面反攻，是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部署，运用党的新闻工具进行的一场重大斗争，在新闻实践上是坚持党的立场和灵活掌握斗争策略的范例。新四军奉命北移遭到国民党军袭击时，《新华日报》就编新闻、撰写社论揭发这一阴谋，但遭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留，无法向群众揭露事实的真象。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出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的反动命令。企图利用反动派控制的全部舆论工具，用造谣、诬蔑的办法，掩尽天下人的耳目。斗争短兵相接，时间间不容发。揭露事实真象的新闻报道和文章，都遭到检查扣押。宣传斗争已不只是澄清某些细节，而是要戳穿这场精心策

划的反共投降阴谋，这场颠倒是非、造谣诬蔑的骗局。周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满腔义愤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悼词和挽诗虽然只有二十五个字，但象惊雷闪电一样警醒了人民，使反动派诬蔑陷害新四军的行径遭到爱国人民的同声谴责。悼词、挽诗和周恩来同志同日晚间在电话里大义凛然斥责何应钦时讲的：“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同是千古传颂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从挽诗还可以看到，周恩来同志既以无所畏惧的态度斥责、鞭挞顽固派的反共行为，又着眼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斗争的限度是要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局面不至于全面破裂。我们的目的是要“拖住蒋介石、国民党，不让他投降”。挽诗的后两句：“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用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襟，克制对同志、战友无辜被害的满腔义愤，呼吁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一切有爱国心的人，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制止顽固派箕豆相煎的倒行逆施，发扬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大义。宣传斗争始终处于有理、有节的地位，团结、教育、争取了广大人民，使顽固派在政治上陷于完全孤立。

战斗不可能都是一往直前，舆论宣传也必须根据

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早在一九四〇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前夕，针对时局危机，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以南方局名义致电党中央书记处和党报委员会，提出调整新闻斗争的策略。电报说：

《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的严密检查和压迫下，处境日见困难，不仅扣留文章很多，且国民党中宣部还准备以所谓“群众”力量将《新华日报》打掉，为使报纸能合法存在，拟从新年起大加改革，不一定每天有社论，刊登多方面的材料，且不要每篇都是政治化的面孔，实行“烘托式”宣传。毛泽东同志同意电报提出的意见，赞成采取“烘托式”的宣传策略。周恩来同志经常教育报社的同志，宣传斗争要严守党中央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周恩来同志提出：斗争的策略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是在捍卫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无所畏惧，不妥协，不退让，和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有所不为，是斗争要有限度，要有节制，在非重大原则问题上，就不应冒停刊、封闭的风险。《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宣传阵地，是国共两党合作关系存在的一个标志，要尽可能争取党报能够长期出版。报纸的存在，就使党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保持了公开、经常的联系，使党的政策、方针能够及时地传达给广大人民，人民群

众经过党报也多少能表达出他们的意志与呼声。报纸的言论、报道要尽量防止出现顽固派用来挑衅的口实。要以受迫害者进行自卫的立场，对顽固派据理斗争。这样，就能取得舆论的广泛同情，迫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加害于我。要善于利用国民党颁布的有关法规、条例中的某些条文、词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进行合法斗争。要把党报的公开出版和秘密的宣传活动结合起来，突破反动派的封锁和迫害。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新华日报》在版面上尽量不采用直接抗拒检查的办法，而是把党中央的一些重要文献、言论和被国民党检查机关禁止刊登的文章、消息报道，印成传单秘密散发。还不定期地秘密出版《解放日报选刊》、《海外呼声》（专门选载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呼吁团结抗战的言论），汇编《他山石》（选载同盟国报刊和反法西斯知名人士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人民的言行）和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宣传小册子。这些秘密发行的宣传品，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揭露了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鼓舞了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战斗意志。由于党报采取“烘托式”宣传，一些重要的文件、言论是经过多种渠道秘密散发，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既找不到寻衅迫害的口实，还在其思想上造成某种错觉。一九四一年，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副局长

李中襄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竟以为《新华日报》“态度转消极，处处表示弱者被压迫状态”^①。在舆论宣传上，这是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的一场重大胜利。

采取“烘托式”宣传和运用公开宣传与非“法”的秘密宣传活动相结合的方法，避开了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使《新华日报》的困难处境有所改变，顽固派的严厉封锁逐渐被打破。周恩来同志教育报社的同志，要运用多种形式，向顽固派的法西斯统治展开主动出击，发挥党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促进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周恩来同志任书记的南方局向党中央文委的报告中，总结“皖南事变”后的斗争策略时说：国民党加紧了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扣押，出版界无法出版新的图书杂志，“加之国民党当局压迫加剧，我们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活动。如庆祝郭沫若之五十寿辰，冯玉祥六十寿辰，参加张冲之追悼会等等。”周恩来同志发动和支持的为知名人士祝寿，参加悼念对团结抗战有功人员，在当时都是影响深广的政治斗争。这些活动团结教育了人民，揭露和孤立了顽固派，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在舆论斗争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

^① 见向纯武：《〈新华日报〉的反检查斗争》，载《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492页。

影响重大的，为知名人士祝寿的活动有三次。

一九四一年三月，重大商学院学生为院长马寅初祝贺六十寿辰。这次活动是由南方局和重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新华日报》以公开合法的新闻单位给予支持。马寅初是著名学者、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公开抨击国民党当局的贪污腐败，揭露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等豪门利用权势大发国难财，在立法院提出开征“临时财产税”，征收发国难财者的财产，以充实抗战经费；怒斥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因而被捕下狱。在狱中度过六十寿辰。重大商学院学生在三月三十日为马寅初举行盛大的祝寿大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联名送贺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志出席祝寿大会，并代表党报送贺联：“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祝寿会是表达师生情谊的群众活动。上引两副贺联是赞颂老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含蓄深沉，不露政治色彩，反动派抓不住任何寻衅的借口。但祝寿活动本身，就是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一次群众性抗议和反击。祝寿活动在青年学生、知识界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在舆论界的支持下，迫使国民党当局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将马寅初释放。

为冯玉祥、郭沫若祝寿，同是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一

月。冯玉祥是国民党资深望重的军事领袖，因为不满蒋介石消极抗日和专制独裁而备受排挤打击。为了祝贺他的六十寿辰，《新华日报》辟出专页刊登知名人士的祝贺诗文。周恩来同志撰写了《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的祝贺文章。充分肯定了他在北伐战争、察哈尔抗战中的历史功绩。高度评价冯玉祥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和独裁专制的革命精神，这也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投降、独裁专制的严厉谴责。

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的庆祝活动，是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界的一次团结、动员大会。《新华日报》出了专刊，周恩来同志写了代论：《我要说的话》，热情称赞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肯定他是鲁迅逝世后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鼓励他团结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进步力量，对反动派摧残、镇压进步文化的行为展开英勇的反击。在戏剧界为祝贺郭沫若寿辰，演出他创作的历史剧《棠棣之花》时，《新华日报》出版了介绍剧本和评论演出的专刊，周恩来同志亲自题写了刊头。这次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鼓舞了进步文化界的斗志，一扫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万马齐喑的气氛。

对逝世者的悼念追怀，就是对生者的启发和激励。周恩来同志在参加的悼念活动中，对于教育人民群众，争取同盟者方面，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列举下面一些事例：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参加对张冲（淮南）的悼念活动。张冲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谈判代表，为实现团结抗战作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张冲病逝后，周恩来同志参加了国民党为张冲举行的追悼会，为《新华日报》撰写了题为《悼张淮南先生》的代论。对张冲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为团结御侮不辞辛劳深致赞扬。联系顽固派制造的反共分裂的时局危机，向一切关心民族命运的人们呼吁：“抗战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义正词严，情词恳切，共产党人忠诚谋国的精神赢得了广大群众包括国民党内爱国人士的称赞。

一九四二年六月，为悼念左权同志在华北战场壮烈殉国，周恩来同志为《新华日报》写了《左权同志精神不死》的代论。左权同志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是我党优秀的高级将领。他的英勇牺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敌斗争中英勇无畏，粉碎了顽固派对我党我军的造谣、诬蔑。周恩来同志在深情悼念战友的文章中，并对在抗战前线牺牲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郝梦龄、王铭章、张自忠、唐淮源等也深致敬意，充分显示出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襟怀。

同年秋天，在广西全县举行追悼国民党第五军师长戴安澜的大会，毛泽东同志赋赠挽诗，朱德、彭德怀同志送了挽联，周恩来同志送了挽词。对在缅甸战

场抗击日寇侵略英勇牺牲的戴安澜将军深表敬意，对戴在缅甸战场坚守东瓜阵地，攻克棠古据点的英勇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九四三年夏天，国民党顽固派正在策划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顽固派一面和日寇及汪伪政权达成默契，正面战场出现休战状态；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包围解放区。五月十六日是襄樊战役英勇牺牲的张自忠将军殉国三周年，周恩来同志为《新华日报》写了代论《追念张荃忱上将》，热情赞扬张自忠将军在反对外来侵略时杀身成仁、见危授命，保持了中国人民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号召全国军民：“现在战争的胜利前途，业已确定。但是，只有打，只有苦打，只有拚命的打，才能胜利。”追怀死者，启迪后人。文章唤起人民警惕顽固派反共投降的阴谋，为坚持团结抗战而进行斗争。

为马寅初、冯玉祥、郭沫若祝贺寿辰，对张冲、左权、张自忠、戴安澜的悼念活动，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都是周恩来同志运用党的舆论宣传工具，向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发起的强大攻势。这些活动冲破了顽固派设置的重重障碍，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广大的同盟军，沉重地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四、发挥党报的集体组织作用， 壮大革命统一战线

一九八二年，胡耀邦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周恩来同志时说：“在实际斗争中，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几十年时间内，为建立、巩固和发展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作出最大贡献的，则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不愧是我们党建立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个模范。”周恩来同志一生，为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记述的只是他在领导《新华日报》的宣传实践中给予我们亲切难忘的教导的几个事例。

周恩来同志经常教育党报的工作干部：“只有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才能有效地冲破新闻封锁和种种压制，做好党报工作。”据周而复同志回忆，当年，他在采访工作中，因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多方阻挠，工作局面不易打开，向周恩来同志诉说思想上的苦闷时，周恩来同志向他指出：“要通过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来开展采访活动，又要通过采访活动来宣传和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决不要单纯为了完成这次报道任

务而采访……统战工作、团结工作，你首先要从记者当中做起，尽可能多的争取友军……要和他们多交朋友……和这些记者的团结工作做好了，你在采访工作中的困难自然会大大减少。”^①

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新华日报》为在新闻界同业中争取友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当时，重庆出版影响较大的报纸约十余种，大部是由国民党各派系所掌握，也有一部分中间性质的报纸。中间性质的报纸，大都有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参加工作。国民党各派系掌握的报纸，包括被严格控制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也有秘密党员、革命知识分子在里面进行工作。《新华日报》通过在新闻界同业中广泛开展交朋友的活动，并通过各报内部的进步力量，逐步在新闻界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进步力量为核心的革命统一战线。通过新闻界进步力量的团结合作，使党报能够及时掌握国民党的政治动向，在同业中获取广泛的新闻线索，扩大新闻的来源。在新闻报道、采访活动以至纸张器材的有无相通等方面取得中间报纸和进步朋友的支持。这就使《新华日报》能够在广阔、纵深的阵地上开展党的宣传活动。在许

^① 见周而复：《记者生涯的回忆》，载《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330页。

多重大问题上，如争取言论自由，反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消极抗日，同情和支持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等，《新华日报》都能和中间性质的报纸取得共同立场，密切配合、互相呼应，在舆论斗争中压倒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在国民党统治区，《新华日报》不仅是新闻界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基地，也是政治战线上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基地。《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但它经常刊载民主人士、知识界、工商界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文章，也刊载过国民党当权者的某些抗日言论。这些作法，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一九四二年一月，《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张申府为党报的纪念特刊撰写了祝贺文章：《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毛泽东同志看后非常赞赏，三月十四日在给周恩来同志的电文中说，张的文章“表示对我党满腔热情，已在《解放》转载，他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实行。”^① 在同一月里，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进一步地指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

^① 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3页。

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① 《新华日报》为了能够更广泛、更经常地吸引党外朋友发表言论，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开辟了一个专栏。他为这一专栏命名“友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友声”首次刊出时，他还用编者的名义，写了一段前言：“跟着抗战局势的进展，中国人民的任务越来越重了。有多少问题，是急待我们去解决的。为了要使问题解决得完满，必须有深刻的探讨。在探讨的时候，自然不免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抗战、团结与民主进步的前提之下，对于某一问题的意见虽有出入，仍应被重视的。因此，本报特辟‘友声’一栏，欢迎各方面朋友，对于各种问题，提出真知灼见，赐予本报发表，以便公开讨论。这就是本报嚶嚶之鸣，想为读者诸君所乐于赞助的罢。”“友声”专门刊载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医药卫生界、工商界党外朋友的文章，作为反映他们的要求、呼声的言论阵地。“友声”专栏不仅发表左派的文章，也发表中间派的文章，

① 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4页。

只要在团结抗战的总方向上和我党一致，具体问题的观点则不强求与共产党一样。“友声”专栏不仅密切了党和进步朋友之间的联系，也扩大了党在中间阶层中的影响。这个专栏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新闻界是独树一帜，在我党的新闻事业史上也是首创。

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思想上教育《新华日报》的干部，重视吸引党外朋友发表言论、参加报纸的编辑业务，以改进党报，提高工作水平；而且要求党报充分发挥集体组织者的作用，通过吸引党外朋友参加新闻实践，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发展和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推动教育、科技界的团结、进步和发展抗日的进步文化运动等方面，周恩来同志都以他的斗争实践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新华日报》由武汉转移至重庆出版后，周恩来同志就指示潘梓年同志（《新华日报》社长）在知识界中广泛开展交朋友的活动，针对知识界一般习惯于埋头书本，不过问政治的特点，帮助他们认识时局特点及抗战前途，推动他们组织起来，积极投入爱国民主的时代洪流中去。潘梓年同志是知名的学者，在知识界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一九三九年春，知识界的一些进步朋友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梁希、潘菽、金善宝、于铎、涂长望、谢立惠等二十余人，大都是当时

知名的学者、教授。周恩来同志不仅关心和指导“座谈会”的活动，而且亲自向这些朋友做工作。有时个别约谈，有时直接参加“座谈会”，向他们分析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帮助他们明辨是非，认清前进方向。梁希先生六十寿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在《新华日报》编辑部为梁老举行祝寿活动。周恩来同志为梁老祝酒时深情地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现在是举步维艰，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先生对此十分感动，他说：“我无室无家，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当夜，他写了三首七律，两首送给周恩来同志，一首送给《新华日报》^①。党报有些活动也邀请这些朋友参加。一九四〇年，周恩来同志约请参加“座谈会”的部分知识界朋友，参加党报的编辑工作，负责为《新华日报》主编《自然科学》专刊，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揭露反动派利用各种封建迷信手段麻醉、欺骗人民的愚民政策，帮助人民群众逐步摆脱愚昧落后的思想；向自然科学工作者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宣传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推动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为

^① 见袁啸：《磊砢有节，俨然若千丈松》，载《梁希纪念集》第71页。

争取抗战胜利、政治民主而努力。

一九四四年，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战争逐渐失利，急于想在中国大陆打通陆路交通，于是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短短几个月中，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制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要求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保障言论自由已成为各阶层的共同愿望。时局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壮大革命的统一战线。周恩来同志提出，要以参加“座谈会”的知识界进步朋友为核心，团结更多的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组织范围较广泛的、公开的科学团体。同年冬，由“座谈会”的知识界朋友提出建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倡议。经过不长一段时间，就得到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及其他科学工作者一百多人的热烈响应，共同列名为协会的发起人。一九四五年七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正式成立，并相继在西南、西北的一些大城市成立了分会。一年后，入会的科技工作者，就增加到七、八百人。“中国科协”的成立在我国的科技界是一个创举，它的影响迅速传到国内外，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地也建立了分会。“中国科协”成立后，积极开展了对各国科学工作者的团结争取工作，联合英、美、法等国的“科

学工作者协会”，共同发起筹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一九四六年秋，“世界科协”在伦敦开成立会，涂长望代表“中国科协”出席会议，并被选为“世界科协”的理事。“中国科协”的建立，团结了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对帮助他们认清国家民族的前途，认清国民党的各种蒙蔽与欺骗，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所作的英勇斗争，推动他们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都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积极参加“中国科协”活动的著名科学家，大都成为科技战线的领导者，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科协”从酝酿筹备到正式成立，周恩来同志始终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通过潘梓年同志与科技界朋友的经常联系，及时了解情况，随时向科技界的朋友提出各种建议，并亲自向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作动员说服工作。他要求党报为发展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的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日益走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道路。短短两年内，顽固派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加紧对人民实行法西斯镇压。“皖南事变”后，顽固派镇压人民的活动又进一步升级。法西斯的新闻检查制度，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殆尽，《新华日报》也被迫

由一大张改出一中张；图书杂志的反动审查办法，使一切进步书刊都无法出版；文化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朋友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监视，人身安全面临着危险。南方局针对时局危机，大力动员组织文化界进步力量转移、疏散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周恩来同志主持这一工作，经过周密安排，许多著名的作家、理论家、新闻工作者、戏剧工作者被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和香港、仰光、印度、新加坡等地。顽固派掀起的反动逆流，使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运动面临严峻的考验。

如何击败顽固派摧残、迫害进步文化运动的阴谋，是一场复杂、艰巨的斗争。

早在一九四〇年九月，党中央就发出过《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明确指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区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面对着国民党顽固派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动用专政工具摧残、迫害进步文化的险恶形势，如何组织力量进行有效的反击呢？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斗争时曾讲到几方面的经验。前面曾经讲到，

这一时期《新华日报》采取“烘托式”宣传，公开报道与秘密宣传相结合的策略，壮大自己的发行力量，打破反动派的封锁。在发展进步文化运动方面，总结中说：“我们还着重抓了当局尚未注意之演剧运动。对导演、演员作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作风，加强了他们的团结和学习。演出了一些优秀剧目。”选择演剧活动作为打破顽固派迫害进步文化的突破口，是周恩来同志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考虑了文化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各种文艺形式的社会效果而作出的重要决定。“皖南事变”前，国民党镇压进步文化运动的锋芒，首先指向文艺界进步力量比较集中、社会影响比较广泛的电影界。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直接控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解除了阳翰笙的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使抗日进步影片的摄制工作陷于停顿，许多进步电影工作者遭到排挤，被迫转到戏剧界。在文化界进步力量大批疏散、转移后，戏剧界的进步力量仍然比较强大。而在各种文艺形式中，周恩来同志认为：“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青人，影响比较大。”^①因此在南方局的领导和推动下，在雾重庆的戏剧舞台上，

^① 见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载《人民的好总理》（上）第337页。

对顽固派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击，相继上演了阳翰笙的《塞上风云》，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留渝剧人集体创作的《重庆二十四小时》，吴祖光的《凤凰城》、《风雪夜归人》，老舍的《面子问题》，根据鲁迅翻译的小说改编的儿童剧《铤》等。国民党通过审查制度，严格控制反映现实斗争和现实题材的话剧后，党与非党的进步作家就创作和演出一些历史题材的话剧。郭沫若创作了《虎符》、《屈原》、《南冠草》、《孔雀胆》，阳翰笙创作了《天国春秋》、《草莽英雄》^①，陈白塵创作了《石达开》，于伶创作了《大明英烈传》等。通过歌颂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抨击专横黑暗势力，用历史的殷鉴提高人民的爱国思想，鼓舞反抗精神。其中，政治影响最大，对群众教育最深的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屈原》的演出。舞台上，两千多年前伟大诗人抗议专横、指斥奸佞、歌颂雷电的声音，倾注了剧作家、演员对反动派的满腔义愤，帮助广大群众擦亮了眼睛，鼓舞了他们反对独裁专制的斗志。

戏剧舞台上卷起的进步文化浪潮，冲击得顽固派坐卧不安，国民党反动文化头目张道藩奉命搞出一个

^①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的图书审查机构对《草莽英雄》下令“禁止出版、禁止演出，没收原稿。”一九四六年二月，旧政协会议召开后，才首次在重庆演出。

为汉奸特务涂脂抹粉的话剧《野玫瑰》（陈铨作），企图用来挽回一点影响。剧本拿出后，立即受到文艺界的批评和抵制。在被指定担任演出的剧团里，导演、演员团结一致联名写信拒绝排演。后来虽然用威胁利诱的办法拼凑了一个班子演出，但受到群众的唾弃和文艺界的同声谴责而匆匆收场。

在这场发展进步文化运动的斗争中，周恩来同志始终注意发挥党报的宣传鼓动作用。《新华日报》不仅通过版面向读者介绍剧本的内容、演出的情况，而且组织文艺界、观众举行座谈或笔谈，集中发表讨论意见，扩大演出的声势和影响。周恩来同志特别重视报纸的戏剧评论工作。他教育报社的编辑人员：“评论也是有力的战斗”，“戏剧演出需要通过评论文章才能吸引观众和教育观众，也能把观众的意见转达给艺术家，使他们得以改进。”^①他经常指导和修改戏剧评论文章。《棠棣之花》演出后，《新华日报》出版剧评专页，周恩来同志题写了刊头，专页发表的两篇文章：《从棠棣之花谈评历史剧》、《正义的赞诗，壮丽的画面》都经过他仔细修改。《屈原》演出后，他专门召开座谈会，讨论这出戏的政治意义，并组织

^① 见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载《人民的好总理》（上）第337页。

修改评论文章。为了扩大舆论宣传的影响,《新华日报》还发动文化界的进步朋友为中间性的报纸撰写戏剧评论文章,和党报的宣传呼应配合。不仅在舞台演出上,而且在舆论宣传上取得对顽固派斗争的胜利。

五、讲真理,讲真话,坚持 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向人民报道真实的消息,实事求是,讲真理,讲真话,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报纸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报纸的根本标志,是党报应有的品质。人民的报纸,应该告诉人民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周恩来同志曾用“董狐直笔,赵盾胆寒”的历史故事教育报社的同志,要求大家学习古代正直史官不畏权势、不怕牺牲的精神,要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风格。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教导,《新华日报》在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写了题为《记者节谈记者风格》的社论,比较完整地记述了他对党报的品质,党的新闻干部应有的思想风格和坚持新闻真实性的思想。社论阐述道:党报是党的宣传阵地,“宣传工作是一种教育事业,宣传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种最广

泛最灵活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许妄诞不真，在宣传上又何能允许虚夸不实……宣传而稍流于虚妄，断然不能幸致社会人民对你的信心……以为人或可欺者，只表现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

要讲真理，讲真话，对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作风上的粗枝大叶、浮光掠影，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认真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愿望与要求；对于纷繁的社会现象，要善于抓住核心，分清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周恩来同志不仅从思想、理论的高度教育大家，而且具体指导大家如何作好调查研究工作。他要求党报编委会的同志，根据各个时期党报宣传重点，选定若干题目，系统进行调查研究，定期向编委会汇报研究成果；他经常参加编委会听取汇报，指出成就和不足，使与会同志都受到很大的教益。当年做采访工作的陆诒同志回忆到，当他向周恩来同志汇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新闻线索少，有些报道显得枯燥乏味时，周恩来同志向他指出：“这是因为你没有深入群众，不了解读者的愿望与要求。我建议你除了必要地采访一些上层活动外，可以着眼于群众。譬如说，访问几个从战区流浪到重庆的擦皮鞋难童，或者访问嘉陵江上几个渡口的船伕，或者访问重庆市内几个公共汽车售票员，谈谈他们的

生活和愿望……你实在没有线索，不妨到茶馆里去坐坐，听听群众在谈些什么？想些什么？”在他的启发下，《新华日报》增辟了《生活一角》专栏，有计划地发表记者的专访、特写，反映生活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并刊载了一批情文并茂、反映川江船伕、纺织女工、盐场工人生活的通讯、报告。刘述周同志亲赴边疆采访，撰写介绍西南兄弟民族苦难生活的长篇通讯，更是新闻界的创举，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讲真理，讲真话，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就要同反动阶级蒙蔽与欺骗人民的行为作斗争，要求党报具有鲜明的战斗立场，对横逆之来无所畏惧。上面引述的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教导撰写的党报社论中指出：“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公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不顾一切地写，人民心里所想说，所认为应该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地说出来，写出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实和违反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丝毫的假借，也不容有丝毫的含糊。”《新华日报》在九年多的斗争经历中，以它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真实的新闻报道赢得人民群

众的信任，增强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中的威信。

六、在斗争中建设无产阶级的新闻队伍

周恩来同志领导《新华日报》，不仅时刻注意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提高党报的宣传质量，扩大宣传的影响，而且时刻关心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建设党的宣传队伍。在《新华日报》这个战斗集体中，大都是年轻的战士，绝大多数人没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大家都是在新闻实践中边干边学，在严峻的斗争中迅速成长的。为了把这批年轻干部培养成既有坚强的党性修养，又有过硬的专业技能的新闻队伍，周恩来同志时刻注意用马列主义武装大家的思想，他和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邓颖超等同志经常挤时间向党报职工作报告。为了让党报职工及时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周恩来同志不管工作多么繁剧，有时忙到深夜也要把报社的领导潘梓年、吴克坚、章汉夫找去，及时进行传达。一、两个小时后，经过报社领导的传达，新闻业务第一线的干部都可以了解到党中央对各种重大问题的指示，使大家明确方向，增强做好工作的信心。周恩来同志经常鼓励大家学习革命理论，并以他躬行实践的模范行动教育和鼓舞大家。他向南方局和

党报的干部讲党课，讲党的历史^①。他领导组织大家学习联共（布）党史，辅导大家学习，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他约请对文艺、经济、国际问题有研究的同志、朋友作专题报告，帮助大家开扩视野，增长知识。在开展国民党统治区演剧活动期间，他对重要的剧本、演出亲自召集和主持座谈，鼓励大家提出看法，并从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和政治效果各方面，对剧本或演出作深刻的分析。这些活动，报社同志直接参加的当然只是一部分，但拨亮灯一盏，照明一大片，通过与会同志的传达、介绍，使更多的同志受到了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同志用他的榜样力量，激励大家养成勤奋学习、不断探求的良好风气。

要提高党报的宣传质量，要求党报的工作干部不断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周恩来同志不仅注意干部的思想锻炼，而且要求大家加强新闻专业的学习。他要求党报的工作同志根据工作要求和自身的条件，向专业研究方面发展，努力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材。他要求大家在新闻业务上成为一专多能的多面手，做编辑工作的要同时学会做采访工作，会写文章，也要学习和通晓排字、印刷、出版、发行的工作。在他的倡

^① 收集在《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就是他讲党史时一次报告的记录。

导下，一些做编辑的同志学会了排字、拼版的技术，在版面安排需要调整改动时，编辑、印刷能密切配合，加快排印速度，提早出报。据姚黎民同志回忆，他在党报做新闻编辑工作时，因为学会了排字、印刷，后来他转移到秘密工作岗位，一个人就担负起一种秘密宣传品的编写、排字、印刷任务。周恩来同志指示报社办好业余学校，组织工人同志学政治、学文化，要求编辑人员作好教学和辅导工作。对报社工作的女同志，周恩来同志给予了特别关注，他教育大家要体谅和照顾女同志在家务负担、抚养子女上的特殊困难。并要求报社认真办好托儿所，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建议党组织经常关心这一工作，努力把党报的托儿所办成国民党统治区儿童保育的模范。党报队伍中年龄最小、文化最低的是报童和部分报丁，周恩来同志关心他们成长的事例也非常令人感动。当报童被国民党特务殴打、扣留时，他总是亲自交涉、抗议，直到释放。他在报社营业部接待客人时，专门抽时间去旁听发行工作干部向报童上文化课。事后，他指出：要用报童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压迫、剥削的具体事例来教育他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要选择报纸上浅显、生动的短文作为文化课的教材，这样，他们就能学得懂、记得牢。在《新华日报》这个战斗集体中，每一个战士都感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受到他的言教与身教。他

从不放过党报宣传上出现的失误，也从不放过干部思想和工作上的错误，他的批评教育总是既严肃认真，又耐心诚恳的。在他的正确领导下，《新华日报》既是一个充满同志友爱的革命大熔炉，又是一个催人奋发向上，焕发着勤奋学习风气的大学校。一大批年轻的新闻战士，不怕反动派的摧残、迫害，冲破重重封锁，把党报真正办成“团结抗战的号角，人民群众的喉舌”。

同时，在我国的新闻事业史上，也开创了无产阶级报纸的一代新风。一切剥削阶级的报纸，总是用谣言代替真实消息，用欺骗、蒙蔽掩盖他们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充斥在这些报纸版面的是达官贵人、豪门巨富的活动，或者是离奇荒诞的色情凶杀、迎合落后阶层庸俗低级趣味的所谓“新闻”。《新华日报》则是向广大人民报道真实的消息，揭露反动派的造谣、欺骗，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他们的愿望、要求和斗争活动。在新闻的语言上，《新华日报》一扫国民党统治区报纸沿袭多年的陈词滥调，把半文半白的所谓“报刊文体”改变为明白易懂的群众口语。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上，国统区报纸总是把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播发的稿件当作消息的唯一来源，变为资产阶级记者的传声筒。《新华日报》则是经过多种渠道开辟新闻来源（譬如：广泛采集社会主义国

家、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播发的新闻，搜集各国驻华使馆新闻机构、各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主办的报刊，旅居国外的共产党员等多方面提供的资料），经过分析、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写出综合报道，帮助读者正确了解国际形势，获得系统的国际知识。过去的许多报纸，常把副刊当作应景凑数的版面，被谑称为“报屁股”，刊载的也多是迎合低级趣味，供茶余酒后消闲的文字。《新华日报》的副刊以它丰富多采的内容和鲜明的战斗风格，廓清了旧报纸的腐旧习气。它定期出版适应工人、青年、妇女、科技界、文艺界、理论界不同需要的专刊，吸引了各阶层的广大读者。新华副刊的社会服务版更以它的“医药卫生”、“法律顾问”等专栏为广大群众解答疑难、提供帮助，成为党报联系群众的纽带，树立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全新风格。党报在宣传的具体内容上，也有它独具的特点，譬如：介绍解放区军民的英勇战斗和建设成就的通讯报道，富有文学色彩的“国际述评”，资料丰富、切中时弊的“经济述评”，取材广泛的地方通讯，短小犀利的杂文等，都以鲜明的战斗风格，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在印刷出版上，《新华日报》在设备陈旧落后、纸张粗劣的条件下，始终是当时重庆各报中印得最清，出得最早的。在重庆各报公开举行的排字、浇版、印刷竞赛中，《新华日报》都遥遥领先，

夺得了第一。国民党当局动用了宪兵、警察、特务的力量，收买了大批地痞、流氓企图封锁、扼杀《新华日报》，但在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报少年战士——报丁、报童面前遭到完全破产。这些少年战士大都只有十四、五岁，他们不怕殴打，不怕关押，在重庆的大街小巷、在百里左右市郊集镇，到处都能听到他们叫卖《新华日报》的嘹亮声音。这声音使反动派惶惶不安，使人民拍手称快。

斗争的实践证明，用革命思想武装、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是能创造出人们意想不到的奇迹的。在《新华日报》这个战斗集体中生活过的每一个同志都不会忘记，严峻斗争中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和周恩来同志的言教身教，和他的榜样力量分不开的。

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我们今天的斗争。在领导《新华日报》的革命活动中，和建设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历史上，周恩来同志的卓越思想和光辉实践，他的崇高品德和榜样力量，都是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理论遗产。对我们今天的工作，尤其是开创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新局面，仍然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南方局军事组前段（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工作概况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军事组

一九三九年一月，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开展统战工作，在南方局统战委员会之下，设立了若干个工作组，军事组就是其中的一个。军事组是南方局和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的参谋业务工作机构，一九四一年二月以前，组长由叶剑英兼任。

军事组的人员，没有固定的编制定额，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国共关系好时，人员就多；关系不好时，人员就少。多时有十多人，少时只有一、二人，极其灵活精干。

军事组的任务，主要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确定其内容。有军事谈判、军事联络、军事宣传、军事情报、发展我党地下武装和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交通通信网，购买和收集我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急

需的物资、器材和图书，招收我军急需的各种人才，帮助国民党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等等。

军事组的人员组成

从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军事组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在重庆南方局机关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对外都称为十八集团军的参谋或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是派到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的人员，这些人对外称中共南岳训练班代表团成员。

在重庆南方局机关工作的军事组成员有：

钱之光：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六年夏）

曾希圣：十八集团军参谋处长（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〇年四月）

王梓木：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谋（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三月）

肖正岗：新四军参谋处长（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秋）

傅大庆：十八集团军军事翻译（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

钱江：十八集团军参谋（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

九四〇年四月)

雷英夫：十八集团军参谋（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

张清化：十八集团军参谋（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

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的军事组成员有：

李 涛：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谋，中共南岳训练班第二期代表团代理团长（第一期团长是叶剑英）、政治工作教官（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

边章伍：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谋，军事教官（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

薛子正：十八集团军参谋，军事教官（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六年二月）

吴奚如：十八集团军参谋，政治工作教官（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

李 崇：十八集团军参谋，军事教官（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五月）

中共南岳训练班代表团，一九四〇年五月撤回重庆后，除吴奚如很快分到新四军工作，李崇分到海南岛琼崖纵队工作外，其余三人都在军事组工作。

工 作 概 况

一、军事谈判

当时，有关我党我军和国民党的正式军事谈判，都是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以中共代表、十八集团军领导人的身份，同国民党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张冲、徐永昌、刘为章等人进行的。朱德、林伯渠也参加过。军事组的一般成员均未参加，只是在负责同志去谈判之前，帮助整理材料，出点主意，或帮助起草谈判提纲。谈判之后，帮助整理和起草给党中央、军委、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新四军军部的文电。有些特殊重大的军事问题，周、董、叶等南方局领导直接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请示。

二、军事联络

这是一项经常性的大量的工作，内容基本包括参谋和后勤两部分。

参谋工作有：

战况报告。那时党中央规定，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一般战斗情况，包括作战时间、地点、参战部队、作战经过、战绩、敌人战术特点等，除报中央军委外，同时也报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组接到前方部队

的报告后，即改用一般军事公文体式拟稿，报国民党军委会。经常性的战报只送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为章等总参谋部负责人。重要战报则送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于右任、孙科、陈诚等国民党党、政、军要人，以至分发各报馆、各党派负责人及有关外国使馆、记者等，以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

情况通报。主要是向国民党军委会通报日军、伪军的番号、部署、主官、作战行动、作战特点、实力、武器装备、作战和训练情况等等。重要情况随时报告，一般情况每月综合报告。国民党军委会也把他们每天印刷的《敌伪广播》和每周印刷的《敌情通报》等材料发给我们。军事组接到这些通报，经过研究，或摘要报告中央军委、前方总部和新四军军部，或定期汇编成综合资料送南方局和中央军委参考。

协同作战计划的商定。这种工作有时是我党我军主动向国民党军委会报告，请求批准或争取合法备案，如我军向山东、冀鲁豫、冀南、华中等地进军的行动等。有时是国民党提出要我军执行或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如一九三九年冬季攻势作战等。军事组接到这类文电，立即报告周恩来和叶剑英，然后根据情况或转报中央军委、前方总部、新四军军部，或研究后提出处理的建议，供领导参考。

反磨擦斗争。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失守后，抗战

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采取了消极投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同年夏,国民党当局指示各地顽固派向我八路军、新四军开始了磨擦斗争。他们在政治上制造谣言,煽惑群众,在军事上向我军发动进攻,杀害我抗日干部,制造了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八路军、新四军忍无可忍,在党中央领导下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磨擦斗争,情况极其尖锐、错综复杂。这时军事组就集中主要力量掌握反磨擦斗争的情况,研究反磨擦斗争的策略,并以各种办法(来往文电、写传单、编小册子、写文章等)揭露国民党制造磨擦的罪行,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要求国民党惩办罪犯,制止挑衅和进攻。

准备、整理军事会议材料。“皖南事变”前,国民党召开的军事会议,如南岳军事会议、重庆的全国参谋长会议等,都照例邀请我党我军的领导人参加。这种会议,一般是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负责人参加。只有一九四〇年三月,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除叶剑英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身份参加外,肖正岗也以新四军参谋处长身份参加了。军事组在军事会议前,要收集有关情况,研究会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准备材料和提出预案,供负责同志参考。会后,要把会议上印发的材料和参加会议同志的记录或记忆的材料

进行整理，摘要上报中央军委或通报有关方面参考。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决定，八路军停止给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呈报，包括战报在内，亦不向他请领经费。

后勤工作有：

向国民党领取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经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卫生医疗器材、医药、交通运输车辆、通信器材等。并根据中央的规定，分发给各有关单位和地区。

建立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及港澳、上海等地的交通运输网。当时，主要交通运输线有五条：重庆——西安——延安；重庆——昆明——贵阳——桂林——上饶——皖南新四军军部；重庆——西安——洛阳——晋东南十八集团军总部；重庆——昆明——桂林——香港——上海；重庆——天水——兰州——新疆。同时还建立了相应的通信联络网。这样就使党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国统区、敌占区的地下党组织连结起来了。

从国统区或港澳、上海以及外国，购买我党我军急需的物资、器材、图书、医药等。

这部分工作由军事组和办事处共同办理，具体工作主要由办事处做。

三、军事宣传

军事宣传是党的整个宣传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当重要节日，如元旦、春节、国庆节、九一八事变、七七抗战等纪念日，军事组用写文章、作报告和接见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办法，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战主张，特别是党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分析抗战局势，批评国民党的错误军事政策；宣传我军在敌后战场的伟大胜利和光荣传统。每当各抗日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粉碎敌人的“三光”政策和有重要作战行动时，都要写文章、作报告、发战报加以宣传。当战局或时局有重大变化时，周恩来、叶剑英除亲自写文章外，还指示军事组的同志写文章，阐述我党我军对局势的看法。如，一九四〇年德国希特勒进行闪击战，在欧洲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胜利，日本人和汉奸、亲日派就乘机扬言日本也要在中国实行闪击战。国统区人心惶惶，许多朋友甚至国民党的党、政要人和军队都不知所措，纷纷向我们请教。这时，叶剑英领导军事组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由边章伍执笔写了一篇题为《论闪击战》的文章，经叶剑英审查修改后，在《新华日

报》上连续发表，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九四〇年秋，日军在敌后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周恩来要军事组给《新华日报》写社论，揭露日寇的滔天罪行，宣传我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事迹，指明我们必胜的前途；批驳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的谰言，揭露他们配合日军袭击我军制造磨擦的罪行。这些宣传，起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广泛的同情。

针对国民党的所谓军事制度“改革”，削弱“异己”势力的政策，军事组成员和其他有关同志一起收集材料，利用多种方式进行揭露。如当时最流行的四句话：

“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就是对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利用抗战削弱、消灭异己，扩充嫡系部队的反动政策的揭露和抨击。因为当时国民党对有战斗力、有作战经验和抗战有贡献的非嫡系部队，既不鼓励表扬，又不补充人员和发给武器弹药，或者只发些老枪破炮，而对根本不上前线的蒋氏嫡系部队，却拼命补充兵员，发给新枪新炮，这就引起了公愤。

军事组还在会客交朋友的过程中，针对着不同的对象做了很多宣传工作。

四、军事情报

为了弄清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为中央军委

和南方局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军事组采取了公开和秘密相结合，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相结合，专业人员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等办法收集情报。通过国民党和敌伪的广播、报纸、杂志、书刊收集情报，是很平常又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如，一九三九年冬，我军在晋察冀击毙敌阿部中将的消息，就是首先从日本的广播中知道的。这个消息为叶剑英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驳斥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皖南事变”时，蒋军和日伪军配合作战消灭新四军的消息，也是先从日本的广播中获得的。

通过在友军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地下党员、老朋友、老部下、老同学、老同事或亲属关系，使我们对国民党各部队的实力、活动情况及各部队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矛盾等，都了解得比较清楚。如，早在一九四〇年九月初，我们即得到了国民党要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可靠情报，知道蒋介石军令部已给顾祝同下达在长江南北“扫荡”新四军的命令。我们立即把这个情报报告了党中央和军委。军委马上转告华中局和项英等，令其提高警惕，切实做好防顽袭击的准备工作。如果新四军的领导能够根据中央指示去做，“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为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需要，我们在国民党特

务机关军统局、中统局中也发展了一些党员，或派进了一些党员，结识了一些朋友，从而得到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反共投降情报和其他核心情报。如一九四〇年春，轰动重庆的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案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张蔚林、冯传庆等原是戴笠军统局电讯总台的工作人员，他们由于不满军统局的黑暗反动，主动找到南方局军事组请求加入共产党，或到八路军、新四军工作，张露萍则是我们派进去的党员。叶剑英在征得南方局同意后，亲自领导了这项工作。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最后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牺牲。

为了整理好情报，提供使用，军事组在叶剑英的主持下，经常召开情况研究会。一般是定期开，如遇紧急情况则随时开。会议的开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会前出题目，指定专人准备，开会时，准备的同志作比较系统的发言，然后大家讨论；有时在会上大家先汇报各自掌握的材料，然后再进行研究。这种会既是情况会，又是工作会，通过综合分析材料，得出必要的结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军事组编写的《国共磨擦真相》（油印本）和“皖南事变”时军事组起草的传单《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的真相》（铅印的），以及一九四〇年三月叶剑英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发言稿《作战与磨擦问题》，都是经

过召开这样的会以后搞出来的。军事组同志在《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上发表的重要军事文章，也基本上是这样产生的。

住在周公馆的徐冰、张晓梅、陈家康等，经常来参加我们召开的情况研究会，并提供过重要情况，作过重要的发言。有时董老、博古也来参加，并给予重要的指示。叶剑英在每次会上，都要讲话和作结论。他经常告诉大家，对各种材料要用一根红线穿起来，也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来观察分析各种事物。他善于结合实际情况运用这种方法，生动地、深入浅出地分析各种问题，使军事组的同志很受教育。一九四一年二月，叶剑英回到延安军委工作后，把开研究情况会的办法带到军委总参谋部，并有了新的发展，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重视和各方面领导同志的好评。

五、军事交友

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交朋友的活动，是军事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通报》中指出：“在国内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二百万友军，反对剿共，至少是反共消极，以孤立和分化顽固势力，仍成为推动时局的中心一环”。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由

于他们早年追随孙中山干革命、办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代表，又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中共代表等等，故在全国党政军各界都有很高的威望，同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军队中的高级将领都有广泛的交往，经常见面交谈军国大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军事组的同志，多是在全国各派系军队中做军、师、团长和有关军事机要人员的工作，和他们交朋友，得到了很多帮助，争取了广大的同盟者。解放战争中各地起义投诚，接受我军改编的部队，共一百七十七万三千四百九十人，占我军歼灭敌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这些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部队领导人，多数都是我们过去的老朋友。

六、发展壮大我军力量，开辟和 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

为了发展壮大我军力量，开辟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组除了尽量设法解决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根据地的一些困难问题外，对南方局所辖范围内的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武装斗争，也十分关心。对琼崖纵队，东江纵队，滇、桂、黔边疆纵队和福建、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的地下武装斗争，都进行过研究布置。这些部队和地区的领导人叶挺、袁国平、

张文彬、庄田、廖承志、陶铸、刘晓、方方、钱瑛、罗世文等，每次到重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都要和他们详谈，同他们研究当地的武装斗争问题。并要军事组把有关敌情、友情的资料告诉他们，还设法给他们解决一些困难。

“皖南事变”时，南方局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工作人员来不及撤到延安和华北、华中根据地或疏散到其他地方的情况，做了秘密到川东打游击的准备。叶剑英和军事组对如何开辟和建立川东以梁平、华蓥山为中心的游击区，进行过反复研究和具体部署，包括去川东的路线、交通工具、武器弹药，以及如何加强地方组织领导，发动群众，选配干部等，都做了安排。后来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这一方案才没有付诸实施。

七、帮助国民党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武汉失守以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了第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决心在南岳衡阳举办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致电我党中央毛主席，请派人去教游击战争课。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这是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措施，决定派人去。毛泽东说：“去吧，去讲我们的一篇道理。”会议确定派叶剑英带几个人去，

具体人选等问题由周恩来和南方局确定。后周恩来和南方局决定，派叶剑英带领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去。开始叶剑英担任游训班副主任，后改任副教育长。其他人分任军事或军队政治工作教官。办完第一期，因周恩来要回延安，叶剑英调回南方局工作。第二期结业后，李涛等鉴于国民党在训练班中有排挤共产党、限制共产党的反动行为，曾请示第三期还去不去，党中央回电说还是要去。这样，直到办完第三期，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国民党大改组游训班时，我们才宣告撤出。

派人到南岳游训班任教，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国民党正规军中的影响。以前，国民党军队中很多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认为共产党都是些青面獠牙的魔怪和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野人。当和我们接触后，才弄清了真相，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仅不是魔怪、野人，而且是最文明、最讲道德、最有理想的革命家和军事家。通过帮助国民党开办游训班，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和学生。他们当中有好些人接受我党的主张，在抗战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反磨擦斗争中，多持消极态度或向我们提供情况；在解放战争中，纷纷率部起义，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两 场 激 战

南方局军事组前段工作，曾发生过两件特殊重要的事。这就是全国参谋会议和“皖南事变”前后的斗争，也就是参加粉碎国民党第一、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

一、全国参谋会议

一九四〇年初，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即将被粉碎，但他们不甘心失败，想用召开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的办法，在会上宣布十八集团军的“罪状”，以便接着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知三月初在重庆开会，并邀请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参加。

接到国民党军委会的通知时，叶剑英因摔伤了胳膊正在治疗，而这次会议是以检讨冬季攻势作战为议题的，因此对叶剑英去不去参加会议，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叶剑英等考虑到，这次开会正是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的时候，蒋介石国民党必不甘心失败，很可能搞什么阴谋诡计。因此必须去参加，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董必武、博古等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当时周恩来已去苏联治伤，不在重庆）。于是叶剑英决

心带病“出征”，并组织军事组的同志日夜加班，收集情况，整理资料，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准备战斗。

经过侦察，得知蒋介石国民党确有在会上围攻十八集团军的阴谋。他们采取的主要办法是：蒋介石以检查冬季攻势失败为名，布置有关战区诬蔑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等等，因而使友军无法完成冬季攻势任务。这样，蒋介石就可以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违犯军纪军令的罪名，对十八集团军进行“讨伐”。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先将前方发来的战报和十八集团军几年来的战绩，综合起来写了一份详细材料，说明十八集团军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和蒋介石军委会的抗战命令积极行动的，并且获得了最光辉的战绩。我们还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印发的《敌伪广播》中，找到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共同社有关我晋察冀部队在涞源战斗中击毙日军著名混成旅长阿部中将的广播原文。共同社在这篇广播稿中，称阿部中将是日本的“名将之花”，在和我十八集团军“三天惨烈的血战中，作了悲壮无比的牺牲”，日本“全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殓阿部中将之英灵。”这篇报导，从反面最有力地证明我十八集团军是全国最坚决抗战并取得了

光辉战绩的部队。这就可以彻底粉碎所谓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和不执行命令的谰言。

关于磨擦问题，我们采取不迴避的方针，用承认磨擦、分析磨擦原因的办法，理直气壮而又委婉地说明过去各地搞磨擦的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我们历来是反对磨擦的。军事组查找了过去积累的国民党军队搞磨擦的材料，并请刚到重庆请求赈灾的冀南代表齐燕铭等，到周公馆详细地介绍了国民党石友三所部在冀南制造磨擦、破坏抗战的事例，请刚从山西来的在二战区秘密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介绍了阎锡山命令旧军进攻新军和准备对日妥协投降的材料。又从有关方面收集到朱怀冰、张荫梧、侯如墉等制造磨擦、进攻太行山十八集团军的许多罪行材料，特别是找到了张荫梧联合日伪皇协军共同进攻十八集团军的命令、文件等，这是最有说服力的铁证。

当时决定这次斗争的方针，就是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原则：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策略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具体运用到这次会议上，即是拥蒋抗日，反对磨擦，一切以抗战、团结、进步的大局为重，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赢得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同情，粉碎蒋介石国民党扩大反共磨擦的阴谋诡计。

果然不出所料，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杀气腾腾讲了半天。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现在要开会检讨各部队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要严肃军纪军令。接着他话锋一转，就说根据很多人报告，这次冬季攻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破坏抗战，制造磨擦”，“贩卖毒品，破坏经济”等等不法行为所造成的。现在要彻查此事，整顿军纪军令。

蒋介石的话音一落，天水行营参谋处长盛××、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冀察战区参谋长黄百韬、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罗泽闓等，便争先恐后地发言，历数十八集团军犯下的“罪行”，一片对十八集团军诽谤诬蔑之声。一时会场上杀气腾腾，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蒋介石、何应钦自以为阴谋得逞，心中窃喜。比较进步正直的人，则提心吊胆，为共产党、十八集团军和叶剑英参谋长捏一把汗，为团结抗战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兴亡担忧。

叶剑英参谋长胸有成竹，身坐虎口，稳如泰山。为了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一散会回来，就同南方局的领导和军事组的同志，一起分析情况，研究对策。把原来准备好的材料，进行调整补充，针对会上的情况，写成了一篇高屋建瓴，证据确凿，顺理成章，极有说服力的论战演说稿。

发言稿共分两部分：一是作战问题，二是磨擦问题。

作战问题，主要讲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我军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斗，并获得伟大战果的情况。

第一，说明华北战场是整个抗日战场的重心，十八集团军坚持华北抗战，必然要同敌人进行全面的斗争。整个华北是一个整体，作战时各个地区，包括山东、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冀东等地必须互相配合，这样才不致被敌人各个击破，华北的局面才能得以坚持。两年半来，我们就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在华北进行斗争的。

第二，用总结汇报的形式，说明抗战两年半来，十八集团军在敌后作战克服了缺衣少食、缺乏武器弹药和敌人残酷“扫荡”种种困难，花费了巨大代价，获得了辉煌的战绩。计比较大的战斗二千六百八十九次，歼敌八万余人，缴获步马枪二万余支、轻重机枪四百余挺、各种炮一百余门，争取伪军起义一万九千余人。破坏交通共一千一百七十余次，其中破坏铁路一千三百余里、公路二千四百余里、破坏车站三百一十六个、炸毁桥梁三百八十七座、炸毁汽车二千余辆。我军阵亡将士一万五千余人，负伤将士四万余人。这些战绩不仅为敌人所承认，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

人士所称道，而且有些也曾为蒋介石和统帅部所嘉奖。

第三，详细地报告了我军冬季攻势战役的具体部署，作战经过，所获战绩。我们接到统帅部举行冬季攻势作战的命令时，尽管华北敌军正在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军许多部队正在进行紧张的反“扫荡”作战，但我们仍然抽调了十五万五千余人的兵力，按照统帅部的命令，周密部署，努力作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计毙敌一万九千余人，生擒伪军一千三百余人，获战马、骡马一千六百余匹。我伤亡官兵八千余人。特别是用国民党军委会印发的敌人广播材料，来证明我军圆满地完成了冬季作战任务，证明我军的作战行动极其坚决、积极、英勇，是按照蒋介石统帅部的抗战命令办的。

这就从战略上、战役战斗上彻底地粉碎了蒋介石想借检查冬季攻势作战为名，加罪于十八集团军的阴谋诡计。

磨擦问题，首先承认各有关战区和集团军所提的磨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为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叶参谋长首先从政治上、战略上提出了四个原则：

第一，我们提出磨擦问题的目的，是要对磨擦的事实加以研究，分析磨擦的原因，找出正确的办法来消除磨擦。决不应扩大磨擦。

第二，许多磨擦都是由于政治意见的分歧，工作方法的差异，奸人挑拨离间的活动，下层干部互相仇视和报复等，没有及时得到正确解决而产生的。如果把磨擦的现象当成原因来看待，抹杀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真实原因，那么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第三，有人把十八集团军当做“异军”看待，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许多磨擦事件发生的根源。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国家的军队呢？我们的回答：是国家的军队。它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团长以上干部是经过军事委员会任命的，编制是军事委员会规定的，经费是从军政部领的，行动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去完成战斗任务的。十八集团军和其他友军也有差别，那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我们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团结起来共同抗战。

第四，我们和友军之间的磨擦不是不能解决的政治原则上的矛盾，而是在大敌当前全民抗战的前提下，所存在的一种局部的一时的现象。

对各地磨擦的具体情况，也一一作了分析。

会议在轮到叶剑英参谋长发言的时候，全场座无虚席，鸦雀无声，个个翘首相望，都想看看中国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的代表叶剑英，怎样渡过这一险关。

只见叶参谋长不慌不忙地讲了起来。当他讲到三

十分钟时，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报告说，按照规定三十分钟发言的时间到了。这时叶剑英参谋长说我还没有讲完，并故意问主持会议的蒋介石怎么办？蒋无可奈何，只好说讲下去吧！当叶剑英讲到国民党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罪行时，蒋介石实在沉不住气了，质问道：“有这回事吗？”叶参谋长说：“有。”马上把缴获张荫梧和日伪勾结的来往电文和信件的照片，从皮包里拿了出来，一件一件宣读，并把证件当众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作梦也没有想到叶剑英皮包里藏着这些使他和国民党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法宝，并且当面示众，他只有唉声叹气，直拍脑袋。几个打冲锋围攻十八集团军的人，一个个低头不语，十分尴尬。叶参谋长越讲越有劲。与会的绝大多数人，越听越同情十八集团军和共产党，抱怨国民党反动派太不象话，竟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叶剑英参谋长整整讲了一个半钟头，讲话结束时，大家纷纷起立，肃然起敬。

会议结束后，和叶剑英一块去开会的新四军参谋处长肖正岗，一跨进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的门，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高兴得跳了起来。他绘声绘色地向大家介绍，叶参谋长讲话时会场上人们的情绪急剧变化，和到最后热烈拥护讲话的情况，及蒋介石、何应钦等在会场上的狼狈相。大家听了都极其高兴，

周公馆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

正当肖正岗说得热闹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委员长侍从室打来的，说蒋委员长请叶剑英参谋长去吃晚饭。大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正在分析时，电话铃又响了，还是侍从室打来的，说蒋委员长今晚有事，改日再请叶参谋长吃饭。半个钟头之内，蒋介石侍从室打来两个内容完全不同的电话，说明内中必有缘故，但当时并没有弄清楚。后来从日本和台湾国民党联合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中揭开了这个谜。“秘录”中说，蒋介石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晚，亲自拟定了一个对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的“训示”，要点是：

“一、不应认防地为私有，不应掩护叛军，袭击友军。

二、应言行一致，协力互助，建立共信。

三、不应擅委官吏，更不应残杀政府官吏。

四、不应尽征民粮，断绝民食。

五、不应擅发私钞。”（蒋介石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日记）

这是蒋介石在叶剑英发言之前，按照既定计划拟定的。当时在蒋介石看来，他们在会上突然袭击，叶剑英是无法招架的，顶多申辩几句。这样，蒋介石就可以宴请叶剑英参谋长为名，用“训示”的办法，宣布十八集团军的五大“罪状”，再进行更大规模的军

事进攻就师出有名了。但他没有想到，叶剑英的一篇讲演，把他强加给十八集团军的五条“罪状”驳得体无完肤；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又都同情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结果，蒋介石既失掉了马上发动内战的借口，又一时组织不起力量，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只好赶快取消晚宴，暂不宣布这个“训示”，拖一个时期再寻找别的借口反共。这就是蒋介石先通知叶参谋长参加晚宴，紧接着又通知取消晚宴的秘密。

董必武、博古等听了叶、肖的汇报和国民党有关方面的反映，认为这是一次大胜利。董老还高兴地说，这是“叶公舌战群儒”。毛主席也多次引用过董老的这句话，并说这是叶剑英对革命的一大功劳。

二、皖南事变

蒋介石在全国参谋会议上反共失败以后，又改变手法，把进攻的主要矛头由对十八集团军转为对新四军，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先从薄弱的地方下手。一九四〇年夏，顾祝同、韩德勤提议要江北新四军四、五、六支队调往长江以南。在叶剑英主持下，军事组开会研究了 this 提案。大家认为，这是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诡计，他们妄想分割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战略联系，以便集中力量在长江以南首先聚歼新四军。因此，我们不仅不应把江北部队南调，相反地应该坚决按照

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赶快把江南部队撤往江北，华北八路军应抽调有力部队迅速南下，以便集中力量和敌人争夺华中，这是当时我与顽固派斗争的战略重点。从时间上说，皖南部队北调，八路军南下，越快越主动。军事组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认为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这样，顾、韩的提议遂被我党拒绝。

七月中旬，在周恩来、叶剑英同何应钦、白崇禧会谈时，国民党提出了中央提示案四条，中心一条是要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內都搬到老黄河以北。九月初，正当我党我军和对方商谈全面解决军事问题时，国民党军令部却下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扫荡”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军事组得到这个情报后，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立即以周、叶的名义起草电报，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接到电报即于九月六日发出紧急电令，要新四军准备自卫行动。电令说“据重庆周、叶报告，确悉军令部正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十月十九日，国民党以正副总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十八集团军、新四军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臭名远扬污蔑八路军、新四军的《皓电》，强令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部队在一月之內统

统撤到老黄河以北。为了顾全大局，朱、彭、叶、项（英）在复何、白的《佳电》中，除驳斥了《皓电》的造谣外，答应把皖南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十二月八日，何、白针对《佳电》发出《齐电》，进一步作反共舆论动员。当我新四军奉命北撤时，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包围袭击，新四军九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在和国民党谈判时，惨被逮捕，副军长项英遇害。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军事组收到何应钦、白崇禧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的《皓电》和十二月八日的《齐电》后，当即送周、叶阅，并电报党中央和朱、彭、叶、项；又在叶剑英主持下，先后对这两个代电反复地进行了研究。大家感到形势严重，一场大的磨擦不可避免，势在必打。我军最危险的地区是长江以南，特别是皖南。军事组接到十一月九日朱、彭、叶、项答复何、白的《佳电》后，因电文错漏字很多，我们改正后又复写清楚才送给了何应钦、白崇禧。根据周、叶指示，这份通电又增发给蒋介石、冯玉祥、于右任、孙科、孔祥熙等，也发给了民主党派人士。接着，军事组将半年来国共双方来往的文电，包括何应钦、白崇禧同朱、彭、叶、项之间来往的电报和国民党的秘密反共文件及有关各

地磨擦情况的材料，汇编成册，秘密送到西安和桂林办事处印刷、散发。还曾委托国际友好人士把这些册子带到香港和国外散发。用以揭露国民党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阴谋，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争取国内外的同情。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为了挽救危局，日夜奔忙。他们分别打电话或直接找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冲、刘为章等国民党负责人，表示严重抗议，痛斥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向各民主党派和外国友好人士说明事变真相，阐述中国抗战形势的严重危机及克服的办法。为了应付意外的情况，他们布置了南方局、各省地下党组织和一些友好人士的疏散荫蔽工作。他们时刻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提出处置的意见，及时向中央请示汇报。在这紧急关头，周恩来还亲自指导《新华日报》的宣传斗争，并为《新华日报》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有名诗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屠杀新四军，掀起反共高潮的罪行。一月十八日，周、叶感到还有很多人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弄不清楚，急需赶写一个彻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阴谋诡计的传单，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公诸于天下。当日下午，叶剑英亲自主持了有军事组和有关各方同志参加的会议，经过详细研

究，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和重庆一些报纸的造谣诬蔑，并各方人士最关心的问题，归纳了七、八个需要驳斥和解答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讨论。会后，叶剑英指示军事组根据会上讨论的情况，连夜赶写出《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见附件)，从八个方面彻底揭开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诡计。十九日凌晨，经过周恩来、叶剑英审查修改后定稿。周恩来高兴地说，这个传单“材料丰富确凿，道理清晰透辟，气势高昂委婉，彻底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底，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出去之后必能得到广大的同情。”于是决定赶快印刷，秘密散发出去。传单由新华日报报馆赶印出来之后，军事组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散发了出去。最有趣的是，这个传单，当天竟然一直送到了何应钦等人的办公桌子上，把蒋介石、何应钦这些罪魁祸首气得要命，大骂国民党特务机关无用，大骂国民党宣传机关无能。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南方局军事组前一段的工作概况。

“皖南事变”不久，叶剑英和军事组的多数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奉命撤回延安，军事组的工作即由王梓木、薛子正负责。现王、薛均已去世。自一九四一年二月至一九四六年五月这一段军事组的工作情况资料，有待于继续征集。

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

江南惨变，亲痛仇快，而军事委员会通令与其发言人及重庆中央、扫荡、益世、商务、时事各报纸则对新四军任意污蔑，曲解事实，混淆听闻，即较公正之报纸在言论统制之下，亦不能揭露阴谋，发表公论，致黑白不分，沉冤难明。吾人为使国人能明白事变真象，揭露内战阴谋，以挽救目前严重危局起见，特择其有关重要的八项，分别记明如下：

- 一、关于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
- 二、关于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
- 三、关于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
- 四、所谓“借端要索”问题
- 五、究竟谁打谁的问题
- 六、所谓要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的问题
- 七、叶、项正副军长与新四军部队
- 八、取消番号与审判军长

一、关于所谓新四军违反 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

新四军奉命坚持大江南北敌后抗战，虽然物资弹药极端困难，天然与人造的地形，极端不利，但他却能尽一切的有效方法克服困难，打击敌伪，使拥有四个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之敌，不能离开大江南北的据点周围一步，其炸毁交通要道，破坏敌伪组织，尤为经常显著之成绩。且这些英勇行动，不仅为中外人士所称赞，亦为上级官长所嘉奖，截至去年五月四日止，奖电已达五十二件之多，如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蒋委员长致叶军长电称：“……以有进无退之决心，召示部属，足征精忠报国，至堪嘉慰。中正”；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致叶军长电称：“……查该部游击努力，缴获独多，应予传令嘉奖，以资鼓励，……顾祝同”；又如上官云相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电叶军长称：“……贵部奋勇杀敌，壮烈牺牲，不胜钦佩，悼念之至，……上官云相”。

事实已充分证明：新四军在敌后抗战中，是坚决的执行了上级的命令并光荣的完成了上级的命令。就是在这次调往江北的行动中，也没有丝毫违犯上级命令之处，这可从下面的事实证明：

一、叶、项正副军长在答复何、白两总长的佳电中，已公开表示，留江南新四军部队可全部渡江北移。

二、因为新四军决定北移，所以叶军长曾亲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请示移动手续，顾长官亲自与叶军长拟就经苏南渡江北上的路线与移动的时间，同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并派有联络参谋到新四军军部，一面监察，一面联络。

三、上官云相总司令允许新四军假道苏南渡江。

四、事实上新四军江南部队大部已于十二月五日开始出动，陆续经苏南渡江北上。

五、敌人本月十七日广播中称我新四军一部：“由宣城附近窜至我（敌自称）占领地区之金坛、句容方面败走，我各部队乘此好机，于十四日以来在各处捕捉该敌，予以歼灭”；这证明皖南新四军一部，已经在被友军围歼之后，从不断的血战中进到了苏南。

六、蒋委员长在去年三月全国参谋长会议上，总结过去抗战的报告中沉痛的指出：在抗战中战绩最坏，纪律最差的是第三战区，在会场上所发的对冬季攻势总结的报告书中所指标的部队，恰恰是今日围攻新四军的部队。

七、新四军虽在开拔费、伤病抚恤安置费及弹药等毫无补充条件之下，而其留在皖南部队仍毅然于一

月四日全部出动。铁的事实告诉我们：新四军过去是坚决的执行力了抗战的命令。现在是坚决执行着渡江北上命令，此次也正因为他坚决的执行命令，毫不避忌的将一切行动计划告诉了顾长官及上官总司令和友军，而友军却在新四军必经的路上，布置包围的埋伏，以致受了这样惨重和不可补偿的损失。同样证明那些袭击新四军，包围与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友军，正是那些在去年冬季攻势中不执行命令、按兵不动、不受调遣、抗战成绩最坏、纪律最差、最不遵守命令的军队！

二、关于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

新四军江南部队既经决定渡江北上，故走那条路线问题乃随之而生。原来新四军大江南北的交通运输，是靠由皖南敌区（芜湖附近）渡江经无为的路线来维持的。后来桂军开到无为地区后，就经常袭击新四军的交通运输，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官张云逸夫人、孩子及曾昭铭等二十余人，并军饷七万元被扣后，这条路线即完全断绝。虽经屡次抗议要求开放，但终归无效。因此新四军大江南北之交通运输停顿数月之久，不得已始改道苏南过苏北。这次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原由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与叶挺军长当面规定经由苏南

渡江，乃循此路线，实行月余，渡江者已逾两万，所剩者只皖南军部、直属团队及后方机关伤病员兵、老弱妇孺万余人，徒手者过半，忽于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命改道经皖南铜陵、繁昌渡江北上，实际上此路决不可能。其原因：（一）新四军皖南部队背受友军五个军之三面包围，即东有冷欣之×××军，南有张文清之×××军与莫兴硕之×××军，西有范子英之×××军与陈万仞之×××军，北面则有敌人之封锁，新四军渡江北调，敌人早已广播，故陆上加紧布置，其十五师团集中于繁昌、铜陵地区，数百汽艇往来梭巡于扬子江上，而皖北李品仙最近更抽调三师之众，集中无为地区，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且公开声明将消灭新四军于江滨，故此路绝对不能通过。（二）我为侦察这条交通线，江北指挥官张云逸曾派小部到无为地区侦察，受桂军猛烈袭击而失踪，江南军部曾派其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渡江，尝试二次，亦均失败，并被友军夺去一些船只。

以上说明了新四军要从皖南渡江北上，是绝不可能的，长江天堑难渡还是其次，而主要的是由于敌人封锁，与友军包围阻截。新四军为了避免与李品仙部发生冲突，免遭无谓牺牲，所以坚决要求仍依原来渡江路线，由苏南渡江北上，顾司令官首先同意，上官云相总司令亦表示允许，委员长后来也准许假道苏南，

所以新四军由泾县向苏南前进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执行上级的命令，那些所谓“新四军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泾县向太平南窜企图袭上官总司令部”等字句，只是故造借口，不能作任何事实根据，真所谓“冤沉三字狱”也。并且新四军顺此前进，离开军部所在地（云岭）只一天行程，便在茂林地区遭受友军之包围、袭击和消灭的事实，更足以说明他们是在企图配合敌寇共同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失效后，不得不狰狞地单独来实行这一阴谋的罪行。

三、关于新四军移动的时间问题

甲、敌后部队的转移，不能象大后方一样，可以很快的毫无顾虑的集中调动，所以新四军的北移，他要经过敌人重重封锁，渡过天堑长江，处处要准备作战，弹药的补充、给养的筹措、时机的选择以及路线的规定等都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乙、最高统帅开始是了解这种困难的，所以才有去年十二月十日延长新四军二个月移动期限手令的颁布，说“前令新四军各部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间，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

丙、事实上江南部队大部已经在中央的限期内陆续的到了江北地区，只留下皖南的军部、直属部队及后方人员万余人，因为种种困难不能解决，不能很快行动，不得不延迟到本月四日。就到这个时候也仅仅得到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开拔费二万元（因为领款的人还在三战区未回），其余更连空虚的口惠都没有。

丁、何总长应钦本月十一号在最高国防会议上，曾公开的讲新四军的情形很好，根据下边的报告已准备开拔，不过还有些小的困难，他已下令顾长官就地解决。实际上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围攻的惨剧业经继续了五昼夜，也还未找到新四军的丝毫过错。这证明新四军的移动，不仅没有借任何事实拖延时间，相反的他还不顾及无弹无饷的痛苦、友军不予让路的困难，竟毅然就道迅速开拔，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损失，演成了皖南的惨局。

四、所谓“借端要索”问题

甲、新四军的军饷自去年九月份起无理停发后，经叶、项正副军长几次请求，才补到十二月份，但本年正月份又不发了。

乙、新四军的弹药，自去年三月份起到现在，十月有奇，除收复南陵一役因消耗过巨，至再三要求始

获发五万发。此外，颗粒未得到上级补充，并且这五万发弹药，也远不能补充这次战役的消耗。

丙、四年血战中，新四军一万多的伤亡。许多残废呻吟，遗孤叫苦，直到今天，没有得到政府方面分毫的抚恤。

丁、开拔费直至本月四号，仅仅批准二万元，并且也还未领到。

事实证明，新四军请求发给军饷、弹药、抚恤金、开拔费，是为完成上级命令所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需要。按照事实，也是任何部队应受的必然待遇，根本就不能说是要索。所谓“借端要索”的罪状，只不过更加暴露了故意困饿新四军以更便利施行其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罢了。

五、究竟谁打谁的问题

事实胜于雄辩，友军有计划有步骤的消灭新四军是有铁的事实为证：

甲、新四军的大部是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一部在苏南，而在皖南的只有军部、直属部队及其后方人员万余人，但其中伤病人员即有二千余人，其余亦非战斗人员。既为避免与友军磨擦而假道苏南，难道还能对比自己力量大约七八倍的友军发动攻势吗？

乙、事变发生，周恩来、叶剑英两同志连日以电话询问，顾长官避不接谈，去电亦不得复，证明其有意回避责任。

丙、中央特务机关通电全国称：“日来各战区剿匪军进行顺利，匪首叶、项被擒，各有关战区加紧布置”云云。

丁、上官云相总司令十三日通电称：“已歼灭新四军七千余人，奉令对新四军应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

戊、上官总司令十三日另一通电更称：“新四军主力已被消灭，残匪二千余人仍图挣扎，限十四日午十一时全部解决”云云。

这一切都证明，谁在阴谋计划消灭谁啊？

六、所谓要在江南建立根据地问题

甲、叶、项在其佳电中已公开声明江南部队转移江北。

乙、如果要建立江南根据地，为什么还要放弃已有三年基础的皖南根据地，而愿转移苏南敌区北上呢？

丙、既准备在江南建立根据地，为什么原在该区的第一、第二两支队及三支队一部又先后开往江北而不开回江南呢？

丁、假定是准备建立江南根据地，为什么当去年周恩来同志与中央进行谈判时，顾祝同、韩德勤要新四军江北部队调往江南，新四军不趁机南下呢？

凡此种种，都说明“建立江南根据地”之说是妄言，皖南的人民是可以为新四军作证的。

七、叶、项正副军长与新四军部队

军事委员会发表通令，重庆一些官方报纸都借口说新四军这次遭受围歼，只是因为二、三长官不对所致，但请看以下事实的回答吧！

甲、叶、项正副军长是抗战有功的将领：

(一)蒋委员长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致叶军长电中称：“（衔略）以有进无退之决心，召示部属，足征精忠报国，至堪嘉慰。中正。”

(二)白副总长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致叶军长电称：“（衔略）英勇杀敌，斩获奇巨，至堪嘉许，尚希再接再厉，以奏大功。白崇禧。”

乙、叶、项正副军长抗战有功，不仅全国皆知，抑且举世闻名。全世界知道叶挺、项英坚持江南游击战争，打击敌伪最要害的京沪、京芜国道的人决不在少数，描写他们的书都出了很多本。

丙、叶军长因为上级故与为难，在去年十一月俭

日曾与中央提出辞职，并未获准，且顾长官在十二月东日挽留电文中还说：“该军开拔在即，领导统率，正深依赖，所呈辞去一节，应毋庸议”，现在忽又说罪在他个人了。

丁、叶军长在开拔前，为请示移动路线，曾亲到三战区司令部。如新四军只有一、二长官为难，为何不即扣留叶挺个人？且项副军长为报告新四军四年抗战及困难情形，曾于十二月要求到重庆来，为什么中央不准他来呢？

这一切都说明决不是个人问题，更不是叶、项两人问题，而是有计划的消灭新四军的问题，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包围、被聚歼，最后的两千多人，已在一月十三、四日血战七昼夜，及此次阴谋被举发之后，上官云相就下令消灭净尽，这不是明证么？

八、取消番号与审判军长

甲、新四军江南部队，坚持在京沪、京芜地区作战，他的四年来光荣战绩，已深深的印在中外人士的脑中，尤其沦陷区域的人民，更无不看新四军是他们自己的部队一样，今天把他们无故的消灭，并且取消番号，审判军长，这是全中国人民全世界正义人士都不能同意而动公愤的事！

乙、新四军皖南部队只不过是全军的一部（约十分之一），今天取消了他的番号，那么，究竟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何以善其后？这是组织内战者必欲迫使新四军无路可走，并假手敌伪配合剿共的阴谋。但新四军皖南部队既已因上当而被消灭，难道大江南北留下的新四军仍会上当么？没有番号的人民武装就不能抗战么？

丙、叶挺将军是北伐战争中的先锋，是敌后抗战中的勇将，不是污蔑所能毁他，也不是审判所能屈他的，而且在打伤了他的臂后，捉起来加以污辱，这更增加人们愤怒。他的精神，他的忠勇，早已深深的种植在每个新四军战士的血液中；这个不是取消番号、审判军长所能解决的；而且我们会看到千千万万的叶挺起来，那更是打不伤、捉不到、审不完的！

丁、还有些官家报纸，更拿叶、项正副军长比着韩复榘、石友三，这不仅是侮辱民族战士，而且是泯灭良知。谁都知道韩复榘是逃跑将军，而叶、项正副军长抗战以来，深入敌后，驰骋于京芜、京沪道上，出入于敌伪封锁中，四年苦斗中百战功勋，试问这样的勇敢将军，举世能有几人？谁都晓得石友三是通敌汉奸，半年前八路军的将领早已揭发他的阴谋，指出他配合敌伪夹击八路军的罪行，而当时军委会办公厅还说这是谣言。不料事实昭彰，难于掩盖，终遭显戮，

而重庆官方报纸，还故意曲解他是违犯军纪军令。但这一次中央日报，因为要污蔑新四军，哄骗八路军，竟不自觉说出石友三的罪行，是暗通敌人危害友军（当然石友三所危害的友军只有八路军），而恰在同天重庆官方所发表的日本广播上，正说到他要配合三战区的剿共，来乘机消灭窜入苏南敌区的新四军。这幅对照的讽刺画，已足够证明谁是石友三？谁是被石友三之流所包围歼灭的友军？

够了，新四军是光荣的！

叶挺、项英的战绩是不可动摇的！

（录自《皖南事变》，中央档案馆编）

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回忆在国统区的机要通信工作

童 小 鹏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到一九四七年三月，由于国民党关闭了谈判大门，我党代表和办事机构被迫撤回延安。在此期间，我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及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根据中央的指示分别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同国民党打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交道。虽然环境复杂，斗争尖锐，但由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等领导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并根据当时当地情况，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灵活的策略，领导全体工作人员和地下党组织，克服重重困难，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打击了顽固势力；恢复、发展、巩固了地下党的组织；团结了

一大批朋友和爱国人士；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开展了广泛的外事活动等，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所托付的任务。我党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的代表及其办事机构，后来虽然被迫撤回延安，可我们是满载着胜利的果实，赢得了国统区的人心和国际的友谊，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的。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一方面我们党领导了解放区和游击区军民在战场上同敌人进行了公开的武装斗争（在日本占领区内也有隐蔽的斗争）；另一方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我们在同国民党合作的同时，也存在着复杂的斗争。在国统区内，我们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进行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条战线的斗争；斗争方式有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合法的等等。我党代表团和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是我们党在国统区的司令部，我们搞机要电台工作的同志，就是这个司令部的通讯兵。我们的工作，有时是公开的，但主要是秘密的——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轰炸和国民党特务的限制、破坏，维护了党的核心机密，保证了通信联络的畅通，及时地传送了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和各级组织向党中央的报告、请示，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十月长征到陕北以后，十二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不久便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了统战关系。除了开辟对国统区的秘密交通外，还先后在天津（胡服台）、上海（冯雪峰台）和西安（刘鼎领导）建立了三个秘密电台。“七七”事变后，又在南京（由阎锡山驻京办事处电台代为联络）、太原、武汉、广州、长沙、桂林、重庆、洛阳、兰州、迪化（现乌鲁木齐）等地相继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同时建立了无线电台。这样，我党就开辟了与国统区公开与秘密的空中通信渠道。

现在把我所经历的机要通信工作的情况，回忆记述如下。

（一）在西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以后，党中央应张学良电邀，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我党代表到西安。我作为随员也到了西安，搞译电工作，当时仍使用刘鼎领导的电台。刘鼎是西安事变前党派到张学良处做联络工作的。因为工作很多，逐渐增加了电台和译电力量。电台工作人员有曾三、涂作潮、

彭绍坤、申铭鸿、梁茂成等，译电员有李金德、朱志良等，由我负责。

一九三七年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我们从张学良公馆搬到七贤庄，成立“红军联络处”，公开挂的是“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的牌子。我们公开架起天线，和延安及云阳红军总部联络。当时搞机要电台工作的同志都是“红小鬼”，大家都穿黑色学生装，可以自由地买半票去看电影。周围群众都叫我们这里是“娃娃店”。联络处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处长是李涛。电台台长是林青，报务员有林英才、吴希圣等。这时成立了机要科，科长是我，译电员有李金德、刘澄清、朱志良、黄文炳、范希贤等。

我们的电台，是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正式批准的，又值国共合作刚开始，国民党对我办事处和电台还没有什么限制和破坏。我们除了保证通讯联络通畅外，还给军委三局买了很多通讯器材并设法送回延安，这对加强党和红军的通信联络工作起了一些作用。这里的机要通信工作，一直坚持到西安办事处撤退。

（二）在 南 京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

天津。七月十五日，我党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国民党中央。这个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十七日，我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八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国防会议，邀请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参加。八月九日我作为随员一同搭龙云的专机到南京。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同时轰炸南京，蒋介石才被迫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于八月二十五日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的正副总指挥（九月改为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九月二十二日公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意我党在南京设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周恩来同志又到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博古、叶剑英同志留在南京。当时，阎与我党关系较好，经周恩来同志同阎商量好，由阎驻南京办事处的电台为我们发报，所以我们就未设电台，译电员是我和康一民两人。报务员李白在南京住了几天，就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去了。李克农是办事处处长。为了对外联络需要，李克农买了块少将牌子，是少将处长。我买了块少校牌子，当了少校科长，穿上军衣常到阎锡山的办事处去联系工作。当时通报的地点是延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太原办事处。

蒋介石实行的是一条由政府 and 军队包办，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他的军队在战场上总打败仗，遇敌即慌忙逃窜。而我们八路军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出师晋北平型关，首战告捷，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平型关大捷，威震中外，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赢得了全国人民对八路军的同情、支持。当时虽然国共合作了，但国民党内的一些反动分子，总搞小动作，破坏合作。有一次，南京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攻击我八路军的消息，说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李克农同志看到后，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把该报的总编辑找来。总编辑来到之后，李克农同志指着报纸责问他：“你说我们‘游而不击’，有什么根据？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消灭了多少日军，全世界都知道，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做想干什么？对其后果你负得起责任吗？”几句话把那位总编辑问得头上直冒汗，连忙点头哈腰，赔礼道歉，并表示明天一定登报更正。

当时，共产党和八路军在上海、南京一带是有威信的。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机轰炸很厉害，用火车抢运军需物资是很困难的，但是拿着八路军的护照就能得到了优先照顾。管运输的王超北就从上海用火车抢运了一大批物资到西安。十一月底，我们从南

京经安徽向南昌、长沙撤退，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袁超俊、吴志坚和我，还有汽车司机王应絮，分乘两辆小汽车离开南京。在过一条河时，要用船将汽车摆渡过去，码头前排队等船的汽车很多。我们的车子开到以后，一看排这么长的队，好长时间不见车子挪动，真急死人！我们走到前面，见一辆汽车卡在码头上，别的车无法上船，所以压了很多车。这时袁超俊、吴志坚同志（他们挂着斜皮带，戴上八路军的臂章）就问：“谁的车卡在这里？”有人回答是何部长（即何应钦）的。因为何自己已经过了河，留下空车就不管了。他是国民党的军政部长，谁都不敢说话。袁超俊同志不管那一套，就大声说：“不管谁的，卡在这里，阻碍交通，压这么多车，日本飞机来轰炸怎么办！”说着，和一些司机一起动手，把它推到河里去了。交通顿时畅通起来，周围的司机都感到痛快。

（三）在 武 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失守，国民党政府事先已迁往重庆，国民党中央及军事委员会迁到武汉。九月，中央已派董必武同志先去武汉开展统战工作，建立办事处，后来处长钱之光也从南京到了武汉，住在安仁里。这里对外叫“董公馆”，电台就架设在此。十二

月，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武汉后，成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安仁里住不下，经国民党同意于一九三八年一月迁到原日租界大石洋行。李克农为长江局秘书长，吴克坚和我为秘书，我兼机要科长。二月，周恩来同志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三厅厅长。不久，凯丰、邓颖超、罗炳辉、李涛、聂鹤亭、张爱萍、张经武、边章伍等都到了武汉。这期间，虽然有王明的投降路线的干扰，但由于周恩来、董老、叶剑英和其他同志的抵制，使党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的方针得以贯彻，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动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统战工作和国际的宣传工作都有很大开展；南方各省党组织也相继恢复和发展。办事处为延安和前方运送干部和物资的工作也特别忙。

由于形势的发展，电台通报量越来越多，除了设在大石洋行的电台外，在湖北省委机关又设一部半公开电台，以后又在二耀小路设一电台。联络地点有延安、重庆、长沙、南昌新四军、竹沟彭雪枫办事处，鄂东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处，前方总部等。这时机要电台人员也增多了，电台方面有申光、肖贤法、柳仁甫、刘澄清、王清生（王老五）、刘成义等，由申光负责，主要搞机务。由于工作开展得快，人员培

养一时跟不上，有的报务员水平比较低。有一次派一报务员经徐州到山东建电台，出发前申光教给他如何使用波长表，但他到了徐州就忘了，只好又回到武汉重新学习。机要科有李金德、彭健、朱轩、张海清等。

当时来往的电报很多，我是长江局的秘书兼机要科长，所以整天在四层楼内上下跑送电报，大家叫我“机要科长”，有些同志听成“鸡鸭科长”，慢慢就叫开了。后来就把“鸡”当成机要，“鸭”当成电台的代名词。所谓“鸡鸭行”，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当时正值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英勇地抵抗着敌人。在国内外都有很好的影响。国民党这时期还不敢公开对我们进行破坏，因此我们的活动比较自由，有时可以看看电影，饭后无事就租自行车沿江跑跑。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时，除值班员外，可以坐卡车到法租界躲避。

长江局时期，机要工作是在周恩来、李克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们特别重视保密工作和对机要人员进行保密教育。李克农的主要工作，一是抓情报，由张唯一、陈家康专搞此事；二是抓机要。机要工作都在四楼，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不准别人随便上去。情报、电报看完就烧掉，不存档。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时，值班的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的

楼梯下躲避，不准出大门。有一次朱轩值班，警报响了，他违反规定提着密码箱也随大家躲到法租界去了，回来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以后就再未出现此类事情。

李克农同志的警惕性是很高的。我们架了一个电台在湖北省委的住处，李有时到那里去检查工作。陶铸当时在湖北省委工作，也常到那里去，但他两人不认识。一天晚上，李克农正在电台那里，陶铸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李一见有生人进来，立即警惕起来，不让陶进去。陶铸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生人挡着他，也很惊奇，他偏要进去，李就偏不让他进。结果两人互相怀疑，就在走廊上打起架来，把李克农的眼镜也打掉了。后来别的同志赶到，对他们作了介绍，才消除了误会。大家都说，克农和陶铸演了一场“三叉口”。还有一次，黄埔军校的一些同事和同学如张治中、康泽等，请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吃饭，李克农亲自去做保卫工作。吃饭时，他们轮流向周恩来同志敬酒，有些人企图把他灌醉。李克农同志为保护周恩来同志的健康，便起身抢过酒杯代饮。饭后，还有人请来摄影师，给大家照相。第二天，李克农同志到照相馆去，装着看看底片的情况，他拿到底版后（当时底版都是玻璃的），看了一下，“哗啦”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嘴里说真可惜，实际上是他假装失手摔

碎的，是防止特务利用这张照片去宣传。以上这两件事，都说明李克农同志过去在敌人内部进行斗智斗勇，养成了良好的保密习惯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的言传身教，给我们机要人员进行了很好的教育。

由于形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未开完六中全会就赶回武汉，进行了各项工作。在武汉危急时，他亲自同肖贤法、张元谈话，布置他们留在武汉搞地下电台。后来因条件困难，肖、张于一九三九年撤到重庆。

在武汉期间，做机要通信工作的同志们，都忠诚可靠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保住了机密，完成了任务，受到了锻炼。

（四）在桂林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前，机要人员分两路撤出：一路到重庆；一路经长沙、衡阳到桂林。到重庆的一些同志是乘“新升隆”轮船去的，船开到嘉鱼附近被敌人飞机轰炸，译电员张海清和新华日报的二十多位同志英勇牺牲了，其他同志因上岸躲避，幸免于难。我是八月下旬随王明、周恩来、博古、徐老去延安的，十月中旬带了一批机要人员到西安时，平汉路已不通，不得不从西安坐自己卡车经过陕南、豫西到湖北的襄樊、沙市。过长江到长沙时碰到长沙大

火^①，便经衡阳到桂林。长沙办事处原来有电台，长沙大火后即撤退到衡阳，最后到桂林。

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在大火中走出长沙，后赶到南岳，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国民党的军队老打败仗，蒋介石想学习我们的游击战争，便决定在南岳办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要求中共派人去教课。经中央批准，叶剑英当了训练班的副主任，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等当教官。因此在南岳训练班也设了一个电台。

桂林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联络粤、黔、湘、赣的交通枢纽。由于事先周恩来已同李济深、白崇禧打了招呼，经他们同意，李克农到桂林设立了桂林办事处，工作也开展得比较顺利。但是经常受到日本飞机轰炸，城里晚上电灯不亮，电台只能搬到郊区乡下；乡下没有电，只得用手摇马达（15瓦），因此要专门派人摇马达。

桂林电台是我们设在华南的中心台，负责人是申光，台长刘建辉，报务员刘成义、刘澄清、王立生、马锦帆，机务员王清生等，人很多。联络地点也很多，

^① 一九三八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后，进入湖南北部，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以焦土抗战为名，下令火烧长沙。自十一月十二日晚间纵火，至十四日大火熄灭，全城房屋大部焚毁，居民被烧死二万余人。

有延安、重庆、新四军、南委、广东、江西、南岳、海南岛等。机要科有李金德、朱轩、彭健、张德碧、张健虹等。桂林是当时由延安到华南各地及香港、越南的必经之地，来往人员要经过这里，海外华侨集资支援抗战，大批物资也由香港先送到这里，再转运延安及抗日前方。胡志明同志从延安回国时就路过桂林。他住桂林时，当过办事处的党支部书记和俱乐部主任。后来他回越南搞游击战争，我们还帮助他们建立了电台，编制了密码。可以说他们的机要通信工作是我们帮助搞起来的。

一九四〇年底到一九四一年初，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退，工作人员都回到了重庆和延安。

（五）在 重 庆

武汉撤退前，长江局即派周怡到重庆建立了十八集团军通讯处，以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十月二十五日在武汉出最后一张，十月二十六日就在重庆出第一张，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好，出报的时间衔接得很好，一天也没有中断。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

会，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错误，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南方局。一九三九年一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成立之前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并建立了电台。从此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四川省委撤退为止，前后近十年的时间内，重庆都有我们公开的或秘密的电台。当时环境复杂，条件困难，任务繁重，斗争尖锐。我们不仅完成了南方局本身的机要通信任务，而且在西南和华南国统区以及香港都布置了机要通讯网，在政治、军事、情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初期，办事处设在城内机房街，电台也架设在那里，机要科在棉花街。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日机大轰炸，当晚办事处即迁到了红岩。第二天，机房街被炸毁。当时红岩办事处还未修好，我们就在一间破房子里继续工作。房子修好后搬到三楼。南方局设秘书处，由我负责，下设第一科（机要），第二科（电台），第三科（抄写），后来就分散了。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我们经历了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南方局领导全体同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在我们这条战线上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限制以至取消我们的电台，其中最根本的是想破译我党的密码，截取我党的核心机密。我们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

直接领导下，针锋相对，用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保证了机要通信联络的畅通，保证了党的核心机密的安全。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以后先后制造了湖南“平江惨案”、河南“竹沟惨案”和在华北搞军事磨擦，于十二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国民党对我们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活动也加强了限制，工作人员和家属都要搞“身份证”，对我通信联络工作也多方限制，要登记报务员及译电员和电台的波长、呼号、联络对象等。重庆卫戍司令部大约一个月来检查一次。每次检查，我都以办事处机要科长的公开身份，在传达室与他们应付。当时我们报了电台台长和一、二名报务员、译电员，其余都报家属。每人都准备好一套假口供，预先安排好相互间的“家属关系”，如董必武的外甥，林伯渠的侄女等等，以应付国民党的突袭、检查。后来他们提出要到电台上看看，我们就把电台从三楼搬到一楼，让他们看。另外，我们在三楼还架设了一个小秘台，以大掩小，以公盖秘，准备在大电台被他们破坏后，我们仍能同延安等地联络。从这时起，我们的保密教育和保密制度更加严格了，译电员各管各台，不准通气；无必要不外出，外出时实行二人同行等。

国民党特务为了破译我党的密码电报，在办事处附近参政会楼内架设了侦收台，抄收我密电码，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为此，我们采取了真假结合，以假报（乱密）掩护真报，以外围（战报）掩护核心的办法。遇到长报，就由几名译电员同时分译。总之，大家千方百计力保核心机密的安全。

为加紧对我们的封锁和限制，国民党对市场上的无线电器材实行严格控制，不经卫戍司令部通讯部门的批准，任何人不准购买此类器材。我们就通过地下党员或进步朋友，进行秘密购买，不仅够自用（自己装电台），还能不断供应延安三局。如真空管、漆包线、矽钢片、变压器等，只要有去延安的汽车或飞机，必定带一些去。为防不测，我们在办事处外面逐渐设立了几个秘台，钱松甫和江红，刘澄清和康瑛，都在外面建立了秘台。另外，周恩来同志派王少春同志到刘文辉处进行统战工作并建立电台，译电员是王的爱人秦惠芳，报务员是杨作爱、石励。这个台从一九四二年起直到一九四九年四川解放，都同中央保持联络。

在抗战两周年时，我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打退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和反共逆流。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国民党表面上又搞什么国共谈判，对我们的公开破坏活动，有

时紧有时松，但是对我们的机要通信工作，却一直没有丝毫放松，而是日益加紧破坏的。

一九四〇年十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使反共高潮达到了最高峰。在一月十一日晚上，周恩来同志正在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紀念会，机要科收到关于皖南事变的特急电报，立即送到他的手里。当晚，南方局马上开会，布置了各种应急措施。面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领导全体同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赢得了国内外人民和朋友的支持、同情。同时，我们也作好了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准备。国民党特务对我们整个机关进行封锁包围，并制定了袭击我们，包括监禁、逮捕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同志的计划，形势很紧张，斗争特别激烈。为了减少敌人突然袭击时的损失，许多同志都向延安或外地疏散。留下坚持工作的同志都作好了坐牢、牺牲的准备。我们机要部门也有计划地实行了隐蔽精干、疏散人员、支援外地的办法。少数坚持工作的同志，更加提高警惕，从传达室到三楼，层层设防，保密措施更加严格，人人都有分工，遇有紧急警报（传达室电铃），各负其责，各守岗位。平时准备了火炉、火盆

和盐酸，遇紧急情况，可迅速销毁密码。本来周恩来同志已批准我回延安进党校学习，由刘三源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因发生了皖南事变，形势急剧恶化，我就不能去学习了，留下来坚持斗争；刘三源转到香港工作。不久，我又得了副伤寒，住院治疗。只留下译电员邱松、紫非、郭庆标和电台的肖贤法等两三位同志，工作任务繁重，来往电报增多，但他们不怕困难，夜以继日地工作，保证了通讯联络的畅通。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南方局事先得到这个情报，立即报告党中央，中央又立即转给斯大林。开始苏联还将信将疑，但还是根据这个情报作了准备，避免了不少损失。事实证明了我们的情报是准确的。后来斯大林对我们的同志说，中共的情报工作称得上是第一。最先得到这个情报的是被“四人帮”迫害死的阎宝航同志。他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交朋友，是在同一个国民党的官员谈话中，得知这一消息，马上向南方局报告的。

一九四三年，南方局对干部进行了审查，并用密码将审干结论及时发往延安。这就使曾在国统区工作的许多同志到延安后免遭“抢救”，否则，将有更多的同志被康生等人残酷斗争。

同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我党及时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并准备坚决回击，这次反共高

潮被迫停止了。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周恩来同志已回延安),何应钦的军政部以各军办事处都不设电台为借口,把我们的电台封闭了,只让我们通过军政部的总台同延安和前总联络。这是对我们明目张胆的封锁、限制。虽经周恩来同志致电蒋介石,要求将电台转交董必武作为党台使用,但遭到蒋的拒绝。一九四四年四月,军政部又要来检查我们的密码本,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董必武同志与何应钦交涉,何答应暂缓检查。不过,我们还是准备他们随时来突袭的,在保险柜里放着假密码本,以应付突然检查,我们使用和备用的密码本则另外妥善保存。在通过他们军政部电台发报时,我们仍采用真假结合,以假乱真的办法。给他们发的主要是事务性的和报纸摘要;延安和前总来的主要是战报,用较简单的密码,这是准备让他们破译的。有时胡乱写许多“电报”让他们发去,这是真正的“无字天书”,事先约了记号,我们自己明白,收到后扔到一边就完了。可国民党的破译机关则大费脑筋,猜来破去,只能是一无所获。与此同时,我们还另外设有两部机密小台,一部使用,一部备用,这是绝对保密的,只有极机密的电报,才经它收发。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应蒋介石电邀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我们趁此机会要求国

国民党启封电台，但它仍不同意。在整个谈判期间的机密电报，全靠我们的机密小台收发。为了掩护，我们往军政部电台送更多的“无字天书”让他们发，有时也让他们发一些内容属半公开或公开的电报。蒋介石在重庆谈判的同时，命令阎锡山向我上党解放区大举进攻。毛主席就是通过我们的这部5瓦小电台，指挥刘邓部队进行英勇反击的。毛主席在发给他们的电报中说：有敢来犯者，你们狠狠地打，你们打得越好，消灭敌人越多，我们就越安全。刘邓指挥部队取得了上党战役歼敌三万五千多人的伟大胜利，保证了毛主席安全地回到延安。毛主席还用这个小台发报给中央，督促用一切办法向东北派干部和部队，建立东北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率我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上次的经验，我们这次不向国民党交涉恢复电台，而是直接向马歇尔交涉。美军司令部派人给我们架设了一部400瓦电台。长期封闭我们电台的国民党当局无话可讲，也不敢来检查了。周恩来同志还亲自请来架台的美军技术人员吃饭和照相留念。这是我们斗争的胜利。一九四六年五月，我们从重庆迁往南京时，这部电台也一起搬迁，一直用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回延安，才交还给美军。

在重庆期间，由于南方局的正确领导，我们做机要通讯工作的全体同志对党忠诚、埋头苦干、严守机密，较好地完成了机要通信工作。国民党的破译机关，虽然把我们的电码都抄收下来，并且请了许多“破译专家”、“数学专家”进行破译，但根据各方面的可靠消息，这期间我们的密码除了准备让他们破译的战报密码外，核心密码没有被破开过。

我们机要通信队伍总的来说是可靠的，但也出现了少数败类。一九四一年河南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投敌，有两名译电员带了密码跟他跑了。袁到重庆，当了特务，为特务机关出谋划策，起草了一个报告，要向王梓木、龚澎和我突击策反。这些情况，我们当时虽不知道，但大家都作好了一切准备，即使遇到了这种情况，宁可牺牲，决不叛党！

除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之外，在工作上、生活上也碰到许多困难。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四两日，日本飞机大轰炸，我们连夜搬家，红岩村的房子还未盖好，就在一间破瓦房里打地铺，男女各一边。在“露天饭堂”吃饭。敌机来了，就钻到防空洞里译电报。由于大巴山、秦岭的阻隔和经常下雨，空中联络干扰很大，我们又缺少大功率电台，遇到不好的天气，联络很困难。为了使联络畅通，电台的同志们，积极想办法，利用下半夜干扰少的有利条件突击工作。电灯

不明、电压不稳，我们自买器材安装变压器升高电压，还准备了手摇马达，以应急需。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重庆是有名的大“火炉”。原来建房的设计是二层楼，盖到二楼时发现不够住，又加上一层，所以三楼的房间很矮、又小，临时在屋顶上开了个天窗，活象个“鸡鸭笼”。我们在三楼办公，夏天一到，炎热得很，男同志打着赤膊工作也常常汗流浹背。一九四三年以前，经费很困难，大家动手种牛皮菜吃，还买些榨菜、臭豆腐乳。一九四三年以后开始规定伙食标准，生活有些改善。结婚生孩子后，爸爸妈妈就更加辛苦。

由于来往电报多，同志们经常夜间工作。尽管工作繁重，生活艰苦，但同志们情绪饱满，积极负责。秘书处党的生活、政治学习和文化娱乐等方面，都是比较活跃的。大家不仅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在完成任过程中锻炼了革命精神，增长了工作才干。

（六）又回到南京

一九四六年五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五月份我党代表团也迁到南京，驻在梅园新邨。在此期间，代表团通过机要通信传送了许多重要情报。如郝鹏举的预谋叛变，代表团得到情报后及时用电报通知了陈毅

同志，争取时间，采取有效对策，减少了损失；在莱芜战役中，韩练成将军率国民党四十六军起义，事先他在南京和周恩来、董必武同志联系好了，我们用密报通知山东我军和他联系，后来起义成功，对战役起了重大作用。陈毅同志说，由于这支部队的起义，使我军减少许多损失。

代表团在南京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被迫撤回延安。这时，美帝国主义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我党代表团为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同蒋介石和马歇尔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斗争。斗争中团结和争取了广大的中间势力和国际的同情。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公开使用的电台，仍是马歇尔在重庆时支援的，国民党不敢干涉和检查。但是斗争更加尖锐，形势也更加复杂了。国民党特务对我们的监视、封锁更严了。我们除了公开的电台以外，还有秘密小台。另外有新华分社的新闻台，专门收抄新华社的电讯稿并向中外记者发稿。为防备特务突然袭击，以及公开机关撤退后保持同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通讯联络，我们除支援上海地下党组织一些机要人员外，在南京还布置了三个秘密电台，撤退前都交给了地下情报系统的何以端同志（吴克坚系统）。这些电台，在解放战争传递情报中起了作用。

由于国民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关闭了谈判的大

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同志撤离南京回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董老和我们全部撤回延安。从此，结束了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架设电台十年的历史。

抗战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南方、西南广大地区（包括香港）和东南亚华侨党组织中（解放后已取消）和日本占领下的上海等地，布置了一整套无线电秘密通信网。据初步统计，在武汉、湖南、桂林、昆明、重庆、雅安、江西、广东（包括韶关、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上海、南京、香港等地区先后建立了近六十个电台，其中公开设在办事处的十四个，半公开的六个，其余都是秘密电台（由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有四个台未沟通使用）。这些电台除保持经常联络外，还准备了应付各种突然事变，和公开机构撤退后隐蔽下来继续工作的力量。

在此期间，锻炼、培养了一批对党忠诚可靠，又有业务专长的机要通信战士。在蒋管区搞机要电台工作的人员，是不断增加又常有调动的，前后参加电台工作的人员约一百二十人，译电人员约八十人。这些人员主要是延安三局和中央机要处派来的，在思想上，纪律观念上和业务上都有很好的基础。但要适应蒋管区斗争的需要，还必须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此外，我们还就地培养了一些同志。

周恩来同志对机要通信人员是非常关心和认真培养的，他和董老、剑英、若飞、颖超等领导同志，经常对机要电台人员进行政治教育，革命气节教育，组织纪律和钻研技术的教育。同志们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受到了锻炼，政治、文化、业务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全国解放后，这些同志大都担负了重要工作，这和那时候的锻炼、培养是分不开的。在我们这个队伍中，绝大多数同志是表现好的，为党的机要通信事业做出了贡献。

（七）斗争没有停止

我们的公开机关和电台从国统区撤退了，但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依然在“第二条战线”为党的事业艰苦地战斗着。

在解放战争中，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城工部，周恩来同志为部长，李维汉同志为副部长。通过一个个秘密电台，继续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统战工作，学生、工人运动及武装斗争。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央撤出延安前，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城工部成立秘书处，我任处长，罗青长为副处长。中央机要处拨出了一个科共十余人，军委三局专门联系蒋管区的密台，它们都由秘书处统一管理。在撤出延安迁移到山西的

行动中，通过这些机要电台，及时将中央指示发到国统区去，并收译上海、香港及其他密台发来的报告，在解放战争中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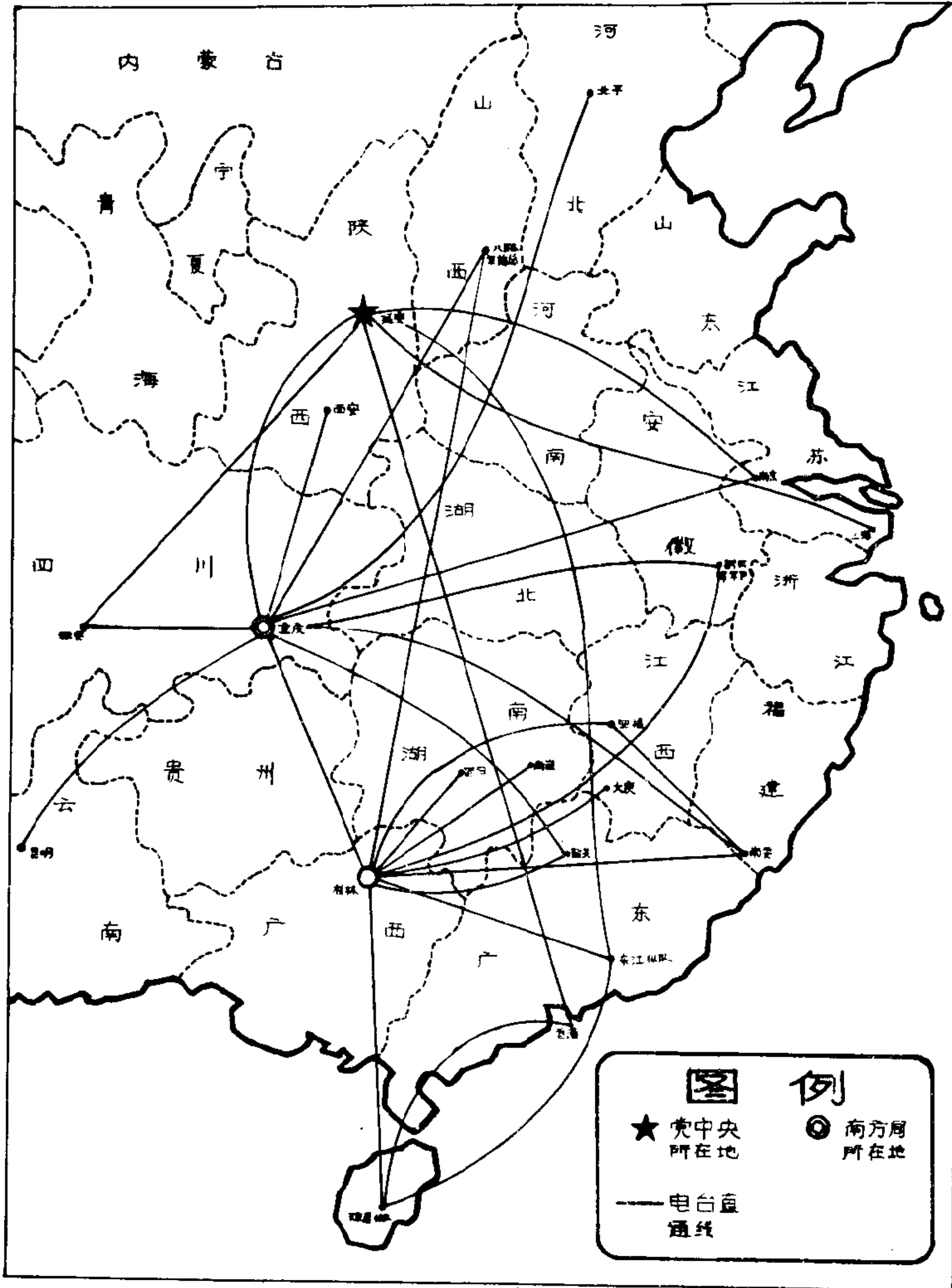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八年中央机关迁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后，城工部仍保留机要科。城工部后改为统战部，于一九四九年三月进北京，住在中南海，还有机要科和专用电台，直到全国解放。原来的地下的机要人员大部分归社会部，少数留统战部。一九五一年底，统战部分出去一部分成立了中联部，机要人员也一分为二。后来统战部机要科除留下少数人外，其他人员或回中央机要局或到国务院机要处。电台就回通信兵部了。

至此，我的机要工作任务就结束了。我前后一共做了约十五年的机要工作，其中在国统区先后工作了十年零八个月。

一九四七年七月，周恩来同志在陕北召集的机要会议上，总结我们的机要通信工作时曾经说过：我们在技术上是落后于美蒋的，但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步，总有一天能赶上他们；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先进的，我们的人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这是他们永远赶不上的。他们虽然有技术，但漏洞很多，我们可以利用。只要我们不断加强政治，又注意技术进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这是对我们机要通信工作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几十年来，我们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

的斗争实践,完全证明了周恩来同志上述论点的正确,它必将指引我党的机要通信事业,在新形势下取得新的胜利!

南方局电台联络示意图



南方局整风学习 运动的部分情况

王 汶 姚黎民

四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党中央整顿三风的决定，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这次整风，使参加整风的每个同志增强了党性，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同时，整风也促进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开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

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中央关于整风的决定和指示，联系南方局所处的国民党统治区对敌斗争尖锐复杂的特殊环境，决定整风运动贯彻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进行正面教育。在组织方面，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由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亲自负责。将南方局机关、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社的同志，根据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分别划分小组学习中央整风文件。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分批调回南方局进行整风学习，其他同志，根据不同具体情况，分别组织阅读文件，进行学习。

为了用中央文件武装党员的头脑，使之切实掌握整风的锐利武器，学委会首先引导大家由浅入深地认真学好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其中有：毛泽东同志的三个报告^①、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同志写的关于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成功和成功后由于首领们居功骄傲、生活腐化、宗派斗争而失败的经验教训）等。这些文件除在《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上刊登一部分外，还将全部文件印成小册子，发给大家，作为必读材料。其次，学委会还选定了一些专题，由领导干部和有专门知识的同志向大家作报告。如关于革命气节、秘密工作、组织纪律、干部政策、干部审查、统一战线和“三勤”方针的报告。邀请郭沫若

^① 即《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同志作了关于文艺上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报告，夏衍同志作了中国戏剧发展及其民族特点等报告。

学委会按照学风、党风和文风的顺序，分为三个部分组织大家学习。强调认真学习，提高思想认识，边学、边讨论、边检查。学习学风问题时，讨论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是怎样结合的，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并检查了个人的主观主义作风等。学习党风问题时，讨论了入党条件和手续，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干部的标准，干部政策，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纪律等。学习文风问题时，讨论了新文化的形式与内容等。

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对每个阶段的学习都亲自布置和作总结报告。他们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和大家一起参加学习，言传身教，引导大家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和解决问题。在一次整风学习小组会上，有一个同志在发言中用了点文言和成语，别的同志就批评他的发言是党八股、教条主义。对此，周恩来同志立即指出：这种批评不正确，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现象，更不能形而上学地去对待党八股、教条主义。并指出发言的这个同志，在工作中能以理论指导革命实践，不能说是教条主义。他谆谆地教导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贵在联系实际，具体地分析问题，正确地解决问题。通过这

件事情，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

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整风学习期间经常深入小组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向全体同志作过多次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同志系统地论述了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立三路线和王明先“左”后右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报告中，他把自己摆了进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问题，使大家深受教益。整风期间，适逢他四十五岁生日。这天他在红岩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七条，以此来鞭策自己。邓颖超同志也于同年四月二十八日拟订了《自我修养问题》十一项。

在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模范行动的影响下，同志们都能自觉地参加整风学习运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同志对自己的问题能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剖析。对同志能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和风细雨的态度诚恳地进行帮助。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密切了同志间的关系。有的同志还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内部墙报上对自己写文章的八股气，自己的宗派观念和对“人性论”的错误认识，对受王明“左”倾思想的影响、不安心本职工作和明哲保身的自由主义等等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经过整风，大家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志们深深感到整风学习运动是克服自己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无产阶

级觉悟和改进工作的“灵丹妙药”。

(二)

在整党过程中，南方局的领导，用整风的精神推动党报、党刊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新华日报》在社论位置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三月十六日发出的《改造党报的通知》，并根据通知的精神，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征求读者对改版意见的活动。五月二十三日发表社论《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的批评》。次日又发表了《造成学习热潮》的社论，并在第二版以大字标题刊登了《本报特别启事》，请读者提出批评建议，帮助报纸整风、改革。

此外，《新华日报》报馆还召开多次大型座谈会，邀请当时云集在重庆的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全面改进报纸工作。

《群众》杂志也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起多次发出《敬向读者要求指示的通告》，表示在中共中央整顿三风号召之下，“更感读者意见之可贵和迫切需要，特向读者征询意见，希读者严格批评……”

《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向读者征求意见和建议的行动，引起了读者广泛的注意和反响，接到大批读者来信。他们在信中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和善意

的批评，对改革报刊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新华日报》在征求读者意见的基础上，又听取了报馆内部同志们的批评。经过编辑部同志的反复讨论、研究，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正式改版。改版后第二天，即九月十九日，创办了《团结》专刊。它是帮助党的各级组织和同志们开展整风学习运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推进《新华日报》改革的园地。

周恩来同志十分重视《团结》的出版，亲自写了发刊词《团结的旨趣》，他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且学会克服弱点。”列宁的这句话，刊登在该期的刊头。

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改版后，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张报纸对国统区的文化思想战线的影响和指导作用越来越大，统一战线的宣传有了新的发展，国际宣传也更有成效，全面地实现了“编得好、出得早、印得清、销得多”的口号，得到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群众的拥护和好评。

《群众》杂志也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第八卷第一、二期开始革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在整风学习运动中，特别注意对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他们号召青年注意调查研究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努力钻研业务，提高工作能力；鼓励他们练习写作，积极给党报、党刊写文章，从而

使青年同志们的思想认识、业务水平和写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三)

整风的后一阶段是审查干部。由于南方局领导平时对干部勤于考察，因此对干部基本上胸中有数。干部的审查工作，由组织部门负责，采取部门领导、支部、本人三结合的方式，不搞神秘化。南方局某一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被诬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人。周恩来同志根据对这个干部的了解，根本否定了此事，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国民党特务机关施用“反间计”，诬陷南方局工作人员中的一对青年夫妇。南方局领导对他们进行审查后，作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干部政治审查结束后，组织上根据各人的表现作出鉴定，再由负责同志亲自向本人宣布，最后把审查结论报送中央。整风之后，人人心情舒畅，意气风发。

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南方局领导整风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是正确的。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三周年时，董必武同志在《群众》杂志（一九四四年第九卷第十三期）上，以《谈党在不断学习中进步》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说道，在这将近三年的整风运动中，我们已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它改造了党内的非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改进了工作。

因而使党更加团结、巩固和发展。这是我党的思想革命。这种成绩是不能以数字计算的。”董老的这段话，是对于全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整风运动的评价，也是对于南方局整风运动的评价。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二辑

作者 =

页数 = 2 8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